



引用格式:冯兵,邓群刚.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的理论逻辑与时代特征[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1):1-9.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0.01.001

文章编号:1009-3729(2020)01-0001-09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的理论逻辑与时代特征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of the party construction though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冯兵¹,邓群刚²

FENG Bing, DENG Qungang

1. 四川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2. 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700

摘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党建思想是一个内容丰富、辩证统一的科学体系,具有严密的理论逻辑与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新时代党建思想的逻辑起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新时代党建思想的理论主题;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先进性、纯洁性建设是新时代党建思想的理论主线;“六大建设”构成了新时代党建思想“六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新时代党建思想的最终目标。全面性、长期性、严格性、人民性、创新性、实践性是新时代党建思想最为凸显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

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
党建思想;
理论逻辑;
时代特征

[收稿日期]2019-11-20

[基金项目]四川大学青年杰出人才培养项目(SKSYL201817);四川大学创新火花库项目(2018HHS-34);四川大学学科前沿与交叉创新重大项目(SKQY201762);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青人才”培育计划项目(SQ2019-MY07)

[作者简介]冯兵(1980—),男,河南省西华县人,四川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邓群刚(1981—),男,河南省商水县人,西南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1]。党的自身状况如何,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人民生活。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是历经风雨洗礼的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奋斗历程中形成的诸多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之一。中共十八大以来,面对新阶段、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党的自身建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形成了一个集继承性、时代性、创新性与系统性于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体系。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的理论逻辑

作为体系研究,不能仅止于平面的罗列,还需要对其逻辑结构进行深入剖析,把各个基本理论观点在整个体系内部的地位、作用,以及相互内在逻辑关系厘清,这样才会给人以立体感,便于把握其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2]。理论逻辑不同于理论本身,它主要指的是学科理论本身固有的内在的本质联系,以及人们理解、把握、运用理论的思路和方法^[3]。理论逻辑表现的是事物的内在联系机制,研究的是理论本身的内在规律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作为一个内容丰富、辩证统一的科学体系,具有严密的理论逻辑。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的逻辑起点

党的历史方位理论所揭示的党的历史地位和任务、党所面临的环境,以及党自身状况的变化,是我们党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

的出发点和依据^[4]。党的建设总目标的制定和提出,是基于党对自己所处历史方位的正确认识和判断,否则就会出现落后于或超越于时代的错误,使党的建设乃至党的整个事业遭受严重损失和挫折。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历史方位是党的建设理论的逻辑起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建设必须把握的基本规律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5]。由此,历史方位判断是制定党的建设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历史方位判断的正确与否,决定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存亡。党的建设历史方位与国家建设发展方位紧密相连:国家建设发展方位决定党的建设方位;党的建设进程体现国家发展方位。无论世界还是中国,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工作也时刻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这个新的历史方位,既与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一脉相承,又与之有很大的不同,面临许多新情况新变化: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党的建设工作要“面对全面从严治党进入重要阶段、党面临的风险和考验集中显现的新形势”^[6]。在这里,“重要阶段”明确的是新时代党建工作所处的新的历史阶段,“集中显现”明确的是阶段性特征,而“党面临的风险和考验集中显现”的新特征是全面从严治

治党进入新阶段的重要依据。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四种危险”和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的“四大考验”不但没有消除,而且还会不断产生新情况、出现新问题,可以预测和难以预料的风险和考验随时都会出现,由此产生有关党的建设的“两大历史性课题”:一是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二是不断提高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7]。如何战胜风险,经受住严峻考验,化解潜在的危险,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解决好两大历史性课题,做好新时代的新试卷,是中国共产党需要担负起的历史使命和亟待完成的时代任务。

面对新时代管党治党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起1945年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关于历史上朝代更替“周期率”的对话,多次提到1949年3月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时毛泽东提出的“进京赶考”之论,强调“赶考”还在路上,“考试”还没有结束。他强调,“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试的‘考试’考好,使我们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8]。时代、实践和理论的逻辑,就是“新时代提出新课题,新课题催生新理论,新理论引领新实践”^[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既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逻辑起点。也就是说,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催生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党建思想,而新时代党建思想也正是我们党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后解决自身面临的新问题新挑

战的理论回应。

2. “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的理论主题

党的建设与党为实现不同时期的任务而确立的理论和路线紧密联系。无论时代主题怎么变换,“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党的建设主题一直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步伐同步。1939年10月,毛泽东根据当时我们党所面临的形势、任务与党建状况,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强调,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需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10]602}。我们党不仅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对党的建设目标进行了清晰的描述,即建设一个苏联布尔什维克党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且提出了怎样建设党的思路,即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方位地进行建设。“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也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之一。面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任务,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们党在执政条件下如何加强自身建设进行了探索,强调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努力把我们的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根据邓小平关于“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的意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聚精会神、坚持不懈地抓党的建设,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决了在改革开放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可见,“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一直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党建理论和实践探索的主题。

同样,从党承担的历史任务和面临的执政环境来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党的建设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从理论逻辑上来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仍然是紧紧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党建理论的核心问题展开的。中共十八大以来,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发表了多次讲话、进行了多次阐述,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做出了许多新论断,重新认识和审视了我们党的自身建设问题,内容日益丰富,理论逐渐系统化,最终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的思想体系,科学回答了我们党在新时代“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党建工作的核心问题。

3. 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的理论主线

党的建设之主线是党的建设的灵魂:从纵向上看,它贯穿党的建设的始终;从横向上看,它体现在党建工作的各个方面。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1],源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同时面临着“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我们党要想履行好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就必须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巩固长期执政地位,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清醒认识到,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

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11]60}。

应当看到,肩负伟大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同时背负着能否长期执政的巨大压力。由此,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必须贯穿党的建设之始终,党的建设的各项工作必须紧紧围绕着党的长期执政能力的提高来进行。所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理所当然地成为党的建设的理论主线之一。

把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作为党的建设主线,是因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我们党执政合法性的根本来源,是确保我们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领导核心的根本前提。能否长期执政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够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应对和经受住各种考验、化解和战胜各种危险的重要法宝”^[12],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必须体现先进性、纯洁性。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条主线贯穿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的始终,体现在新时代党建工作的各个方面。党的建设各项工作都必须紧紧围绕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这条主线去努力和奋斗。要以是否有助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衡量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的优劣、得失。

4. “六大建设”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六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的总体布局是立足于我们党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时期党建工作经验教训基础上确立起来的。为了保

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经过长期摸索,确立了由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架构。改革开放初期增加了“制度建设”,中共十七大、十八大增加了“反腐倡廉建设”,中共十九大表述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11]61}。这一新的表述突出了政治建设的统领地位和纪律建设这个管党治党的治本之策^[13],特别强调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其他几大建设之中,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使党的建设工作的思路更加科学明晰,由此构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六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5. 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的最终目标

党的建设目标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首要的、根本的问题,它直接、明确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确立党的建设目标的基本作用是从总体上规划党的建设方向,为党的建设定位^[14]。早在1939年10月,毛泽东就强调,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需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10]602}。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把党的建设目标描述为“把党建设成为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5]。历史经验表明,制定党的建设目标必须与党的指导思想紧密结合,与时代主题紧密结合,与党的现状紧密结合,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紧密结合^[16]。中共十九大提出的“始终走

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党建新目标,继承了党建宗旨在于巩固我党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地位这一根本点,体现了高度的政党自信、强烈的忧患意识,号召我们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坚持自我革命、始终强化风险意识和提升应对风险能力、始终保持党的活力,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的时代特征

时代是理论产生的基础。党和国家各项战略方针的制定和出台,首先必须对时代特征做出判断。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深入分析和准确判断当前的世情、国情、党情,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党和国家所处时代的基本特征。同时,任何理论又都属于它那个时代,只有认清时代背景和特征,才能深刻认识理论的意义和价值。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诞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这使它不仅具有历史继承的一面,更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体现出新的时代特征。

1. 全面性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点在“全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就是管全党、治全党,“面向8900多万党员、450多万个党组织,覆盖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部门”,既着眼于全体党员中的每一名,又着眼于全部党组织中的每一个;既要抓好党员领导干部,又要拓展到普通党员。例如,提出反腐“苍蝇、老

虎”一起打,监督无禁区、零容忍、全覆盖等。另外,还要把管党治党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既要覆盖到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又要覆盖党的各个部门、各个层级。全面从严治党也不是“一面”,而是思想之面、制度之面、体制之面、能力之面、纪律之面、反腐之面,各个方面要相互配合。中共十八大以来,无论理论阐述还是实践落实,“全面性”均贯穿新时代党建工作的始终,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最显著的特征。

2. 长期性

长期性治理是相对于运动式治理而言的。运动式治理是治理主体运用自身资源,打破常规程序,对社会重大问题或难题进行的运动式专项整治的方式^[17]。在中国共产党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运动式治理是经常出现的一种社会治理方式。以反腐败为例,运动式反腐曾经在历史上反复出现。这种方式发挥了发动群众的优势,但不能根除腐败现象所掩藏的深层次矛盾。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风暴席卷全国,一大批“苍蝇”“老虎”纷纷落马。受习惯性思维支配,社会上流传着“运动式反腐”的说法,“躲避风头”“平安落地”的心态一度流行。如何建立长效反腐机制,成为考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能力的试金石。针对此种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长管长严,而不是管一阵放一阵、严一阵松一阵,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不至于使小矛盾积重难返、小问题酿成大患”,“在全面从严治党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有差不多了,该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不能有打好一仗就一劳永逸的想法,不能有初见成效就见好就收的想法”。“反腐要有定力”“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等中央声音屡见报端,这些无疑是对“运动式反腐”的铿锵回应。中共十八大以来,着力构

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优先选项,注重从严治党长效机制的构建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的时代特征。

3. 严格性

严是爱,松是害。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严。“严”就是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18]。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管党治党要始终坚持严的标准、严的举措、严的纪律。“严”字贯穿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的始终。“严”首先体现在态度上要严肃,言出纪随,寸土不让,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间事,做于细,成于严。从严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保障。我们共产党人最讲认真,讲认真就是要严字当头,做事不能应付,做人不能对付,而是要把讲认真贯彻到一切工作中去,作风建设如此,党的建设如此,党和国家一切工作都如此”^[19]。针对从严治党“两难选择”的错误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些人认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严治党面临两难选择:过宽没有威慑力,会导致越来越多人闯‘红线’,最终法不责众;过严会束缚人手脚,影响工作活力,干不成事,甚至还会影响自己的选票。这些认识都是不对的。”^[20]全面从严治党不适用“宽严相济”的一般处事之法,管党治党决不允许宽,也不存在过严的问题,要把“严”和“实”的要求体现到日常管理和监督中,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从严”不仅是态度之严、处置之严,更是规制之严,体制、机制之严。懒懒散散管不住党,松松垮垮治不好党。中共十八大以来,由于很好地贯彻了管党治党必须“从严”的方针,我们党的党建工作由以前一度存在的“宽、松、软”慢慢走向了“严、实、硬”。严格性由此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的显著特征。

4. 人民性

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能否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决定着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成败。习近平总书记一贯强调人民的重要性,民为邦本的信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党和国家向前迈进的每一步,成为党治国理政的根本宗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21]。“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22]“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民心”、民众“获得感”“人民立场”是习近平总书记经常挂在嘴边、放在心上的词汇。“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金奖银奖不如百姓夸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要是笑,就说明政策好。要是有人哭,我们就要注意,需要改正的就要改正,需要完善的就要完善。”^[23]“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11]⁶⁰可以说,让人民满意、对群众负责,是新时代我们党党建思想的出发点、着力点和落脚点,人民性是新时代我们党党建思想最显著的特征。

5. 创新性

创新性政党指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地对自己的纲领、目标、任务和路线、方针、政策进行调整、更新,以谋求与社会发展和时代潮流共随同进的政党^[24]。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

理论品质、先进性的政党本质、党自身建设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特质。我们党90多年的发展历史表明,始终坚持创新是其从稚嫩到成熟、从弱小到强大的关键因素,是其吸引民众、凝聚人心、团结社会的成功经验。当今时代是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新经验、新事物层出不穷的时代,开拓创新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强大动力。唯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才能使我们党永葆先进性、不断增强执政本领,更好地担负起党的历史使命。中共十八大以来,创新精神贯穿于治党治国各个环节,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创新”列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足见国家对创新的重视。党的建设与治理同样面临进一步创新的现实困境。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个“新”,不仅指面临的形势、任务、挑战新,更指管党、治党的思维思路、治理方式、治理手段、治理的技术环节都应推陈出新。创新源于问题,问题导向与注重创新相向而生。马克思认为,对一个时代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5]。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26]党的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6. 实践性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人民最忌讳、最厌恶、最痛恨的就是“空对空”。在党的建设工作中,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注重党建理论的构建与创新,更看重“言必信,行必果”,真正把党建工作的理论成果和宏伟蓝图落到实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发扬钉钉子的精神,一张好

的蓝图一干到底”；“关键不在说,而在做”；“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党的建设实践经验表明,党的建设中的一些老大难问题不是有没有发现的问题,也不是能不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敢不敢动真格的问题。中共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和“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实干精神,旗帜鲜明地同党内各种陈规陋习、顽瘴痼疾作斗争,从出台中央八项规定切实改进作风到铁腕反腐,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从加强理想信念和党性党风教育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刚柔并济、标本兼治,有效扭转了长期以来管党不严、治党不力的局面,老百姓从中看到了党“言必信,行必果”的政治品质。真抓实干、重在落实的实践性,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的鲜明特征。

三、结语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无止境,理论创新亦无止境。中共十八大以来,面对“四大考验”与“四大危险”的严峻挑战,习近平总书记以坚韧不拔的担当精神、非凡的理论勇气、高超的政治智慧,站在时代前沿,对党建工作进行了重新布局,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逻辑严密、特色鲜明的党建思想体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是对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建实践经验的高度凝练和全面总结,进一步深入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历史性课题,标志着我们党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14]。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深化了我们党对党的建设规律、执政规律的认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新境界、中共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的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中国化的

最新成果,是新形势下做好党建工作的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为逻辑起点,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理论主题,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理论主线,为实现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党建目标,最终形成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制度建设“六位一体”的党建总体布局,具有严密的理论逻辑。全面性、长期性、严格性、人民性、创新性、实践性六大时代特征渗透其中。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开辟了管党治党新境界,中共十八大以来,正是遵循了这一思想,我们党以坚强的决心、空前的力度,推进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现了从“宽松软”到“严紧硬”的深刻转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这一科学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会更加充分地展现出来。只有理清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的理论逻辑和时代特征,才能全面深入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更好地领略这一思想的基本轮廓、总体面貌、丰富内涵、深厚底蕴,并用以指导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者。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

- 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17-10-18)[2017-10-28]. <http://www.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html>.
- [2] 郑德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剖析[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0(12): 24.
- [3] 祝国强. 理论逻辑与生活逻辑有机结合的几点思考[J]. 思想政治课教学, 2011(10): 17.
- [4] 宋镜明, 吴向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的逻辑结构、理论特征和历史地位[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2): 131.
- [5]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22.
- [6]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7.
- [7] 齐卫平.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新判断: 全面从严治党进入重要阶段[J]. 理论学刊, 2016(5): 10.
- [8] 习近平.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4: 158.
- [9] 刘云山.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N]. 人民日报, 2017-11-06(02).
- [10]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11] 本书编写组.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12] 习近平. 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J]. 求是, 2012(6): 3.
- [13] 赵乐际. 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N]. 人民日报, 2017-11-11(04).
- [14] 韩永生. 党的建设目标: 执政党建设的首要问题[J]. 理论月刊, 2009(2): 46.
- [15]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403.
- [16] 杨宪福. 党的建设目标的演变进程及启示[J]. 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 2009(6): 45.
- [17] 李辉. “运动式治理”缘何长期存在? ——一个本性分析[J]. 行政论坛, 2017(5): 138.
- [18] 习近平.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05-03(02).
- [19] 习近平.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4-10-09(02).
-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94.
- [21] 习近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4-12-27(01).
-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122.
- [23] 习近平. 看清形势 适应趋势 发挥优势 善于运用辩证思维谋划发展——习近平在贵州调研并发表重要讲话[N]. 人民日报, 2015-06-19(01).
- [24] 齐卫平. 创新: 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历史的特质——建设创新型政党的逻辑思考[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5): 119.
- [2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03.
- [26]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05-19(02).



引用格式:曹东勃,刘康. 高校学生党员“两面人”现象的思想根源及其精准治理[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1):10-20.

中图分类号:D263.1;G412;A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0.01.002

文章编号:1009-3729(2020)01-0010-11

高校学生党员“两面人”现象的思想根源及其精准治理

The origin of thought and precision management of the phenomenon of “double dealing and duplicity” in college student CPC members

曹东勃¹,刘康²

CAO Dongbo, LIU Kang

- 1. 上海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 2. 菏泽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菏泽 274015

摘要:政治上的“两面人”对党和人民事业危害极大,对这一现象加以治理,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两面人”不是一天形成的,必须从源头上进行精准治理。通过对少数大学生党员中存在的外部言行与内心动机大相径庭、现实角色与党员身份存在反差、入党之前与入党之后表现迥异等现象的分析可知,从大学生党员中“双重人格”现象到政治“两面人”现象存在一条隐秘的逻辑甬道,少数大学生党员中存在的“双重人格”正是政治“两面人”现象的低龄化形态:其一,精致利己主义对学生党员理想信念的腐蚀是其产生的思想根源;其二,多元社会思潮对学生党员身份认同的削弱是其产生的环境条件;其三,选拔失之于宽与惩戒失之于软对学生党员的纵容是其产生的制度因素。通过对大学生党员中的“两面人”进行精准识别,在思想上弥合大学生党员“两面人”的人格分裂,构建“培育—考核—惩戒”全覆盖的高校学生党建体系,对其进行有效的针对性治理,是对在党内危害极大的政治“两面人”防微杜渐的有效举措。

关键词:
大学生;
党员;
两面人;
党建

[收稿日期]2019-08-21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17JDSZK082);上海市学校德育理论研究课题(2019-B-004)

[作者简介]曹东勃(1983—),男,辽宁省阜新市人,上海财经大学党校常务副校长、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副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经济哲学、思想政治教育;刘康(1981—),男,山东省菏泽市人,菏泽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治理党内政治上的“两面人”现象,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中共十九大明确提出“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之后,党中央高度重视的一项政治任务。2019年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再次强调,“不得搞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决不允许对党中央阳奉阴违做两面人、搞两面派、搞‘伪忠诚’”^[1]。“红”即忠,“黑”即奸。将红、黑、高、低排列组合,可以大体形成四种情形:“高级黑”者,大奸似忠,口蜜腹剑,厚重其外,祸心其内;“低级红”者,大赞小帮忙、不帮忙甚或帮别人倒忙。“低级红”有一部分原因是治理能力比较低造成的“无心之失”,但也不乏别有居心者有意为之;而“高级黑”则基本上都属于“两面人”。“两面人”在本质上属于坏人,我们要重视和警醒,提高识别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出,防止政治上的“两面人”,必须“从一开始就要把握好,确保选的苗子政治上过硬。如果坏子选不好,辛辛苦苦培养一场,最终还是会出现问题”^[2]。全面从严治党没有禁区,也没有“特区”。而思想从严,是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必然的逻辑延伸和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关键^[3]。在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大背景下,必须以“底线思维”和“靠前一步”的姿态,及时发现带有倾向性、苗头性的问题,疏浚“河道”,向前追溯,进行源头治理和全流域治理。对大学生党员中出现的“两面人”现象进行研究分析和精准治理,是对党内危害极大的政治“两面人”防微杜渐的重要举措,是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必须突破的盲区。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大学生党员“两面人”形象的初步勾勒、形成根源的剖析,提出对其进行精准治理的对策,以期改进和完善新时代大学生党员发展与管理工作,更好地完成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一、大学生党员“两面人”现象的形成过程与主要特点

大学生党员“两面人”现象是由大学生的“双重人格”演变而来的,具有一定的特点。

1. 从“双重人格”到政治“两面人”的逻辑甬道

对于少数大学生党员中存在的这种截然对立的两种价值取向并存、具有明显分裂性的人格特征,可借鉴心理学“多重人格”的概念,称之为“双重人格”。发展心理学认为,人格的成长、完善直至定型,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其间也会出现反复和波动。因而,“多重人格”乃至“双重人格”作为一段时期内的一种过渡性的阶段或状态,是可以理解的。“双重人格”是指人的内在人格与外部言行相背离的现象,它是人格的一种分裂和异化^[4]。这两种人格呈现出极大反差,有时甚至在个性倾向与心理特征上完全对立,但二者以一种相互割裂的方式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之中。然而一旦“双重人格”被固化,则呈现为一种心理障碍,终究会制约人格的成长完善和人的行为的健康发展。在中国传统的社会认知与道德评价中,对于八面玲珑、人皆曰“善”实则缺乏根本道德立场的人一直持否定和负面的评价,儒家对其有个称呼:乡愿。孔孟批判乡愿之徒“德之贼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古代就有“举孝廉,父别居;举秀才,不识字”的现象,这也是典型的“双重人格”。一些大学生党员所表现出的知行脱节、言行不一、知行分离、情意相悖等现象,如任由其发展下去,不加治理,长此以往,必然由个人的心智和人格障碍转化为政治组织成员的理想与价值迷失。这种“理论与实践相脱离、言论与行动‘两张皮’”的现象,首先典型地体现在一些腐败的党员领导干部的“双重人格上”^[5]。而当这些“带病生存”的大学生党员

走上工作岗位乃至领导岗位后,就极易发生蜕化变质,成为政治上的“两面人”。

从部分大学生党员的“双重人格”现象到政治领域党性丧失导致的“两面人”现象,有着一条内在关联的逻辑甬道。一是外在表现相似。二者虽然在资历、职位和权力等方面有所不同,但都善于欺骗伪装,精心构筑一种正直纯洁、忠诚老实的面具并精心呵护这种合格党员的基本“人设”。二是地位逐渐攀升。大学生党员中的“两面人”大多具有较高的智商和情商,且善于伪装,精于表演,比较容易获得“个人的成功”。同时,他们也善于发现和抓住“机遇”,在政治和其他领域实现更快的攀升。三是危害渐次发展。大学生党员中的“两面人”,因为没有掌握公共权力,其危害还处于初始和萌芽状态,主要表现为组织观念淡薄、党的纪律松懈、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够等,影响相对较小。然而如果不加以有效治理,一直“带病发展”,倘若毕业后进入党政部门,成为掌握权力的“关键少数”,就可能给党的事业带来更大危害。

由此可见,部分大学生党员的“双重人格”现象与党内政治“两面人”现象有着内在的联系。大学生党员“双重人格”现象正是政治“两面人”现象的低龄化形态,换言之,大学生党员的“双重人格”现象就是政治“两面人”现象的胚胎形态,对此必须加以重视,防微杜渐。

2. 大学生党员“两面人”的主要特点

其一,外部言行与内心动机大相径庭。健康的人格特征是“一个有机统一、稳定的整体,也就是个人的思想和言行是协调一致的”^[6]。作为大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大学生党员既应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组织纪律观念,又应以党的理论和党员标准指导和要求自己的实际行动,将高标准严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符合党员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而大学生党员中的“两面人”通常表现为内在人格与其外部言行相背离。有些大学生党员在口头上大谈马

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社会主义道德原则,但在思想深处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并不认同,对于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并不坚定。公开场合积极上进,实际行动却唯利是图,特别是在评优评奖等关键时刻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他们的行为模式中,其人格中的“外显层”和“内隐层”存在巨大冲突,前者用来迎合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评价,后者则是其内心物欲的真实反映。

其二,现实角色与党员身份存在反差。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神圣而严肃,不仅是一种无上的光荣,它更是一种无限责任与担当^[7]。大学生党员的党员身份是党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作为中共党员,有与一般群众相区别的内在规定性、约束性和先进性,承载着社会的更高期待;另一方面,在大学生这个特殊年龄阶段,又必然具有青年人特有的那种独立人格、创造活力和张扬个性,并需要在学习和社会实践中不断塑造和养成健全人格,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党性的理论属性和组织属性最终都要通过党员的个体属性呈现出来。现实中确有部分大学生党员不履行职责,不珍惜党员称号。例如,在学习上,缺乏积极的学习态度和攻坚克难的学习动力,成绩落于人后;在生活中,沉湎于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不思进取;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引领带动作用微弱,缺乏责任担当,不够深入群众,没有服务意识和奉献意识;在面对错误思潮和言行时,态度暧昧甚至逢迎附和,没有坚定的政治理想和鲜明的价值判断。这种现实表现与党的先锋队性质和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背道而驰,也与群众对党员的期望反差极大。长此以往,自然会疏远大学生党员同大学生群众之间的联系,使大学生党员失去威信。

其三,入党之前与入党之后表现迥异。入党只是一个起点,而决不是一个终点。大学生党员自在党旗下宣誓的那一刻起,就必须持之

以恒做到坚守信仰、坚定信念、严于律己、克己奉公,这是一个合格党员的基本素质。多数大学生党员在入党后仍然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更强的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但少数大学生党员,由于其入党动机带有较强的个人目的和功利主义色彩,把入党作为一段时间内努力的目标,仅仅满足于组织上入党,思想上仍迟迟没有达到党员的标准和要求,因而入党之日便是思想止步、不求上进之时,他们把奋斗的起点变成了懈怠的出发点。一项对于大学生党员入党前后变化的调查结果显示,40.3%的人认为身边的学生党员对周围同学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15.2%的人认为有的同学入党后表现出优越感,6.8%的人认为他们入党后反而不如入党前表现积极^[8]。入党前后“两张脸”“两个样”“入党前经常一身汗,入党后什么都不干”,甚至入党后成为“隐性党员”“无为党员”,凡此种入党前后判若两人的表现,正是政治意识、党员意识、党性意识弱化和缺失的后果,必然会削弱高校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而对于那些真正有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想要入党为群众多做贡献的学生也会产生消极影响。这些入党前后表现出巨大反差的大学生党员,本质上是背离了入党的誓言,淡忘了入党的初心,褪去了共产党员的本色。

二、大学生党员“两面人”现象产生的根源

人格是在生理、环境、教育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大学生党员“两面人”现象的产生也受个人思想、社会环境和学校制度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因而对这一问题的治理必须首先探寻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找到其人格异化的根源。

1. 思想因素:精致利己主义对党员理想信念的腐蚀

一个人的外部行为方式是其内在价值观念

的外化表现。大学生党员的“两面人”现象,与这些大学生党员的价值取向发生扭曲密不可分。利益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动力。“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9]我们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并不排斥个人利益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但大学生党员如果过于关注个人当下现实利益的实现,把做人做事视为一种投资,就会逐渐蜕变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10]。

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曾谈及当时党员的入党动机问题:抗战前期,党员发展工作在各级党委层层加码下一度演变为一场突击性的入党“运动”。在这种繁重的任务压力下,党员的入党动机十分驳杂:或基于阶级信仰、或为抗日、或为解决个人问题、或碍于亲友情面。“有些人主要是由于在社会上找不到出路——没有职业、没有工作、没有书读,或者要摆脱家庭束缚和包办婚姻等,而到共产党里来找出路的。甚至还有个别的人为了要依靠共产党减轻捐税,为了将来能够‘吃得开’,以及被亲戚朋友带进来的。”^[11]这种带着功利性目的入党的党员数量的扩张,并不能真正带来党的战斗力的提高。

同样,在今天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眼中,党员资格是一种政治资本,是一张能够在未来兑换为一定私人利益的“彩票”,从而入党的逻辑起点及其归宿,就异化为谋求个人的实际利益。“入党不是为了奉献,而是为了升官发财……奉献精神缺失,党的先进性就必然缺失。”^[12]较高的所谓“智商”和“教养”,使得他们能够通过精心包装,塑造和展示一个看似优秀、圆满的学生党员形象,但内在的思想境界却与党员的标准和要求貌合神离,甚至背道而驰。这种虚伪性、逐利性和投机性,正是在精致利己主义腐蚀效应影响下造成的人格异化和分裂、党性弱化

和丧失,直接影响高校大学生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具有严重的潜在危害性,是党内存在的一种严重的政治隐患。

2. 环境因素:多元社会思潮对党员身份认同的削弱

其一,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大学生思维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后现代主义思潮在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引起国内学术界的热议,以《大话西游》等香港电影为标志,这种怀疑传统价值取向、“重估一切价值”、解构历史、“语言游戏”的冲击渐成气候。这是以“95后”为主体的在校大学生自出生以来就身处其间的思想和生活场域。“95后”大学生所热衷的挖苦、反讽等言行方式,就是这种复杂成长环境的产物^[13]。泥沙俱下之中,诸如前述“精日”分子之类的各类错误思潮也浮出水面,并在以大学生为主要受众群体的一些互联网平台大规模传播。他们频繁创造和使用诸如“贵国”“支那”“贵支”(“桂枝”)、“你支”等语言对生养自己的母亲——祖国——肆意讽刺和辱骂,对爱国言行嗤之以鼻。可怕的是,这些语词如今并未伴随个别网络平台的衰落更迭而消退,反而在近年来各种错误取向的“行为艺术”中反复再现,并始终沿袭这套“隐微言说”的“黑话”,不断扩大其传播范围和影响力。有一种观点认为,要以“段子对抗段子”、用“调侃解构调侃”的方式,来“柔性”地处理和应对历史虚无主义,以期“寓教于乐”地化危机于无形。事实表明,这种极不严肃的处置办法既不负责任,也没有效果,甚至会误导被教育对象,使其认为这种虚无主义的价值观念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默许,其结果只会事与愿违。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当代大学生很容易倾向于解构历史、虚化英雄、游戏人生、“怎么都行”,在成功学的幻灭与“佛系人生”的淡定之间游走,这就直接颠覆了党员身份认同赖以确立的重要价

值基础。而这种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掩护”下暗流涌动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最终指向,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奋斗历程,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等的肆意丑化和全面否定^[14]。受这种“虚无”思潮的熏陶,一些党员大学生淡化了对自己政治身份的认同。

其二,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对大学生党员的身份意识造成了严重削弱。互联网放大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历史和现实的消解,多元价值的客观存在及其对应的社会现实也迎合了“怎么都行”的相对主义论调。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新的媒介环境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高校大学生的成长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学生党员“两面人”现象的生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学生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他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交往习惯深受网络的影响。由于网络具有隐匿性和虚拟性特点,一些大学生用虚拟身份在网络世界中塑造另一种人格——由现实的自我身份变成一个技术符号。这种虚拟身份与其现实世界中的真实身份可能彼此冲突,加之网络环境的隐匿属性会减弱自我约束的能力,导致虚拟人格与现实人格的分离,加剧了对人格同一性的消解。社会身份和虚拟身份的脱节,为一些大学生党员在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中“表里不一、网上网下表现不一样”的人格分裂提供了虚拟化环境。例如,一些人通过微信分组,根据自己的需要,实现多种身份的自由切换,把不同的面相呈现给不同的人,“表演性”十足。有些人还不止步于网络言说,甚至推开各种线下的实质性挑衅活动。令人遗憾和痛心的是,一些大学生党员的身影也出现在其中。可以说,网络乱象的治理与大学生党员“两面人”现象的治理是一体的。

3. 制度因素:选拔失之于宽与惩戒失之于软的共振

一个时期以来,高校大学生党员发展成效显著,但也存在重发展轻教育、重数量轻质量、重程序轻细节、重形式轻内容的问题。相对于学生掌握党史、党建知识和时事政治情况,更为看重的是入党积极分子和党校的参训人数;相对于改进党课的内容、创新党课的形式、检讨党课的效果,更为看重的是党课的课时数,以至于党课内容体系化不足、形式单一^[15]、效果平平。概言之,从制度建设的层面来看,“思想上入党”的要求流于空泛、入党后监管的环节存在缺失、惩治规约的措施相对乏力,这些因素是大学生党员“两面人”现象存在的制度因素。

其一,重“组织上入党”,轻“思想上入党”。思想上入党和组织上入党是既有内在区别又相互紧密联系、互为保证的有机整体。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最早明确提出“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并对此做了深入阐述:“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16]近些年来,各个高校经过长期的党建实践,在大学生党员发展方面逐步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备的程序,在发展大学生党员时制定了各种量化考核标准,严把大学生党员选拔这一关;但是,如何对“思想上入党”进行有效考察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大学生党员选拔机制中的“思想上入党”的短板,造成了诸多问题:部分大学生党员入党动机不纯,但是在考察期由于刻意表现而并不会显露出来。他们虽然提交了思想汇报,却不反映主观实际,没有真正触及思想、触动灵魂。高校党组织单纯凭借入党志愿书中的个人

表述、入党介绍人意见等评语,也无法真正了解大学生的入党动机和理想信念。因此,会存在部分大学生经过程序考核并顺利通过选拔,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距离合格党员却相距甚远,名义上拥有了党员资格,实际表现却没有达到党员的要求。

其二,重视入党前的发展,轻视入党后的监管。近年来,高校采取了一些切实有力的措施来抓学生党建工作,但往往把重点放在党员的发展上,对于预备党员考察以及转为正式党员后的进一步发展缺乏足够重视,在入党前后的教育和管理监督上普遍存在前紧后松、缺乏连贯性和持续性的状况。大学生党员在入党前,党支部会按照党内一系列规章制度和发展程序,对他们进行各种教育、培养和考察,经过严格审查后方能入党。但是大学生成为预备党员之后,在转为正式党员之前还有一年的考察期,这个阶段的考察工作大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般情况下,预备党员只要考察期未犯错误,即使表现不突出也可以按期顺利转正。另外,有些高校的党组织对大学生入党前后的考察不连续,缺乏长效考评机制。对新加入党组织的大学生党员疏于继续教育和管理监督,应付了事的情况时有发生。由此导致不少大学生入党后思想上开始麻痹,行动上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弱化了党性修养,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这种制度上的缺陷和不足,容易导致部分大学生为了入党而积极表现,一旦入党就不再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一进党的门”,成了“另外一个人”!

其三,制度流于粗疏,惩治措施乏力。任何一名党员,都应做到坚定党性,有政治与纪律底线,坚守政治规矩。各级党组织有权对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予以规范,并对没有履行既定义务的党员进行教育或惩戒。大学生党员中的“两面人”现象得以滋生和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

因在于高校对学生党员的管理过程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和严格问责。当前对大学生党员行为进行约束的规章制度在内容上并未做到精细化,很多内容还停留在宏观指导层面,导致规章制度在实践中往往缺乏针对性和操作性。大学生党员中的“两面人”虽然不是高校党员队伍的主流,但也是党内不容忽视的政治隐患。目前,对于这一状况还缺乏精准识别和有效规约的制度设计,对出现问题的大学生党员进行制度性惩戒,也往往出于息事宁人等各种考虑而比较谨慎,甚至流于形式、“灵活处理”,极少有大学生党员受到党内纪律处分,更不要说开除党籍。缺乏应有的制度设计和纪律约束,使得大学生党员的“两面人”现象有了进一步滋生、蔓延的土壤和空间。高校党组织必须认识到,对于大学生党员所犯错误特别是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错误,简单地以“保护学生”为理由,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是错误的。这种“护犊”行为看似温情,实则有害,既放纵学生个人,也不利学校声誉,更有损党的形象。

三、大学生党员“两面人”现象的精准治理

大学阶段是大学生党员成长成才的关键时期,也是他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因此,必须对大学生党员中存在的“两面人”现象进行精确识别和针对性治理,做到早预防、早处理,遏止政治“两面人”隐患的低龄化扩散。

1. 靶向定位:做好大学生党员“两面人”的精准识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些政治上的两面人,装得很正,藏得很深,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但并非无迹可寻。只要我们多用心多留心,多角度多方位探察,总能把他们识别出来……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既听其言、更观其

行,既察其表、更析其里。”^[17]必须明确的是,治理大学生党员“两面人”现象并不是一场“运动”,其目的也不在于“划清界限”,而是为了本着对党负责和对大学生负责的态度所做的一种早期干预措施。高校中具有“两面人”特征的大学生党员一般都有较高的智商和情商,心理结构也非常复杂,进行甄别和辨识的难度较大,尤其是在某些大学生党员具有较大差异的“外表层”和“内隐层”中,了解其真实的、主导的一面,存在一定困难。因此,要在大学生党员中鉴别出真正具有政治危害性的隐患,必须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

识别一个大学生党员是否真正合格,既要了解他的政治立场,也要了解他的人格品质,包括是否诚实、正直,而健全的道德人格必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普遍性。有的大学生党员“看人下菜碟”、“逢人只讲三分话,从不全抛一片心”:把自己表现优秀的一面展现给领导和老师,对同学则无所顾忌。这显然是与忠诚老实格格不入的一种姿态。因此,可以由院系党组织主导,在群众中进行调查访谈,听取同学意见,全方位、多角度地考察了解大学生党员是否存在多重面孔、入党前后是否存在巨大反差、对待个人利益时的态度和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立场等。

当然,大学生正处在自我同一性确立的时期,无论是在其情感、认知、意识、信念上,还是在其实际行动上,都存在一定的波动性,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共产党宗旨目标的心理认同和情感体验处于始发期、自我践行处于可塑期。因此,这一阶段表现出的诸多现象未必是思想道德问题,也可能是认知心理问题,是在各种社会思潮冲击和不同矛盾冲突的过程中出现的短暂性摇摆。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所要关注和精准识别的是那些极端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理念根深蒂固的少数大学生党员,他们心中

充斥的只是个人的自私自利,且会持续不断地用精心伪装和表演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对这部分人来说,一般的思想教育和价值引导已经不够了,必须针对性地“猛药去疴、刮骨疗毒”。

总之,应对表现出“两面人”征兆的大学生党员做具体分析和仔细甄别,区分是偶发暂时现象还是长期顽固病症,进行有针对性的思想疏导、价值引领和制度约束,对于那些经过教育后仍然不改正的大学生党员,则应改变以教育为主的宽松治理方式,果断地予以党规党纪处理。

2. 思想重塑:弥合大学生党员“两面人”的人格分裂

其一,重塑共产党员的身份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任务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18]自我认同的弱化和缺失是外部环境复杂性对内部精神世界侵扰造成紊乱的后果,自我认同的重塑,是一个观念自觉、自我交战、自我革命,以求寻回初心的过程。一方面,应强化对党员身份的自我认知。少数大学生党员在不同场域中有意回避自己的党员身份,角色意识淡薄,这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基于对自己党员身份的认知错误或定位不当造成的。应通过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增强大学生党员对党性的理解,端正其思想行为,强化其身份认知,“坚持爱国与爱党、爱社会主义、爱优秀传统文化相统一,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19]。另一方面,应呼应大众对党员的社会期待,使大学生党员牢记作为党员应履行的义务和应发挥的先锋模范作用。在校园生活学习的过程中,应让大学生党员通过佩戴党徽或党员铭牌等方式“亮出身份”,并以党员身份参加各类活动,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处处以党员标准严格规范自己的言行,使党员身份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达到“知”“信”“行”的统一、党性与个性的统一。

其二,增强“四个自信”的价值认同。“四个自信”教育的关键是要形成大学生党员对中国发展成就的认同感、自豪感、使命感、责任感,教育大学生党员辨明纷繁复杂的世情、国情、社情、党情,在此基础上立行立改,以更严格的道德标尺要求自己,落脚到培养和塑造符合党员标准、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的正确义利观。一些大学生党员处理不好个人利益与党的宗旨之间的关系,最终滑入“两面人”轨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义利观的扭曲。这就要求我们对具有“两面”特征的大学生党员的价值主体自我化、价值取向功利化、价值追求片面化的错位义利观进行调整,教育他们把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同时肯定其合理的个人利益、个人抱负和追求,鼓励他们在遵守党纪国法前提下以正当途径和合法手段追求自己的利益。要求他们在追求个人成功时,既要尊重和发挥市场经济的正面作用,又要在具体行为上努力超越市场法则和个人功利的局限。当个人利益与党和人民利益两者之间发生冲突时,应坚持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应坚决反对舍我其谁、唯我独尊的过度个人主义倾向,及时制止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利己主义取向,切实消除为追求个人利益、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的极端功利主义思想,使大学生党员自觉地做到义利统一、见利思义、以义导利、为义舍利。

其三,开展富有成效的警示教育。一是应通过高校现有的各类思想政治工作和法治教育平台,以新媒体为工具和渠道,根据不同大学生党员受众的具体情况,确定恰当的传播内容,选择合适的传播载体,把握准确的传播时机,对相关道德与法律问题的主要内容、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开展针对性宣讲^[20]。高校党委、团委和

学生工作部门,以及二级院系党组织,首先应当联系大学生党员中发生的具有较大舆论反响的典型案例,组织专题学习、讨论,党委教师工作部、宣传部、组织部、纪委和二级院系党组织应组织师生进行系统学习。应借助思想政治理论课等课程,快速灵活地插入相关专题内容,让学生及时接受教育。二是应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新编教材投入使用为契机,通过思政课的课堂教学主渠道开展有针对性的精准引导。应通过案例教学、深入讲解和充分讨论,引导学生理解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屡遭凌辱而不断抗争最终赢得胜利的历史,理解“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的深刻内涵,增强爱国主义理想信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三是应广泛运用专题宣讲等渠道,讲解中共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深刻内涵。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所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论语》所讲的“必也正名乎”。治国理政,正名为先,“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对于党建来说,这种正名的体现之一,就是每一个党员都应明确自身的政治定位和目标宗旨,旗帜鲜明地在党言党、在党爱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毫不动摇、理直气壮地同各种错误思潮、观点、主张划清界限,敢于亮剑、敢于斗争。

3. 制度规约:构建“培育—考核—惩戒”全覆盖的高质量大学生党建体系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21]科学的制度设计和严格的制度约束、监管和问责,是治理高校大学生党员“两面人”现象的关键。

其一,加强大学生党员的基层组织建设。大学生党员培养的功能定位应该是实现党的政治吸纳,所以在党员发展时有一个政治立场和业务能力或德与才之间的内在张力,在实际操

作中往往会存在优先考虑业务能力的情形。问题的关键在于后期的持续培养必须要有系统化的统筹设计。而一旦发展成为党员,就习惯地默认为一切合格。这种长期存在的认知错位,是导致政治“两面人”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所强调的“做合格党员”明确针对的病灶。科层体系与党组织的结合使得基层党员特别是大学生党员的主体性被压制,入党后他们的思想教育在学校党的工作中常常退居其次,反而是组织内的一些日常琐事被以“压担子”的名义分摊到新大学生党员头上,这也容易使大学生参与感、认同感弱化,疲劳感、疏离感上升。事实上,除思想建设外,强有力的基层党建工作和基层组织建设也是守护党员初心、预防政治“两面人”出现的重要保障。

其二,建立大学生党员的长效培育机制。针对高校大学生党建工作普遍存在的“重发展,轻教育”、前紧后松的问题,应建立大学生党员的长效培育机制,保持其入党前后教育管理工作的连续性。应保持大学生党员在入党后进一步接受党性教育和培养的合理节奏,提高其理论素养,强化其组织纪律观念。应做到事前有计划、进行有安排、结束有总结、事后有改进,使大学生党员教育活动同管理目标相结合,保证大学生党员教育的实效性。

其三,构建大学生党员的考核评价机制。为实现高校大学生党建过程中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化和标准化,应为每一个大学生党员建立“电子成长档案”^[22]。应将大学生党员在日常生活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自觉履行党员义务等日常行为表现,以及党内外群众对每个大学生党员的思想、学习、工作表现等方面所作的客观评价和民主评议,作为评判大学生党员的重要尺度。对于表现较差的大学生党员,应对之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如果严重违犯党规、纪律,应酌情给予党纪处分。

其四,落实大学生党员的纪律惩戒机制。高校党组织拥有对大学生党员进行纪律处分的权限,这是党章赋予的职责,体现了党员选拔与管理监督权责一致的要求。从严治党必须做到严明纪律,执纪必严,全面覆盖,没有盲区。应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把纪律挺在前面,抓早抓小、防微杜渐。高校党组织应当贯彻落实好《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问责条例》等党规党纪的要求,教育大学生党员恪守道德底线,讲操守、重品行,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树立理想宗旨的高标准,确立不可逾越的纪律红线。针对大学生党员“两面人”现象的不同形态,应发现苗头就及时提醒纠正,触犯纪律就立即严肃处理。应对考核不合格的大学生党员提出批评意见,视其情况延长或取消预备党员的预备考察期。对各种表里不一、言行分离、入党前后反差较大的大学生党员应进行批评教育甚至给予党内纪律处分。应探索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退切实可行的大学生党员退出机制。对于理想信念不坚定、作风不正派、不能发挥党员模范作用、经屡次教育和警告均无改观、严重不合格的大学生党员,应根据党员纪律处分条例的规定,坚决清除出党。这也是保障大学生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及早消除政治隐患的重要举措。

总之,高校大学生党建工作必须严把大学生入党“质量关”,实施“全流域治理”,让“思想上入党”落到实处,把“两面人”拒之门外。中共十八大以来,高校发展大学生党员从注重党员数量的粗放扩张转向注重党员质量的精心培养,的确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这尤其提醒高校党组织在基层党建工作中,特别是在做好大学生党建、发展大学生党员的过程中,尤需注意以下三点:一是思想汇报绝不能流于形式,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基本态度绝不能含糊;二是党性教育要抓住根本,对党的历史、革命传统和创新理论的学习必须贯穿大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培养的全过程;三是在党纪党规面前绝不能

有法外之人,对大学生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上的明显偏差和错误,必须负责任地及时指出和严肃处理。

四、结语

作为一个古今中外历史上极其特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不是一般的作为选举工具的政党,而是由坚定的理想信念组织和凝聚起来的具有坚强战斗力的政党。所以,她对于党员在思想上的倾向性和认同感有极其严格的要求,旨在始终保持党的革命性、先进性、纯洁性。因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23]。保持革命性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之后的新时代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规律,诠释了“革命者”的政治逻辑^[24]。这种自我革命也体现在“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健全党员能进能出机制”的工作要求之中^[25]。

大学是青年人集聚之地,但这里并不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也不是毫无原则的法外之地,更不是党建工作的“特区”。治理党员“两面人”问题,必须注重源头治理。在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中,大学时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阶段。高校学生党员数量是否合理、质量是否过关,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建设者是否合格、党的事业的接班人是否可靠^[26]。近年来,高校的学生党员发展工作的主导方针转向注重质量,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但是从过程管理的角度来看,仍存在着一些亟待改进之处。特别是在加强思想上入党、防范和治理党内“两面人”低龄化发展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引起各方的足够重视。本文通过对大学生党员“两面人”形象的初步勾勒、形成根源的简要分析、精准治理的路径探讨,旨在提出这一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值得关注的新动向、新问题,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新时代大学生党

员发展与管理工作,以高质量的学生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领立德树人各方面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列宁的谆谆告诫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而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我们曾多次重新登记党员,以便把这种‘混进党里来的人’驱除出去,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27]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N]. 人民日报,2019-02-28(01).
- [2] 习近平. 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 党建研究,2018(9):1.
- [3] 孙绍勇,陈锡喜. 思想从严:全面从严治党的纵深发展的意识形态内生逻辑[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7):112.
- [4] 王忠武. 社会结构转型与国民人格塑造[J]. 文史哲,2002(5):106.
- [5] 谢武军,王伟中. 关于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几个问题[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6):171.
- [6] 张宏如. 当代大学生心理学[M].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120.
- [7] 曹东勃. “关键在党”命题的提出及其延展[J]. 思想理论教育,2018(4):43.
- [8] 张鑫. 高职院校在校学生入党动机调查与分析[J]. 人力资源管理,2016(5):252.
- [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7.
- [10] 钱理群. 大学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EB/OL]. (2015-05-20)[2019-06-12]. <http://edu.qq.com/a/20150520/041737.html>.
- [11] 刘少奇.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M]//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6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01.
- [12] 丁薛祥. 大力弘扬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奉献精神——在中办机关“七一”党课上的报告[J]. 秘书工作,2018(7):4.
- [13] 曹东勃. 大学全面进入“95后世代”意味着什么[N]. 文汇报,2016-09-09(06).
- [14] 王翼. 历史虚无主义的生成机理及其克服[J]. 思想教育研究,2018(6):56.
- [15] 董正奇,董树君,蔡常青. 要对党员鲜明地提出政治上入党的要求[J]. 前沿,2010(3):4.
- [1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75.
- [17] 习近平. 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J]. 前线,2019(2):4.
- [18]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395.
- [19] 沈贺. 马克思主义爱国主义教育:时代挑战与回应[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10):136.
- [20] 刘康. “互联网+”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精准传播策略探析[J]. 理论月刊,2018(3):37.
- [21]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
- [22] 陈娟. 关于加强我国青年大学生党员队伍教育与管理质量的思考[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12):138.
- [23] 习近平.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 人民日报,2018-01-06(01).
- [24] 李包庚,张婉. 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历史方位中的革命性[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6):5.
- [25]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教育部党组.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党员发展和教育管理服务的若干意见[EB/OL]. (2013-07-03)[2019-06-15]. 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060/201307/xxgk_154012.html.
- [26] 邓喆,余潇潇,丛振涛. 高校学生党员数量与质量问题的现象与对策研究——以清华大学为例[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4):146.
- [27] 列宁. 列宁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1.



引用格式:刘旺旺.列宁关于执政党文化建设思想的逻辑及其对当代的启示[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1):21-28.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0.01.003

文章编号:1009-3729(2020)01-0021-08

列宁关于执政党文化建设思想的逻辑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and logic of Lenin's thought of culture construction of ruling party

刘旺旺

LIU Wangwang

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执政党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自信程度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精神命脉、国家的灵魂气魄。列宁关于执政党文化建设的零散论述蕴含着深刻的思想逻辑:文化落后是执政党文化建设的深层制约;文化重要是执政党文化建设的历史应然;文化反哺是执政党文化建设的目标指向。列宁这种“文化落后—文化重要—文化反哺”的执政党文化建设思想逻辑,对于当前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启示:执政党只有拥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坚定的文化自信,才能担负起实现文化强国的历史重任,更好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筑中国梦。

关键词:

列宁;
执政党;
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

[收稿日期]2019-12-25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19SJA0216);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9MLC005)

[作者简介]刘旺旺(1990—),男,河南省沁阳市人,南京师范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列宁文化思想。

文化作为人之血脉、国之命脉,是人之为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不仅是立国之本,更是立党之基。任何执政党如果没有文化上的积极引领,不可能实现国家现代化,也无法凝聚民心。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执政党的文化建设思想蕴含着“文化落后—文化重要—文化反哺”的逻辑。这一思想逻辑对于当前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启示意义。

一、落后:执政党文化建设的深层制约

文化发展具有自身的内在规律,相对于社会变迁来说,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呈现出或超前、或滞后两种样态。马克思提出的“死人抓住活人”、邓小平提出的“小脚女人”,都旨在说明文化发展滞后对社会发展造成的困扰。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跨入了社会主义的大门,但落后的文化却给执政的俄共(布)(后改为“联共(布)”“苏共”)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羁绊。

1. 普遍的“奥勃洛摩夫习气”

旧文化对俄共(布)执政效能影响最深的,莫过于执政后列宁多次提及的“奥勃洛摩夫习气”,它代表着小农在长期的自然经济下形成的一种沉湎于幻想、因循守旧、懒散怠惰的人生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人们因长期生活在特定地域,共同的生活方式会使得其性格中存在某种文化上的共同性。列宁认为,俄国人在文化共同性上的表征之一就是典型的“奥勃洛摩夫习气”。早在1902年撰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中,列宁就意识到了这种旧习气的停滞、闭塞、荒芜等弊端。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再一次提到了这种旧习,认为党虽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先进部队,但它只是苏俄整个无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无产阶级又是全体人民群众的一小部分,而脱胎

于旧俄国的广大人民群众无疑在文化上是落后的,在这样的国家可以先进行夺取政权的革命,但还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许多中间环节,这背后的制约因素就是俄国文化的落后,特别是“奥勃洛摩夫习气”的困扰。在列宁看来,苏俄有着大片的土地,甚至可以容下几十个文明大国,但是这些地区“到处都是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是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

在列宁看来,共产党员应该是国家最优秀、最先进的社会群体中的成员,应该具有较高的认识能力和觉悟水平。但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执政党自身建设的任务更加繁重,列宁对“奥勃洛摩夫习气”依附对象的分析逐渐从农民转移到共产党员乃至国家机关各级领导人身上。1921年10月,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不久,列宁就已经意识到共产党员身上缠绕着“奥勃洛摩夫习气”。他说:“不要卖弄聪明,不要摆共产党员的架子,不要以大话掩盖疏忽大意、无所作为、奥勃洛摩夫习气和落后。”^{[1]510}在1922年召开的全俄五金工人代表大会共产党团会议上,列宁多次提到共产党员身上存在着“奥勃洛摩夫习气”。他说:“我们确实处于大家没完没了地开会、成立委员会、制定计划的状态之中,应当说,这是很愚蠢的。在俄国生活中曾有过这样的典型,这就是奥勃洛摩夫。”^{[2]12}这时的列宁已经意识到,“奥勃洛摩夫习气”不仅存在于农民身上,在“具备一切无可争辩的优点”的共产党员身上也依旧存在。为此,他强调必须提高全党全社会的文化水平和认知能力,毫不动摇地反对“奥勃洛摩夫习气”。

2. 缺乏管理本领和不会做经济工作

俄共(布)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承担的使命也由“夺取俄国”转到“管理俄国”。在执政初期,列宁在总体上对工人阶级、共产党员的文化水平持肯定态度,认为依靠广大人民群

众的革命热情和从事社会主义生产的积极性,在党的先锋队作用的引导下,落后的俄国可以生机勃勃地建设社会主义。但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全面实施,商品经济逐渐活跃,经济成分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日益增多,对俄共(布)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考验,即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具有较高的管理本领,会做经济工作,但当时的多数共产党员却没有这种本领。1921年10月,列宁在有关报告中指出,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意味着党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即资本家将同共产党员一起工作,这就产生了共产党员能否更好地为自己工作的问题。对此,列宁强调共产党员要尽快学会做经济工作,这背后的逻辑思考是他深刻认识到文化的先进与否对苏维埃政权的存亡至关重要。1922年,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文献中对共产党员因文化落后而不会经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这一年来我们十分明显地证明,我们不会经营。这是基本的教训。如果我们不能在最近一年内证明我们会经营,那苏维埃政权就无法生存下去。而最大的危险就在于,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到这一点。”^{[2]83}这里,列宁将共产党员是否会经营与苏维埃政权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共产党员的文化落后。为此,他强调所有人都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否则就是执政党的最大危险。

3. 拖拉、贪污、官僚的腐败行为严重

俄共(布)执政初期,列宁认为革命已将旧国家机器彻底打碎,旧的工作作风也将随之销声匿迹,不会在新社会中出现。但在俄共(布)执政后不久,拖拉作风、贪污受贿、官僚主义等旧机关的坏作风沉渣泛起。究其原因,在他看来,一是因为新机关是从旧机关继承下来的,很大程度上仍是旧机关的残余。在俄共(布)八大的文献中,他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描述:“沙皇时代的官僚渐渐转入苏维埃机关,……把他们

赶出门外,他们又从窗口飞进来。这里主要是由于有文化的人才不够。这些官僚可以遣散,但决不能一下子把他们改造过来。在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首先是组织任务、文化任务和教育任务。”^[3]在“最后的书信和文章”中,他再次批评国家机关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指出,苏俄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极少有重大的改变。这些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2]377}。列宁的意思是说,俄国的政治革命将旧官僚制度和旧官僚清除了,但由于党自身的文化落后,不能很好地实行领导和管理,被迫启用了旧官僚,因此旧官僚“又从窗口飞进来”了。所以说,新国家机关只是在旧机关的基础上“稍微粉饰了一下”,本质上体现的还是旧机关的作风。二是由于人民群众甚至共产党员的文化水平低,法律观念淡薄,不能正确运用法律去同腐败现象作斗争。列宁对此有深刻的体悟,他说:“不仅农民不会利用,就连相当多的共产党员也不会利用苏维埃的法律去同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作斗争,或者去同贪污受贿这种道地的俄国现象作斗争。”^{[1]207}在这里,列宁指出了俄国是一个民众普遍没有法律意识的国家,就连作为先锋队员的共产党员也没有受过充分的法学教育。为了能够抵制地方由于受“古老的俄罗斯观点和半野蛮人的习惯”影响而对权力的过度崇拜,列宁提出:“使党建立起一个不大的中央领导机构,能够实际地抵制地方影响,地方的和其他一切的官僚主义,使全共和国、全联邦真正地实行法制。”^{[2]201}在他看来,如果不建立全联邦统一的法制,那么就根本谈不上文明。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法制和文化建设的最大障碍来自于共产党内部。因此,千方百计地清除党内权力崇拜、官僚主义等弊病,通过文化训练建立更高层次的法制和文明是列宁孜孜追求的一个目标。

综上所述,列宁对上述党内存在的病症进行了深刻的病理分析。在他思想深处,特别是在其晚年的最后思考中,直接切中了给执政党带来危险的要害——文化落后和文化贫困,并指出其根源在于文化血脉中流淌的“奥勃洛摩夫习气”,具体表现为作为先锋队员的共产党员缺乏管理本领、不会做经济工作,以及拖拉作风、贪污受贿、官僚主义等。

二、重要:执政党文化建设的历史应然

列宁在领导苏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不仅逐渐认识到文化落后给党有效执政带来的深层制约,而且从价值层面意识到文化建设对执政党长期执政的重要作用。如果说“落后”构成了有效执政的深层文化制约,那么“重要”则构成了科学执政的文化历史应然。即是说,执政党要执政、执好政,必须重视自身的文化建设。

1. 提高文化水平是带领人民前进的要求

党的执政绩效归根到底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上,而欲想实现这一执政使命,增强执政本领、带领人民前进是执政党的不二选择。但从旧文化“娘胎”中生出来的俄共(布)在执政后,手中不乏有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唯独缺乏的是文化力量。在1918年俄共(布)领导苏俄尝试实施第一次工作重心转变时,列宁明确提出执政党要“学会工作”。他指出,随着全部权力的转移,党肩负的任务就变得复杂起来,因此党的领导干部要相应地转变思维方式。1921年,列宁在有关讲话中指出,要避免“宣言、声明、布告和法令”等的空谈,要用实际行动来向人民证明党能带领他们前进,不然就连最普通的工人都要取笑执政党。他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文化任务,是消化那个应该而且能够得到贯彻的政治经验。……我们应当做的正是这件工作。提高文化水平是最迫切的

任务之一。”^{[1]205-206}这里列宁强调要通过文化任务的解决来消化政治变革,因为在政治变革初期,党只有对人民群众许下了承诺,人民才会跟着党一起前进。但在取得政权后,作为执政党,如果不能及时兑现承诺,那么人民就会说“滚你的吧!”“那就走开吧!”(列宁语)。1922年,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闭幕词中说:“现在全部关键在于,先锋队要不怕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要不怕公开承认自己素养不够,本领不大。全部关键在于,现在要同无比广大的群众,即同农民一道前进,用行动、实践和经验向农民证明,我们在学习并且一定能学会帮助他们,率领他们前进。”^{[2]137}这是列宁最后一次出席党的代表大会,针对“敌人”喋喋不休地指责俄共(布)在衰老,党的头脑和整个机体在丧失灵活性的批评所进行的回应。在他看来,国际国内的形势逼迫着党必须率领人民前进,而党要承担起如此重任就必须获得文化。列宁上述的论述强调的是,执政后的共产党要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以实际行动带领人民前进,否则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

2. 提高文化水平是治疗官僚主义的良药

俄共(布)通过急剧革命的方式取得了执政地位。在执政过程中,列宁对官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执政初期,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权体现为人民当家做主,彻底铲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奥吉亚斯的牛圈”,并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1918年4月,俄共(布)第一次提出工作重心转移时,列宁只是零星提及到官僚主义,并且认为只要苏维埃同人民相联系,采取多种多样自上而下的监督形式就能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到了1921年,列宁对官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转变,特别是在《论粮食税》中,回顾了党对官僚主义认识的变化。他指出,在1918年5月5日,官僚主义还没有引起党的注意,党也没有感觉到这个祸害;又过了一年,

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党已经充分认识到官僚主义的复活,并在党纲中直率地提出要同这种祸害作斗争;又过了两年,党对官僚主义“这个祸害看得更清楚,更明确,更严重了”^[4]。他还说:“我们所有的人都陷在‘各部门’的官僚主义臭泥潭里。”^{[1]404}“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5]官僚主义显然已成为共产党身上的“脓疮”,列宁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为它进行了深度的病理分析。在他看来,这三者都是造成官僚主义复活的原因,但经济、政治属于显性的,通过发展生产力和改革政治制度来纠正,是比较好的“治疗方案”,而文化则是隐性的,需要长时间的教育、引导才能有所提高,但是文化是“治根的”。正如列宁所言:“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是任何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革都无法治好的毛病。说实在的,这种毛病靠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革是治不好的,只有用提高文化的办法才能治好。”^{[1]208}列宁为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开出的“药方”可谓是管长远、管根本的,只有作为先锋队的执政党文化水平和素质不断提高,深刻认识到官僚主义的危害,才能摆脱其对自身肌体的腐蚀。

3. 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是改善国家机关的必需

列宁认为,苏俄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因没有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机关应有的文化素养,表现出“令人厌恶”“非常可悲”的情况。1922年3月,列宁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了一个摆在党面前的文化难题。他指出,我们的力量是什么,缺少的是什么?政治权力和经济力量都足够了,“究竟缺少什么呢?缺什么是很清楚的: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2]97}。同年10月,他又指出,虽然资本主义各国有疯狂的竞争、千百万人失业,但同它们相比,苏俄必须不愉快地承认自身的文化水平低、

生产力不发达、工作本领差。对此,列宁强调要花大力气、切切实实地改善国家机关,而不是写几篇文章或者在文牍的汪洋大海中游荡。他说:“还要经过好多年,我们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机关得到改善,把它提高到——不是就个别人,而是就整个机关而言——更高的文化水平。”^{[2]252}1922年12月,列宁在有关讲话提纲中列出了苏俄国家机关的文化“糟透了”的情况。他写道:“国家机关的一般情况:糟透了;低于资产阶级的文化。问题正在于整个文化,而提高文化需要好多年。”^{[2]329}在他看来,苏维埃的国家机关以“令人眩晕”的速度从沙皇制度转变过来,对旧制度中存在的精华与糟粕没有进行认真的辨别,只是匆忙地接过来。鉴于此,列宁在考虑国家机关改革的措施中,突出强调提高文化水平的重要性。他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就指出,党和国家机关内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少得可笑,为此,“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2]384}。在这里,列宁强调国家机关的革新要通过学习学习再学习,使学到的东西真正深入骨肉,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才能算作是已达到的成就。这里蕴含的深意就是:要提高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和素养,因为只有文化才是存在并支撑人之生命的“血肉”。

三、反哺:执政党文化建设的目标指向

列宁认识到俄共(布)执政所面临的文化制约并非意味着他陷入了“文化宿命论”的漩涡。在他看来,正确认识到文化制约给执政党带来的危险就是执政党继续前进的力量所在。同时,他虽提出了“文化革命”“文化主义”等独特概念,但他并没有走入“文化万能论”的象牙塔,而是强调通过执政党的文化建设来反哺经济建设、政治变革,通过系统协调发展走向社会主义。

1. 文化建设与政治变革戚戚相关

十月革命作为一场政治变革取得的伟大胜利,为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胜利初期,列宁在《怎样组织竞赛?》一文中就指出,革命不可能立即在世代都处于贫穷落后、受压迫的千百万农民和工人身上培养出能够识字、有组织能力等这些品质,“但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力量,它的生命力,它的不可战胜性,正是在于它激发这些品质,破除一切旧的障碍,摧毁腐朽的桎梏,把劳动者引上独立创造新生活的道路”^[6]。后来,列宁在和蔡特金的谈话中再次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说:“红十月为最大规模的文化革命开辟了宽广的道路;在已开始的经济革命的基础上,正在实现文化革命,二者经常互为作用。”^[7]这里,列宁揭示了政治变革与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即政治变革为文化革命开辟了道路,文化革命要清偿政治变革欠下的“债务”。1923年1月,在《论合作社》中,列宁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说:“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2]372}在第二国际的所谓理论家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看来,俄国革命偏离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必然会给国家文化带来灾难。而在列宁看来,他们根本不懂革命的辩证法,即政治变革与文化革命可以互为前提,在实现了政治变革后,要用文化建设来消化政治变革的成果,偿还其留下的“文化债”。

2. 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连

在人类发展进程中,任何一种新型文明的诞生、成长、成熟无不与经济密切关联,都是经济与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列宁在革命活动早期,在分析俄国资本主义文化时,就已经注意到商品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文化力量,在执政过程中,他也强调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

1920年2月,列宁在全俄国民教育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文化工作,包括宣传工作、教育工作等,应当同农民最直接、最迫切的需要衔接起来,这样就能使文化不脱离经济。列宁还指出,要尽快抛弃掉已过时和错误的文化建设方法,特别是党内激进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提出的通过“实验室道路”创造“纯无产阶级文化”的谬论,这种方法如同“孩童时期的幼稚病”,必须尽快根治。在列宁看来,文化工作只有“紧紧地同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才会把文化和知识的普遍提高同迫切的经济需要联系在一起,结果,我们就能使工人群众对教育的需要增长百倍”^[8]。随着实践的发展,列宁进一步认识到,文化贫困对“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有着严重的制约作用,他说:“着手执行的任务之巨大同物质、文化之贫乏这两者极不协调。”^{[2]67}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再次阐述了文化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合作社是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广大农民由于没有文化,不能正确认识到合作社的好处。为此,他强调通过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来促进合作社发展,“我们要做的事情‘仅有一件’,就是要使我国居民‘文明’到能够懂得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一切好处,并参加进去”^{[2]368}。可以看出,列宁在其执政晚年更多地强调了文化对经济的反哺作用。

3. 文化建设是建成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

列宁认为,开展文化革命的目标指向,是要俄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他看来,文化建设是建成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没有文化革命的实现,建成社会主义就是空谈。1922年3月,列宁在有关信件中提出:“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2]67}在《论合作社》中,列宁说:“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

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但是在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2]372}这段话包含四层含义:一是文化革命是苏俄成为完全社会主义国家的先决条件;二是文化革命不仅是指精神文化层面,还包括物质文化层面;三是文化革命与自身内涵的两个要素(文化要素、物质要求)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即物质基础的丰富有助于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文化水平的提高要求物质基础的丰富;四是完成这些任务对于执政的俄共(布)来说都是非常艰巨的。

列宁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建设、政治变革、经济发展是内在于社会主义有机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相对于政治变革和经济发展而言,文化建设则更具重要性、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它的最终成效关系着苏俄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鉴于此,列宁强调要通过文化革命来提高全党全社会的文化水平,反哺苏俄政治变革与经济发展,最终目标指向是建成社会主义。

四、当代启示

列宁关于执政党文化建设的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如下重要启示。

1. 以自觉为前提

自觉是有意识的主体对自身存在状况的前提性认识,这种前提性认识是主体实现自我解放与自我发展的一种前瞻性反思,即发挥“自知之明”的作用。列宁在领导俄共(布)执政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文化建设对建成社会主义的重要性,毫不避讳地直言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存在着严重的旧习气,没有管理的本领,不会做经济工作。同时,列宁指出,由于文化落后,致使党内拖拉作风、官僚主义等腐败行为不断滋生。这些思想启发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对自

身的文化状况有清醒的认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大会上指出,要着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增强党的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能力,关键在于党自身的建设,而要担负起党的伟大任务需要高素质的干部。因此,他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快知识更新、加强实践锻炼,使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跟上时代节拍,避免少知而迷、无知而乱,努力成为做好工作的行家里手。”^{[9]45}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提出的“加快知识更新、加强实践锻炼,使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跟上时代节拍”,表明在党的领导干部中还存在文化水平跟不上时代变化的现象。他还说:“与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相比,与党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比,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组织建设状况和党员干部素质、能力、作风都还有不小差距。”^[10]这些论述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文化状况存在不足的觉醒。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要增强紧迫感、使命感,使党能够在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2. 以自信为根基

自信是发自于内心的自我肯定与相信,但有自信决不意味着成功,更不等于自傲和自负。列宁在领导俄共(布)执政过程中,意识到了党所面临的文化制约,但这决不意味着他陷入了“文化宿命论”的漩涡。在他看来,认识到文化制约给执政党带来的危险恰恰是党继续前进的力量所在,文化水平的提高将有助于执政党克服官僚主义,改善国家机关状况,更好地带领人民前进。这些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镜鉴意义。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有关讲话中提出“不忘初心”就是要坚持“四个自信”。他说:“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9]36}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四个自信”,并明确提出“文化自信”是其他三个自信的基础,其旨趣是要强调文化建设对于我们党长期有效执政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最有理由自信,源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源于党在长期革命中形成的革命文化,源于党在领导改革开放中形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3. 以自强为担当

自强是中华民族血脉中的基因,是中国人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和不懈追求。列宁在领导俄共(布)执政过程中,强调文化建设、政治改革、经济发展是内在于社会主义有机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文化革命看作是建成完全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这些思想启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勇于肩负起文化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任,为完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做出文化上的贡献。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要求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为实现这一目标共同努力,不断提高文化建设的科学化水平。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10]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调研时的讲话中也指出:“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依靠知识。”^[11]这里的“依靠知识”从广义上来说就是依靠文化,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9]339}。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文化是力量、文化软实力关系“中国梦”的实现,都是在强调共产党人要有自强的担当精神,让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丰富完善发展增砖添瓦。

总之,文化是人独有的生命元素,没有文化

的浸润和滋养,人的本质就难以凸显。执政党建设更是如此,迫切需要文化的力量。从历史、时代、实践、执政的要求,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相关论述可见,明确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文化思想逻辑。这一逻辑的时代背景虽与列宁所处的历史、时代、实践、执政等背景有别,但其思想精髓是一致的,即执政党必须对本国的文化要有“明确自觉、坚定自信、实现自强”的逻辑认知。执政党只有拥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坚定的文化自信,才能担负起实现文化强国的历史重任,更好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筑中国梦。

参考文献:

- [1] 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 列宁.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3] 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54.
- [4] 列宁.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18.
- [5] 列宁.列宁全集:第5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88.
- [6] 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09.
- [7] 上海外国语学院列宁著作翻译研究室.回忆列宁: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65.
- [8] 列宁.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84.
- [9]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10]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0.
- [11] 习近平.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4-30(02).



引用格式:西奥多·阿多诺,[翻译]蓝江.马克思与社会学理论的基本概念[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1):29-35.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0.01.004

文章编号:1009-3729(2020)01-0029-07

马克思与社会学理论的基本概念

Marx and basic concepts of sociology

西奥多·阿多诺,[翻译]蓝江¹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Translator]LAN Jiang¹

1.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通过对波普尔的攻讦,阿多诺批判了整个实证主义将社会还原为自然模型的主张,同时也区分了以概念杂糅现实的唯心主义学派,并指出,在辩证法之下概念本身就是事实,概念客观性的现实根基正是当下政治经济学的交换关系。在商品—市场关系的交换活动中,使用价值丰富的质被现实抽象为同一性的价值,交换价值成为物自体,进而形成商品拜物教,这不是假象而是极端的事实,是商品经济的客观机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结构,而这才是意识形态的真正来源。由此,阿多诺指出,马克思的天才在于进入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着眼经济,批判异化和权力起作用的社会机制。

关键词:
阿多诺;
马克思;
社会学;
基本概念

[收稿日期]2019-11-12

[作者简介]西奥多·阿多诺(1903—196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主要代表人物,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人,其代表性著作有《启蒙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等;蓝江(1977—),男,湖北省荆州市人,南京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

[译者导言]这篇文章是西奥多·阿多诺在1962年夏季班的一节课的讲课笔记,做笔记的人叫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Hans-Georg Backhaus)。这份课堂笔记并没有被收录在西奥多·阿多诺的文集里,而是收录在巴克豪斯自己的著作《价值形式的辩证法: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研究》的附录中。这篇笔记可以使我们深入了解西奥多·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和其对于马克思思想的认识。

波普尔的“社会唯名论”:在波普尔看来,法律概念差不多等同于反复发生的事情的规律性。事实上,法律概念涉及到一个特殊程序(Ablauf),用它本身的结构将其法典化。对于实证主义来说,关键在于,从科学上具体体现出劳动分工,实证主义者因此也拒绝了法律概念。例如,波普尔认为,历史文献不可能验证法律的概念。在这里,历史文献是孤立的。马克思被贬低为“经济主义者”。有一些自以为是的认识和观点,认为如果马克思可以被轻易还原为经济主义者,那么马克思就会声名狼藉。要考察这些条件,因为正是这些条件导致了让经济逐渐不依赖于概念关系。我们需要从社会动力学角度来演绎出这种不依赖性。

波普尔说马克思是“本质主义者”。马克思自嘲地说自己是打着黑格尔旗帜的“唯名论者”。然而我要说波普尔是对的,因为在马克思那里,结构概念是自主的,没有这种自主性,我们就不能思考社会的多样性,然而波普尔在根本上很敌视理论。一旦放弃了概念的自主性要素,也就否定了理论的可能性,那么理论就会被某种需求所取代,即社会学被看成是社会的某种代表,给出了一些有序的事实,而在各种主流实践活动中,都用得到这些事实。

波普尔究竟是从哪里得出了“开放社会的需要”?毕竟,这就是一个普通概念,就像手枪的射击一样。在这里,“开放社会的需要”就是

一个相当朴实无华、未加任何思索的普通概念。对于个别的人的存在来说,“人性”就是普通概念。

社会唯名论的问题:启蒙运动认识到越来越多的普通概念就是由我们生产的。人们希望通过这些由我们生产的“似自主性”的概念来思考。正是人生产了看似自主的一切,才有了习俗性,而不是自然性。波普尔指责马克思和黑格尔保留了拜物教这一过时的概念,但没有意识到那些不经于意识中介的所有事实。

不要讨论这样的普通概念,即已经废弃了其外在规定的概念。社会的形象常被还原为事实,也就是说,被还原为个别人的产物,对他们来说,这些东西就是事实。与此同时,人类构成了超越个别和具体行为的联系,于是这些被认为是原初的事实,实际上本身也是被中介的。它们直接向我们呈现出来,仿佛它们是绝对原初的(也是最真实的),即便它们包含了一个未被中介的直接整体。波普尔并不反对对制度的经验研究。不过,当我谈论本质的时候,波普尔却认为本质是概念上的神话。当我将我们社会的结构看成广泛的总体的时候,实证主义者会说: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存在广泛的总体,我们的社会是多元的。于是我会说:是否真是这样,即概念是认知主体添加在物质之上的东西吗?或者说,在我们所面对的客体中是否存在着像概念一样的东西呢?在这里,我提出的是最核心的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会让法兰克福学派区别于所有其他的社会学传统学派。交换本身就是一个抽象过程,无论人类是否了解,当他们进入到交换关系中将不同的使用价值还原为劳动价值时,他们就会让一种真实的社会性的概念操作成为现实。这就是实践中的概念的客观性。这说明概念不仅存在于哲学家的心中,也存在于客体本身的现实之中,这样,当我们谈论本质的时候,我们恰恰指的是在社会中

已然自在存在的东西,尽管它对此一无所知。如果我们触及这些事实,那么我们自己就会遭遇这些概念。我们不得不面对在对象本身中的概念的重现,而不是反过来让客体从属于有序的概念。当波普尔谈论到异化、抽象时,他已经接近于这个要素了:即抽象之下的人类存在之间的关系。概念不是拜物教,相反,在辩证法之下,概念嵌入到事实当中。概念结构本身就是事实。

自然科学也有着不具有意识的对象。如果对于那些实现抽象的主体来说不是如此,即这些主体也不是思考的主体,那么,客观的概念性就不会出现。客体并不直接是主观的,而是在抽象过程中被认为是必然的客体之中的主观物;客体绝不是自足的,然而,我们不应该认为它是绝对的,因为存在着第二自然因素,对于我们来说,这会强化某种不明确的东西。社会有着非常高的地位,看起来仿佛社会就是第一自然。社会让实证主义者变得盲目,让他们将第二自然当成了第一自然,将社会的数据等同于自然科学的数据。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法兰克福学派与世界所有其他的社会学传统学派相对立。

当我们说概念性因素位于客体之中时,并不意味着社会建立在某种概念性事物的基础之上。在没有概念性因素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达成交换关系。这是一个抽象过程,它用抽象概念的同—性将同一性与同一性关联起来。否则,非理性就会主导社会。计算方程奠定了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差异的基础。即便个别人没有这种绝对交换的观念,在客观上,他们仍然从属于这一个抽象过程,这个抽象过程将他们还原为同一性,并让他们等同于概念因素的客观性。这与人们是否反思这个问题无关。相反,这种概念因素的权力越大,人类就越不会去反思它,越囿于客体本身之中。因此,概念就是客

体本身,而不是在概念之下理解客体的诸特征的主观统一体。

这种概念的客观性完全不是方法论意义上即概念实在论所意指的客观性,相反它包含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唯名论。交换关系中的概念性本身就是事实性。不过,这里存在着某种客体相对于概念的优先性,同样也存在着唯名论相对于实在论的优先性。当我们说概念和事实都是要素时,并不是说两者拥有同样的地位,或者一方有着相对另一方不容覬覦的支配地位,而是说,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会堕入某种神话之中。

马克思指责黑格尔做出了一个断言,即操作、功能和主体。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说法,他不是按照客观结构,他是一个纯粹的唯名论者。可以肯定,黑格尔曾说,国家概念在历史上优先于社会概念,人类首先遭遇的社会就是国家。再说一遍,黑格尔在《法哲学》中所使用的方法,就是社会通过自身的辩证法最终走向国家,即国家是社会的产物。

马克思的思想完全是反人类学、反心理学的。马克思的真正兴趣在于泯灭了人类的人性的制度,没有给出对人性的深刻分析,相对于历史存在而言,这种人性分析是肤浅的。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理解是有问题的。不过,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恢复了概念的客观性,尤其是相对于黑格尔左派而言的概念的客观性。

人类就是不断再生产自身生命的存在物。人类通过自己、通过社会劳动而成为人类。人类只需要通过社会劳动的各个阶段就能获得人性的概念,即真正的自由的人性。

马克思将精神概念归咎于黑格尔,认为黑格尔的精神概念脱离了存在的物质范围。在黑格尔那里,精神被描述为一个总体,劳动的各种规定绝不是与之相分离的知识原理。黑格尔认为人性是与自然的搏斗,但他将这种整体的运

动解释为一种精神运动。然而,劳动中的各种要素包括物质性要素,并不只是孤立的精神的活动。奴隶不是知识分子,精神仅仅只存在于主人与奴隶之间所展现的一般关系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比起马克思,客观性在黑格尔那里有一种更为确凿的意义,因为这是体制社会在面对自由社会时所无法消化的残余。

(阿多诺:这是本学期最核心的理论课)在马克思那里,政治经济学批判究竟意味着什么?(1)对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批判;(2)对经济本身的批判,即批判自由主义的自我理解(尤其是在《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中),以及对自由主义本身的批判。马克思最关心的是对自由主义的内在批判。在东方国家里,马克思为权力关系的利益服务,这种马克思属于低俗文学的范围。在西方国家里,有人认为(译者注:这里影射卢卡奇),马克思的理论是建立在无产阶级主体的阶级意识的前提之上的。这恰恰是不得要领的说法。自由理论所面对的是当它处于交换行为之中时的自我诉求:“你们说交换了等价物,也就是它是自由的可以交换的,我用你的说法,现在我们要看看,这是如何颠倒过来的!”这就是对自由主义的内在批判。

也有人察觉到了人成为商品这一事实。马克思曾说:“应当对这些僵化了的制度唱一唱它们自己的曲调,要让它们跳起舞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我们不是要用另一种东西来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问问这个社会是如何适应于自己的规则、如何按照自己所宣称的规律行动的。现在,马克思并没有说这是错的,他慎重地使用了辩证法,但给人玩弄辞藻的感觉。在交换中,某种是同一的,但同时又不是同一的,就是如此,但同时又不像表面上看那么简单。自由主义的理论在遵循其概念的同时也与之相矛盾,借此来适应它的概念。实际上,交换关系是由阶级关系来展现的,即生产

方式不平等的掌控,这就是该理论的核心。

在今天对马克思的讨论中,这个问题几乎没有什么价值。通过让各种说法面对各自的对象,从这种矛盾中演绎出其发展趋势,批判借此来考量各种说法。晚期的马克思会说,这种方法仍然太过抽象。

发展的各个舞台在发展之后,彼此都有着性质上的不同。正如在黑格尔那里一样,发展存在着节点。相反,罗斯托(Rostow,译者注:全名是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美国自由派经济学家)并不承认任何结构在性质上有根本差异。对罗斯托来说,两个不同阶段只是量上多少的差别,而没有性质上的差别。马克思并不是经济史学家,历史和系统的要素都是被中介的,逻辑上历史过程本身也被看作是一种从一个结构到另一个结构的必然过渡。马克思自己的学说区别于那些国家学说,马克思也区别于那些描述出不同阶段的历史学家。概念完全是历史化的概念。在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的理论框架下,这个过程在形式上是观念论的,它是概念的自我实现过程。这样,就出现了双重拒绝:既拒绝了永恒的观念论,也拒绝了描述性的实证主义。

交换价值体现了商品的特征,但并非是需求构成了商品。商品价值不是源于需求,而是源于生产的客观条件,唯有在后一种情况下,需求才是其中的一个要素,即一种消除了物质内容的利益中介了的需求。这就是源于体制、实际的权力关系、控制关系,而不是源于需求的客观理论的特征。“你们总是用需求来解释经济学,相反,经济并非一开始就满足需求,而是用最大的牺牲、体制在最恐怖的碾压性力量下的满足。”需求只是后续出现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说经济学一定不是源于需求,因为世界并不是按照我们的需求来运转的,需求只是一个衍生现象。

关键在于,生产机制相对于需求来说具有优先地位。必须反对如下的反对意见,即马克思所描述的现象是他的主观表达。

马克思的方法是通过大量分析逐步抽象出来的。在这里,我关注到了一个问题,即这是否与马克思的辩证法相符合,或者说是否马克思已经践踏了辩证法原理。

让商品成为可以交换的东西,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统一性。因为抽象劳动将一切还原为“一”,而这个“一”是从使用价值、从需求中抽象出来的。当一个商人算计的时候,他考虑的既不是在何种条件下会生产出某种商品,也不是这种商品会给他带来什么好处,而是劳动时间、利润和物质(材料)。这就是构成商品的东西,即让商品成为某种固定的像物一样的东西。通过抽象劳动时间,从各种活生生的对立面中抽象得出了“一”。在面对商品的时候,这样的抽象让被交换的东西成为了物自体。事实上,社会关系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物的客观性质的总和。商品拜物教的概念就是通过这种必然的抽象过程而获得的。在展现了交接关系的抽象过程后,商品不再是一种社会关系,而是看似物本身所带有的一种价值。

交换对于社会来说仍然十分关键。这就是以交换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特征——其中,存在着人类之间的关系——这种特征消失了,将自身展现为尚未交换的物本身所具有的性质。这并不是拜物教化的交换,而是商品交换。这就是凝结在商品之中的社会关系,看起来像一种自然属性、一种物的自身存在。幻觉并不是交换,因为交换被代替了。在交换过程中发生的幻觉在于剩余价值概念。

然而,拜物教式的感觉并不是幻觉,因为尽管人类事实上依赖于这些客观性,但对于人类来说,这些客观性却非常模糊。物化不是一种错误意识,而是现实,因为商品本身与人的关系

是异化的,我们真的依赖于商品世界。一方面,商品拜物教是幻觉;另一方面,它是终极的现实——物化商品相对于作为这一见证的人而言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幻觉的范畴实际上就是真实的范畴,这就是辩证法。

一旦我们从主观范畴上来考察,像商品的拜物教特征之类的概念都是可以得到理解的。在这里,我并不是说商店里的商品向人类散发着魅力。这并不是心理上对个别商品的崇拜,而是商品经济的客观机制。在交换价值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必然会产生这种崇拜。最关键的是,作为社会关系的商品消失了,物化意识的所有其他的反作用都是次生的产物。

可以肯定的是,商品就是意识形态的原型,不过商品本身不仅仅是错误意识,而且也源于政治经济学的结构。这就是意识是由存在决定的原因所在。关键在于,经济形式的客观结构是由内部的自我崇拜来实现的。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客观过程——不依赖于个别人的意识和意志。意识形态理论唯有在如下条件下才具有价值,即错误意识本身看起来像是一个将社会凝聚起来的客观过程的形式,通过这种意识形态,发生了社会化过程。在这里,意识形态问题变得十分重要。即便我们是通过幻觉来理解,这也并不会改变商品的拜物教性质。所有商人都会按照这种拜物教来进行算计。如果他不这样算计,他就会破产。

货币也是劳动凝结的象征,它不是物自体。这样,金融过程就不是原初过程,相反,金融关系必然起源于政治经济学。

一旦交换价值独立出来,那么我们就将它作为某种物自体来追求。这就是交换价值的物化,这就是 $M - C - M'$ 公式所表达的东西。

关键问题:剩余价值从何而来? 流通领域是次要的。剩余价值已经包含于其中了。在流通领域中,资本家谋求剩余价值,然而,这种剩

余价值已经被生产出来了。

劳动力是剩余价值的来源,因为它同时也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来源。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工人是自由的,因为他可以从一家工厂换到另一家工厂。

价值本身被定位为社会劳动的产物,因此,机器不生产价值。将机器回溯到劳动这里,是因为机器本身也是人类生产出来的。资本家谋求绝对剩余价值,但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坏人。马克思和黑格尔一样,都不熟悉心理学。马克思的“人物面具”理论包含了角色概念。唯有在这里从客观条件出发,结构才会将角色施加在主体身上。今天——正如帕森斯所说——并没有对角色的反思,只有角色概念本身的绝对化。我十分怀疑角色概念,其真实原因是,它不能被理解为这一过程中的必然要素,相反,它是凸显出来的独立要素。

辩证法的精要:资本家是被迫积累剩余价值的。于是,他们不得不改进机器,为的就是用死劳动来代替活劳动。倘若并非如此,他们就要竞争。在这里,流通领域的要素影响了生产领域。然而,因为他们是被迫的,资本家创造了不再需要资本主义经济链条的生产力的条件。他们因此创造了一种反对他们自己的力量,越来越多的劳动获得自由,因此也创造了危机的条件,也不断地为体制本身制造威胁。为了维持其体制,资本主义社会就必须不断地生产出这样一些要素,它借助这些要素不断地摧毁其自身的可能性。自发性的目的就是掌控这个过程,因为这个过程倾向于摧毁整体,其目的是将这个整体转换为一个更高阶段的生产方式。然而由于其本身是盲目的,辩证法也创造出另一种生产方式的条件。如果不能增加自由的要素,那么留给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就只剩下了毁灭。

永恒的不确定性是农业与手工业关系谋求

倒退的理由之一,这种不确定性有其根本原因。另一种转变是错误的:绝不能恢复那些陈腐的社会关系。

为了理解剩余价值概念,需要比较两个时间段:一个是劳动力生产必需的时间,另一个是工人在劳动中给出的时间。我们不要从工人生产的商品开始,相反,这是一个交换过程的问题:工人售卖他的劳动力,获得了与他售卖劳动力等价的东西。但他给出的时间和他用于劳动力再生产的时间是不同的。一方面,交换是以等价物的形式发生的:工人给出了劳动时间,反过来他获得的回报是用来再生产出他的劳动力的东西。这就是剩余价值的来源,不用考察商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这是一个同一性与同一性的交换,同时也是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交换。这个关系背后伫立着的是整个阶级关系。这仅仅是因为,工人只有他自己的劳动力,所以他不得不接受这个条件。在这个奇怪的交换背后,就是阶级问题。

或许这样来说是有问题的,即主观理论无法从需求角度来解释商品经济的整个机制。当然,是可以从主观范畴来解释这一问题的——倘若我们已经概括出经济过程的形式上的蓝图。不过,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抽离于社会权势和无权无势的要素。并不是到今天,消费才被控制。今天有一种新的性质,在消费管制方面十分流行。在这种社会中,主体的消费并不是经济的关键所在,因为主体的消费可能性依赖于两个条件:(1)将整个经济体系当作一个整体,我们只能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消费;(2)消费依赖于当代的整个经济环境。

真正的对立并不在于经济过程的两个方面,我们可以更平实地表达出哪个方面,而是在于:什么样的理论可以更充分地描绘出人类阶级关系发生的现实。不考察消费者对整个系统依赖的程度,对于现实来说,都是不充分的。我

们可以证明,消费习惯的变化并不是来自于主体,而是一个客观过程,这个过程根植于社会的结构。这就是马克思不是从消费开始,而是从生产开始——生产可以理解为有产者的统治——来研究剩余劳动和它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原因。这种研究方法与现实保持了一致。

坐标系的选择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中立的。这种坐标系更善于让各种真实的关系表现出来。如果各种关系是斗争性的(如阶级关系),那么斗争也必须在理论上表现出来。

主观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对市场过程的分析,在这个过程中,既定的市场关系已经被设定好了。恩格斯十分正确地提到了德国哲学的遗产: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构成要素,通过这个要素,出现了剩余价值;这个问题也涉及到一个内在条件,通过这个条件,才能出现这个体系,而主观原则则试图十分雅致地概括出既定的存在过程。

与之相反,马克思并不关心对市场社会的描述,他研究的反而是经验的构成要素,并批判了这些经济活动的范畴。这个方法来自于构成问题,它非常深刻,它也表达了更多的社会现实。关键在于,是否能把握总体上的构成要素。构成问题已经出现在一个貌似真实的判断之中,这个判断涉及到出于抽象的目的对现实的割裂。主观经济学说在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护教论。对价格问题的分析只是对构成问题分析所衍生的一种现象。

一个批判:我们不可能终止异化现象,在原则上,异化是一种观念论范畴。然而,异化源于

经济的商品特征。我们不能在抽象中谈论权力,因为权力问题是通过人的物质生命的再生产来自我确定的。倘若马克思告诉我们的就是异化和权力问题,那么马克思就是一个黑格尔左派。但马克思想要批判的是,权力和异化是如何在具体社会中起作用的。

相对贫困的概念有点恶搞。没有一个工人他变穷了,正如舍尔斯基所说,那么我们从哪里才能得出阶级概念呢?

在马克思那里,技术概念并不明朗。这个概念来自于圣西门,而圣西门根本没有深入思考过他在生产关系问题上的立场。一方面,这是枷锁;另一方面,它们不断地改变,变成了生产性力量。这就是这个概念最令人疑惑的本质。

我们所看到的最大困难就存在于这个体系之中。马克思的思想中蕴含着整个问题的线索。我们处境的苍白恰恰在于如下事实,即这些问题都没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相反,更多的是从外部进行批判,而没有面对问题本身。一方面,这个理论在西方声名狼藉;另一方面,在东方,它却被高度崇拜。在东方,理论被置于一种禁忌之下;在西方,它被视为一种基本罪恶。关于社会的未来的思考以及我们是否能解决这些问题。马克思的天才恰恰在于,他满怀着义愤,去着手处置他发现的那些令人义愤的东西:经济。

对于那些认为社会主义必然会导致失去个性的反对意见,我们必须回答说,一旦个体不再受交换关系的支配,个性也就会随之消失。



引用格式:张铁山,刘盈君.论利维·维果斯基的社会建构主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1):36-40.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0.01.005

文章编号:1009-3729(2020)01-0036-05

论利维·维果斯基的社会建构主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On Levy Vygotsky's social constructivism thought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张铁山,刘盈君

ZHANG Tieshan, LIU Yingjun

信阳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摘要:利维·维果斯基是苏联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家,是文化历史理论的创始人,更是当今教学与学习理论中社会建构主义思想的先驱。维果斯基的社会建构主义思想的生成源于维柯、康德、杜威和马克思等人的哲学思想,以及皮亚杰、布鲁纳等人的心理学思想。在这些思想影响下,维果斯基创造性地构建起了由文化历史和心理发展理论、思维与语言的关系理论、最近发展区理论,以及支架式教学理论等构成的社会建构主义思想。他的这些思想对当代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

利维·维果斯基;
理论背景;
社会建构主义;
教育

[收稿日期]2019-07-26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2017SJGLX386)

[作者简介]张铁山(1967—),男,河南省长葛市人,信阳师范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心灵哲学与认知科学哲学。

利维·维果斯基(Lev Vygotsky, 1896—1934)是苏联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家,是文化历史理论的创始人,更是当今社会建构主义思想的先驱。维果斯基的社会建构主义思想,受到维柯、康德、杜威和马克思等人的哲学思想,以及皮亚杰、布鲁纳等人的心理学思想的影响。在这些思想影响下,维果斯基创造性地构建起了由文化历史发展和心理发展理论、思维与语言关系理论、最近发展区理论和支架式教学理论等构成的社会建构主义思想。维果斯基的社会建构主义思想是对传统的教育方式和教育理念的挑战和批判,对当代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鉴于此,本文拟基于维果斯基社会建构主义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通过深度挖掘其思想的核心意蕴,揭示其在当代教育中的独特价值,以期为推动当代教育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利维·维果斯基社会建构主义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任何一种思想都是在以往某种理论或思想的基础上产生和形成的。维果斯基的社会建构主义思想也不例外,它源于维柯、康德、杜威和马克思等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以及皮亚杰、布鲁纳等教育心理学家的教育心理学思想。

1. 哲学渊源

建构主义作为一种学习理论,其最早可以追溯到意大利著名哲学家维柯。维柯最早使用“建构”一词去描述个体知识生成的过程,认为人们能够清晰地理解自己建构的一切,并且认为,永恒的人性是不存在的,因为人类是通过历史和文化去创造社会、塑造自身的。维柯的这些观点对此后的建构主义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康德的以主体能动性为中心的批判哲学也对维果斯基的社会建构主义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康德认为,“我们心灵中的先天结构建构了我们所知道的知识”^[1],这种先天结构是表征人的认识能力的感性结构和知性结构,知识

的建构只限于感性和知性范围内,并通过“先天综合判断”而获得。康德的这种建构主义思想在认识论、知识观、认知结构和教育实践等方面都对维果斯基的社会建构主义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约翰·杜威的教育哲学思想也是维果斯基社会建构主义思想的哲学来源之一。杜威认为,经验的对象(经验的主体或有机体所面对的对象与环境)和经验的过程(主体对对象所起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其核心是经验者主体在有目的选择对象基础上的主观“建构”。杜威特别强调经验的能动性和情境化,认为“认识范式不仅是个人经验建构的产物,更是人在经历社会环境和社会经验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一个环节”^[2],知识和思想只能形成于情境尤其是社会背景之中。在这种情境中,学习者必须摆脱自己原有的经验去创建学习共同体并在其中建构自身的知识和认知技能。

维果斯基的社会建构主义思想也受马克思的影响。维果斯基关于人类实践活动作用的论断,受到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影响。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3]这一观点对维果斯基有直接影响。受此影响,维果斯基指出,劳动在儿童智力发展过程中起到特殊的作用。另外,维果斯基的“社会世界是人类思想的源泉”的观点也受到马克思“不是人的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领域”^[4]这一观点的影响。

2. 心理学渊源

维果斯基的社会建构主义思想除受上述哲学思想影响外,还受到皮亚杰和布鲁纳等人的心理学思想的影响。皮亚杰认为,学习者的智力是学习者和环境二者相互作用并不断进行建

构的过程。在这个建构过程中,学习者把外界刺激所提供的信息整合到自己原有的认知结构中进行同化,与此同时,个体的认知结构因受外部刺激的影响而发生改变进行顺应。通过这两个过程,学习者的认知结构实现了与周围环境的平衡。作为1950年代认知革命的倡导者,布鲁纳将“意义建构”作为心理学的核心概念并试图去揭示人类特有的心理规律。在意义建构中,布鲁纳集中论述了文化环境对教育和人类智力发展的影响和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积极对话、积极建构知识的重要性。这些思想对维果斯基社会建构主义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利维·维果斯基社会建构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维果斯基在吸收和借鉴上述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建构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从认知者个体的外部环境和社会文化资源两个方面去主动地建构其独特的社会建构主义思想。维果斯基的社会建构主义思想主要包括文化历史和心理发展理论、思维与语言关系理论、最近发展区理论,以及支架式教学理论等。

1. 文化历史和心理发展理论

维果斯基将文化历史要素纳入到其心理学核心价值之中,开创了心理学研究的文化历史取向,其文化历史和心理发展理论主要包括心理活动发展观、高级心理机能论、心理工具论等。

维果斯基的心理活动发展观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人的实践活动的价值和作用的论断,认为“人的心理过程的变化与他的实践活动的变化是一致的”^[5],人的高级认知能力也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人生来就嵌入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并受其影响,在与该文化环境中他人的社会交往中,人的行为心理受制于社会文化历史发展和社会交往实践活动,逐渐发展出自己的新的行为系统。

高级心理机能论是维果斯基社会建构主义思想的核心。他认为,“一切高级机能都不是在生物学中形成的,并不是在纯种系发展的历史中形成的,作为高级心理机能基础的机制本身是以社会为模本的复制品。一切高级心理机能乃是内化了的的社会方面的关系,乃是个性化的社会结构的基础。它们的成分、发生结构、行为方式,总之一句话,它们的全部实质都是社会的”^[6]。因此,社会文化历史把人的高级心理机制引入到社会发展领域,并证实了社会文化因素或环境对人的高级心理机能发生和发展的影响。

心理工具论是维果斯基文化历史和心理发展理论中的重要观点。维果斯基指出,动物只能使用一种工具,而人则拥有两种工具:物质劳动的工具和精神生产的工具。其中,物质劳动的工具只是改变外部环境的工具,而人的精神生产的工具,如语言符号,才真正地促进了人的发展。维果斯基以W. 苛勒对黑猩猩使用工具的经典研究为例表明:动物的一些行为方式可以称作纯技艺的、相当发达的纯操作智力,但是与使用符号没有关系。但是,人的活动则不同。对于儿童来说,他们只是在语言开始发展之前,其使用工具的属性才与黑猩猩相似。只要言语和符号的使用达到一定程度,儿童使用工具的方式就会被改造。从儿童借助语言掌控环境开始,他们就开始学习社会行为,产生全新的行为组织形式,与环境建立起新的关系。另外,人制造和使用物质工具和语言符号工具也随着个人的主观经历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并通过个人经历和社会文化环境的“棱镜”折射出来。

2. 思维与语言之关系理论

对思维与语言之关系的论述是维果斯基社会建构主义思想的又一主要内容。维果斯基指出,“思维的发展与言语的发展并不对应,它们的两条发展曲线是交叉的。这两条曲线可能会变成直线,齐头并进,甚至在某个时期会合并成

一条直线,但它们总是又要叉开的”^[7]。从种系发生来看,思维与言语在发生根源、发生方式和发生路线上是不同的,它们既彼此独立又相互交叉。维果斯基把言语的发展过程分为原始或自然阶段、幼稚的心理阶段、外部符号阶段和内部生长阶段。这4个阶段表明,外部语言向内部语言的转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动态发展过程中,说话者的语言是由内部语言向外部语言转化的,而听话者的语言则是由外部语言向内部语言转化的。因此,思维与语言之间存在着一个由外向内、由内向外的动态循环的非线性变化过程。

3. 最近发展区理论

作为维果斯基社会建构主义思想的精髓,最近发展区理论认为,实际发展水平与潜在发展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5]86},其中,实际发展水平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现有水平,而潜在发展水平则是儿童在成年人指导下或同伴的帮助下解决问题的水平,这两个水平之间存在的差距就是每一个人的“最近发展区”。对于同一个人来说,他/她的最近发展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交往实践和社会认知能力的提高而不断变化的。学习者对社会性的参与活动渗透自己的认知和理解,并通过将这些认知和理解与自己的知识经验整合起来,构建起自己的新思想和新认知。因此,“最近发展区”理论不仅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而且表征了个人认知能力是不断发展的。最近发展区理论认为,在教学中师生关系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教师在这个过程中给学生提供学习的“支架”,通过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最终让学生增加对学习的兴趣。基于此,最近发展区理论认为,教学的重点不是关注学生已经掌握了什么,而是要看学生能够掌握什么,从而实现学生最近发展区的发展。

4. 支架式教学理论

支架式教学理论是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在教学理念和教学策略中的具体体现。

“支架”原意是架设在建筑物外部、用于帮助施工的一种设施。这里的“支架”主要是指对学生问题和意义建构起辅助作用的“桥梁”。

支架式教学理论认为,教学活动是通过搭建“支架”、创设问题情境、独立探索、协作学习和效果评价这几个环节完成的。其中,搭建“支架”是判断学生现有水平的重要步骤,可以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从不同角度搭建认知支架、情感支架、能力迁移支架等。创设问题情境是教师通过一定的手段,将学生引入一定的问题情境中,使学生已有的经验与新的问题情境产生矛盾,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独立探索是通过撤离“支架”,使学生逐渐增加对问题的自主探索,最终完成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和自我探索的任务。协作学习是教师为学生建立一个进行信息共享和交流的平台,培养学生参与和合作的精神。效果评价包括老师对学生的评价、学生的自我评价和学习小组对学生的评价。支架式教学显然有助于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教学,使学生获得预期知识和技能,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和兴趣,从而减少学生学习的挫折感。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维果斯基的社会建构主义思想强调知识的社会建构和环境与文化对人的发展的影响,重视文化情境的创设和高级心理机能的培养、人的潜在能力的提升,以及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过程中的对话和合作。

三、利维·维果斯基社会建构主义思想在当代的价值

维果斯基社会建构主义思想丰富、发展了当代儿童教育学和心理学思想,为当代教育学和心理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对于当代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1. 利维·维果斯基社会建构主义思想在当代教育理论中的价值

其一,维果斯基的文化历史和心理发展理论为当代儿童教育学和心理学发展理论注入了

文化和历史的“因子”。从教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维果斯基的文化历史观打破了传统的心理学思想单纯从生理的角度寻找心理发生原因的做法,给当代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思想增添了文化因素,扩展了当代儿童教育和心理研究的空间,使文化在教育学和心理学中释放出它自己的魅力和动能。

其二,维果斯基的思维与语言之关系的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对教育心理学中“学什么”问题的思考,而且从一个侧面解释了文化生成的符号系统在人类思维发展中所起的中介作用,有助于我们对教育学和心理学中的教师作用、教学方法有关“怎么教”的问题进行系统评价。对于“学什么”的问题,维果斯基的思维与语言关系理论不但关注人类学习有别于其他动物学习的社会特性,而且更加关注个人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通过语言符号这一中介工具发展自己的机能性系统。对于“怎么教”的问题,维果斯基的思维与语言关系理论更加关注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和语言符号工具在教师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中的作用,凸显了其社会建构主义的色彩。

其三,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在关键概念上和发展观上为现代儿童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关键概念上,维果斯基通过最近发展区理论详细地阐述了社会背景在个体发展中的重要性,认为发展并非发生在个体内部,而是发生在个体与社会的交叉带上。此外,维果斯基凸显了文化历史因素将个体与社会沟通起来的“中通渠”作用。维果斯基最近发展区理论中的潜在能力和实际能力是最近发展区的两个关节点和临界点。维果斯基对这两个点的揭示,表明社会性合作活动促使未成熟的机能成熟,从而改变了个体的心理结构,实现了自身的发展。

2. 利维·维果斯基社会建构主义思想在当代教学实践中的价值

维果斯基的支架式教学理论打破了传统的

行为主义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对当代教育实践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指导意义。维果斯基的支架式教学与传统教学设计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摒弃了以教为中心、以教师为权威的课堂教学模式,并提供了一系列支持条件来帮助学习者主动建构知识。另外,这种支架式教学强调了教学应以学生为主,重在发挥学生的探究性、自主性、合作性和创造性。这种教学方法从实践教学上为建构主义在教学中的运用与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也为当代教育改革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总之,维果斯基的支架式教学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不仅有利于学生对知识形成双向建构,而且可以增进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关系;不但表征了教师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角色、地位的变化,而且也揭示了当前教学模式和方法改革的方向,具有重要的教学实践价值。同时,随着我国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推进,这一理论也必将在新的背景下不断充实、丰富,为未来的教育教学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 [1] 洛克摩尔. 在康德思想的唤醒下:20世纪西方哲学[M]. 徐向东,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4.
- [2] 刘华初. 杜威与建构主义教育思想之比较[J]. 教育评论,2009(2):147.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 [5] VYGOTSKY L.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
- [6] 维果茨基. 维果茨基全集:第2卷[M]. 龚浩然,译.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174.
- [7] 维果茨基. 思维与语言[M]. 李维,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0.



引用格式:孙炳炎. 莱博维奇的社会主义观探析[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21(1):41-49.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0.01.006

文章编号:1009-3729(2020)01-0041-09

莱博维奇的社会主义观探析

An analysis of Lebowitz's view of socialism

孙炳炎

SUN Bingyan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当代西方著名学者迈克尔·A·莱博维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作出了富有创造性的理论规划,并积极将之付诸实践。莱博维奇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将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界定为人的全面发展,认为它立足于“社会主义基本三角”之上。在莱博维奇看来,通往社会主义的路径只能是马克思的革命性实践,这种实践应该从现在就开始,这是工人斗争的过程,必须赋予思想观念的改造实践以重要使命。作为“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建构的旗手,莱博维奇在总结反思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充分肯定和赞扬查韦斯领导下的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同时提醒人们认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和阻力。

关键词:

莱博维奇;
人的全面发展;
革命性实践;
21世纪社会主义

[收稿日期]2019-09-26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TJKSQN19-001)

[作者简介]孙炳炎(1989—),男,河南省长葛市人,南开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不啻是一个决定现实社会主义命运的重大命题,正确地回答这一问题,能够引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呈现生机;反之,则会使无产阶级事业遭遇挫折、陷入低谷。迈克尔·A·莱博维奇是当前世界非常活跃、颇负盛名的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其著作《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被评为2004年马克思主义研究英语区最佳著作。莱博维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方法并切实地运用,对当代工人运动以及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形成了一系列独创性的观点和思想。难能可贵的是,莱博维奇并未陶醉于自身所建构的理论体系之中,而是积极地将之付诸实践。作为已故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理论顾问,其理论对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产生了直接和重要的影响。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

与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相径庭的是,莱博维奇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坚信马克思“两个必然”的判断,孜孜不倦地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并努力寻找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莱博维奇认为,人们习以为常的这句格言——如果你不知道你想去哪里,那么任何道路都会把你带到哪里——已经被近年来新自由主义、帝国主义的暴行和尽全力创造一个替代性选择的虚拟破坏等实践所颠覆,“我们的经验显示:如果你不知道你想去哪里,那么就不存在到达的道路”^{[1]43}。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其最终理论旨趣是通过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特殊发展规律的揭示,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提供一种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途径。然而,如果不能确定未来的理想社会是什么,正确的道路便无从谈起。因此,在莱博维奇看来,

马克思主义必须首先回答“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是什么”的问题,只有我们具备了关于这个“更好世界”的知识,才有可能将其付诸实践。莱博维奇将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定义为一个允许人的潜能充分发展的社会,“每个个体都能够发展他自身全部潜能的社会”^{[2]13}。社会主义的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任何阻碍这一核心目标实现的因素都应该被扫除。基于这种认识,莱博维奇认为,人类未来的理想社会至少应该满足以下两个基本要求:其一,它以每个个体自身潜能为尺度,为其充分发挥提供相应的机会和条件,注重差异性,“由于我们不是完全相同的,我们自身发展所需要的东西也就各不相同”^[3];其二,它尤为强调覆盖范围的全面性,不舍弃任何一位社会成员,“简而言之,我们的目标不能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一些人能够充分发展他们的能力,其他人则不能”^[3]。

以人的全面发展来描述人们所憧憬的“更好世界”,莱博维奇认为并非自己的首创,而是直接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是第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科学纲领的“最初版本”,得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全体与会代表的肯定。针对“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什么”这一问题,恩格斯写道:“把社会组织成这样: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4]373}在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完成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的“最终版本”《共产党宣言》中,这个目标被表述为:“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422}近半个世纪后,当朱·卡内帕请求恩格斯用简短的一段题词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时,恩格斯作出如下答复:“除了《共产主义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我再也找不

出合适的了。”^{[6]647}恩格斯所提供的简短文字正是上面《共产党宣言》的那段话。可见,若从肯定的角度出发,以人的全面发展来描述社会主义社会的确再合适不过了。莱博维奇还将人的全面发展溯源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认为它“是马克思关于人类财富观的根本”^{[7]277}。在莱博维奇看来,马克思的财富概念应该从资本和工人的双重视角加以界定。对资本来说,财富是价值、剩余价值,是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货币是其一般表现形式,生产资料是其特殊表现形式。对工人来说,财富是使用价值,即只有满足工人某种需要的物,才是工人意义上的财富。据此而言,“财富从物质上来看只是需要的多样性”^{[8]524},“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8]479},财富的增长就是需求的增长,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和“个人的最丰富的发展”。莱博维奇得出的最终结论是:“马克思提出的实际财产理论之核心在于‘丰富的人’的概念。‘丰富的人’是指人类的能力获得充分发展以致能够‘达到全面的满意’。”^{[7]181}

1990年代末所发生的“苏东剧变”无疑是社会主义遇到的一次巨大挫折,世界各地都有人将此视为社会主义失败的证据。然而在莱博维奇看来,以苏东剧变为论据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无法立足的,“存在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曲解——一种忘记了人的曲解,一种以生产力为中心的思想在‘由特定经济体系所决定的人的本质’问题上沉默的”^[9]。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强调的人及其全面发展并未在苏联模式中发生,“人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缺失的核心’”^[10]。真正要复兴社会主义,就应该紧紧围绕这一核心,将社会主义概念转化为一个有机的体系,保证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莱博维奇提出,位于这一有机体系核心的是三个关键要素,它们共

同建构起稳固的“社会主义基本三角”:(1)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2)工人组织的社会生产;(3)满足公共需要和公共目的。

在社会主义有机体中,只有让生产资料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掌握,才能保证社会公共活动及其成果最终导向所有社会成员的自由发展,而不是用来满足资本家、个别团体或政府官僚的私人目的。莱博维奇着重强调,社会所有与国家所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决不能将前者等同于后者。国家所有并非“自动地惠及”(事实上)全体社会成员。社会所有则蕴含一种更为基础、更为深刻的民主,全体人民在其中作为主体发挥作用,既是社会的生产者又是社会生产的重要受益者,工人组织的社会生产试图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建立一种合作和团结的关系。在莱博维奇看来,一旦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形成这样一种关系,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所导致的工人的“智力上和身体上的畸形化”将会终结,被以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分离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夺去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将得以恢复。工人的工作场所再不能仅仅成为体力劳动的地方——作为智力转化之成果的劳动工具在工人到来之前就已经准备就绪,工人变成机器的一个零部件受到严格的支配。工人的工作场所应该成为“思”和“做”相结合的地方:不是突兀地介入到生产地点,而是参与生产的整个过程,既需要充分发挥精神的力量,又需要尽其体力,使得各方面潜能都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社会生产因此是生产者充分发展的一个条件。”^[9]满足公共需要和公共目的是社会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全体社会成员并不是作为相互分离、漠不关心的个体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发挥作用。要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需要一种能够充分反映社会需要的各层级的民主制度,因为只有信息和决策源源不断地从底部向

上传递,生产才能够反映公共需要;另一方面,它还需要社会成员正确地对待自身的能力,意识到我们共同的人性,理解每个个体能够充分发展其潜能的条件——我们的生产活动是满足他人需要的。支撑新社会有机体的三个关键要素绝不是独自发挥作用的,“社会主义三角的这三个方面是彼此依赖、相互支撑的”^{[2]187}。离开了社会需要的生产,就不存在真正的社会所有权;离开了社会所有权,工人的社会生产也不会趋向社会需要。

二、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

清晰地界定未来社会的目标,对于现实社会革命运动的重要引导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所有问题的解决,“知道你想去哪里仅仅是第一步,它并不等同于知道了如何到达那里”^{[2]127}。莱博维奇始终强调,代替资本主义的新社会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有了确切的目标但没有合适的路径,不能将其付诸实践,社会主义则只能是乌托邦。社会主义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成员不通过正确的路径切实有效地改造现存的社会制度,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就仍然为极少数社会成员所占有而不可能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这一目的,人的全面发展便缺失必要的实现条件。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莱博维奇的答案是实践:“离开了人的实践,我们便无法想象人的发展。”^[11]更确切地说,这种实践是马克思赋予新内涵的“革命的实践”,即“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5]134}。基于此,莱博维奇认为,这种实践不仅会创造出新社会物的条件而且会培养出人的条件,它所带来的改变,“既是劳动客体的改变又是劳动者自身的改变”^{[12]24}。

在莱博维奇看来,这种实践是“一开始”就应该发生的实践,即一旦人们确定了社会主义

的目标,就应该立即进行的实践。“一开始”是莱博维奇从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凝练出的一个概念。作为消费资料的社会总产品在个人分配之前还应该扣除“一般管理费用”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并且前者“一开始就极为显著地缩减”,后者则“一开始就会显著地增加”^{[13]362}。借用马克思“一开始”这一概念,莱博维奇意在提醒人们认识到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实践的紧迫性,那种等到新社会到来后再去实践的认识是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社会决非突然插入到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全新的“原始社会”,也非由人们观念的断裂而迸发出的新理念,而是从旧社会内部产生的、作为现存社会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正因为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处于异化状态,是一种畸形的存在,社会主义才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为个体各方面能力的发展和需要的满足提供最为充分的条件。根据唯物辩证法,新社会是通过转换它的历史前提发展而来的,是对旧社会缺陷的超越,“它意味着新社会不可能在开始就已经完全形成了”^{[1]62}。社会主义就是通过社会成员的实践,实现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内含的阻碍人的全面发展因素的克服,同时也逐渐地完成对主体的改造,从主客体两方面完成对现存社会的超越。显然,这种超越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那个过程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事实上,可能相当漫长”^[14]。所以,社会成员不能因为当下仍身处资本主义社会就放弃通往社会主义的革命实践,不能坐等新社会一切条件成熟以后再去实践,而是应将现存的社会制度视为革命实践的起点。一旦形成关于未来社会的核心认识,就不应使其仅仅停留在观念层面,而应该从自身和当下创造出其实现的各方面因素,使得实践成为一种“一开始”的行动。基于上述认识,莱博维奇的口号便是:社会

主义应该“现在就建”!

在实践过程中对现存社会各种缺陷的克服决不是轻而易举的,“这个过程的一步都是一个斗争的过程”^{[2]148}。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种种矛盾,但它也不会坐以待毙,其覆灭有赖于主体的革命实践和斗争。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使得人们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产生了质疑,以至于有些人提出“工人阶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应该寻找新的革命力量。与此不同,莱博维奇坚定地认为,工人阶级仍然是革命实践的主体,是克服资本主义各种弊端的中坚力量。在莱博维奇看来,工人之所以在当下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坚持革命实践,由于“潜藏在所有工人斗争最深处的是马克思称之为的‘工人自身发展的需要’”^[15]。人们更多地倾向于将工人视为资本的对立面,认为其革命性来自资本的剥削,反抗资本主义斗争最根本的推动力就在于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莱博维奇指出,这种认识应该被进一步地深化,工人不应仅仅被看作雇佣劳动者,而应该首先被理解为人,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则源自雇佣劳动与人类之间的矛盾。支撑工人进行持续的反抗并超越现存社会的革命实践的根源就在于“这个阶级的‘愤慨’:这一愤慨的产生‘是由于它的人类本性和它那种公开地、断然地、全面地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相矛盾’”^{[7]282}。参与改造旧社会实践的工人,不能被分割为领导者和被领导者,部分先进分子取得了具体工作场所和社会事务中的决定权,而绝大部分工人则被排除在外。莱博维奇强调,工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带来了知与行的分离,“不仅导致了工人的自身和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因素的扭曲,而且还创造了某种条件,即使得企业管理者成为了最初的资产阶级”^[16]。作为革命实践的主体,工人之间从一开始就应该建立一种协作和团结的关系,避免

资本对工人之间的分化,使资本不再成为各个生产者之间联系的中介。当参与改造旧社会的个体之间不再有地位上的差别,认识到他们“彼此之间就像是家庭的成员一样团结统一”^{[7]275}时,便能够保证,建立在这种社会关系基础上的每个人的行动,都是为其他成员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的。

在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缺陷的诸多实践中,莱博维奇尤为强调改造社会成员思想的革命实践,认为“阻止新社会诸种元素瓦解的重担便落在观念的斗争上”^[17]。根据马克思的判断,伴随资本主义特定生产方式的发展,资本越来越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资本的本质使得机械优势的发挥、新科技和新发明的引入等一切发展生产的方式,都转化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导致死劳动与活劳动的对立,工人被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所有这些都大大加深了工人面对资本时的依赖感和无能为力感。”^[3]更为严重的是,资本主义越是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便越是深深地打上资本家对工人统治的印记。因为,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需要源源不断地补充劳动力的后备力量,市场完全能够“粉碎一切反抗”,使得任何想要生存的工人都必须接受资本的规则。最终的结果便是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工人阶级日益发展,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18]293}因此,资本主义发展并不会直接暴露自身的缺陷,促使工人阶级反抗意识的觉醒,“恰恰相反,内在于资本的趋势塑造出认为没有别的选择的人们”^[10]。在莱博维奇看来,“没有别的选择”是一种极其可怕观念,是通往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最直接的障碍,使得资本主义的任何一次危机都不会成为其内爆的导火索,仅仅带来一场痛苦的重组。面对这种资本

主义制造的、笼罩在整个社会之上的普遍的意识,创建新的社会革命实践的胜利则必须“首先再造和建构那种可供替代选择的视野,并且使那些隐含在这些斗争中的东西明确化”^{[1]54}。莱博维奇指出,这种观念的斗争应该在多方面展开:首先,它应该强调已经开始了一种替代性选择的社会现实过程深入发展的重要性,为此“观念的斗争应该从传播资本主义本质的知识开始——通过证明贫穷不是穷人的错误,排斥不是被排除者的过错,财富是人类活动链的结果”^[19];其次,它还应该明确呈现这种理念,即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自由地运用人类智力活动的成果;最后,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它还应该超越资本所推崇的个人利益至上的观念,帮助全体社会成员重塑人类共同体的理念,因为,“我们的前提是人类共同体的概念”^{[2]144}。

三、“21世纪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之交的苏东剧变,无疑使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了重大挫折,严重削弱了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力量,宣告历史终结、资本主义最终胜利的声音在世界上此起彼伏。在社会主义陷入低潮之际,伴随新自由主义的衰竭和左翼政治力量的回潮,拉丁美洲“21世纪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得以持续发酵,成为一股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思潮和力量,有力地回应了资产阶级学者对社会主义的质疑。尽管“21世纪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是由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于2005年首次提出^[20],但是在其后期理论化和系统化过程中,莱博维奇扮演着关键角色,德裔墨西哥学者海因茨·迪特里希·斯特凡、智利学者玛尔塔·哈内克、迈克尔·A.勒博维茨等左翼学者可谓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建构

的旗手^[21]。莱博维奇对“21世纪社会主义”寄予厚望,充分运用自身已有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其加以逻辑化论证和体系化完善,努力使其成为在当代复兴社会主义和替代资本主义的重要方案。

莱博维奇强调,在当代已经不能简单地使用“社会主义”来概括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21世纪社会主义”应该成为当代复兴社会主义的新的选择,“因为存在着一种破裂。马克思批判所强调的人的发展在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消失了”^[22]。这里的“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主要是指以苏联模式为主要特征的在二十世纪产生重要影响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实践,莱博维奇称之为“真实的社会主义”。在莱博维奇看来,“真实的社会主义”在实践过程中并未准确地把握马克思革命实践的内涵,也无法正确处理它所内含的两种产物的重要联系。“真实的社会主义”往往聚焦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上,认为生产力是衡量整个社会是否达到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准,由此便不惜动员社会一切力量来发展社会生产力。莱博维奇认为,这其实仅仅是改造旧社会达到新社会革命实践的一个方面,即改造了社会的客观环境;另一个方面是改造人,即要求整个社会所创造的物质条件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并且,这两个方面是内在一致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只是一味地追求生产力的发展,改造了社会的物质条件,却并未实质性地推进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解决,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成员各方面能力和潜能发展的障碍。“对于工人的统治阻碍了他们能力的发展,必然使其远离生产过程,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工人生产能力的发展”^{[12]154}。“真实的社会主义”由于在根本上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核心,其失败是必然的,也注定无法承担起复兴社会主义的重任。“21世纪社会主义”决不是作为它的“重复

发明”而出现的,而是“一种革命性复归——回归至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22]。

如果说理解社会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前提,那么理解“21世纪社会主义”则是当代复兴社会主义的重要前提。莱博维奇指出,当人们最开始认识某些事物的时候,可能不会立刻就能抓住事物的本质,清晰地界定它的内涵和外延,从而形成对特定事物比较精准的认识。此时,一种比较可行的方法就是通过排除法,把那些从根本上与社会主义核心相背离和已经被“真实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首先清除出认知的范围,逐渐趋近“21世纪社会主义”的真正内涵和外延。其一,“21世纪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不能被设定为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人们受到那些以利润为目标的人从外部直接引导而出卖自身的能力从事工作,最终导致剥削的增长,而非满足人们自身的需要。“简言之,21世纪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22]其二,与“真实的社会主义”根本不同,“21世纪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国家主义社会,社会发展决不是由上级制定的,所有社会成员的主观能动性也不完全掌握在国家持有人和干部手中。其三,“21世纪社会主义”既非民粹主义,也非极权主义。其四,“21世纪社会主义”不是像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那样制造出新的技术和生产力拜物教,决不会以牺牲社会成员赖以生存的环境来换取生产的进步和巨大的经济规模。其五,“21世纪社会主义”并非如自称是它的创始人的海因茨·迪特里希·斯特凡所说的那样在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信息化问题——它使得社会成员消费品的交换建基于每种具体劳动数量的控制论计算之上。如果必须从正面予以界定,莱博维奇认为,查韦斯的一段表述“精确地”呈现了“21世纪社会主义”的内涵:“我们必须回归作为主题、事业和道路的社会主义,并且是一种新型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它将人

而不是机器或政府置于优先一切事物的地位。”^[9]

莱博维奇根据查韦斯领导委内瑞拉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实践,坚定地认为委内瑞拉的革命性实践正是通向“21世纪社会主义”的,为当代复兴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选择。莱博维奇认为,确认一个社会是资本主义真正替代方案的唯一标准,就在于这个社会明确地将人的发展和人的能力的增长作为目标。这一观点体现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宪法》之中。该宪法第299条强调,“确保所有人的发展”;第20条则宣称,“每个人都有自由地发展他或她的人格的权利”;在新社会的社会关系方面,宪法第62条指出,人民参与是“获得保证集体和个人充分发展参与度的必要路径”;第70条的焦点则是,“自我管理、共同管理、各种形式的合作社”,是作为以“相互合作和团结的价值观为指导的结合形式”的范例。对于新社会的政权性质,宪法第102条作出了如下描述:“每个人创造性潜能的发展和他或她人格的充分锻炼是在一个民主社会完成的”;宪法第135条同样对社会成员的义务作出了规定,“由于团结,社会责任和人道主义帮助,是基于每个个体的能力而又不容辞的”。在实践方面,委内瑞拉积极地对现有的企业进行改造,对已有的国有企业、资本主义企业进行改革,将已有的生产关系转换成协作式关系,将掌握外资公司的石油项目及其相关服务项目收归国有,利用石油收入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创造更多的社会福利,满足社会成员的发展需要;同时,还通过社区委员法来推动基层政权的改造,建立社会委员会式的人民政权,普遍推广参与式民主,使得社会各阶层都能够广泛参与到国家决策过程中。在莱博维奇看来,委内瑞拉的实践是“开始拒绝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和资本逻辑的道路的逻辑延续”^{[1]109}。

尽管查韦斯领导下的“21世纪社会主义”吹响了当代复兴社会主义的集结号,但不能低估前进道路上的阻力,委内瑞拉革命性实践在深入推进过程中必将面临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与压力。在莱博维奇看来,这些障碍既有现行改革政策所造成的,也有历史因素积累所形成的;不但来自国内,而且来自国外。当前委内瑞拉的改革实践所面临的首要挑战是由现行国内发展战略所造成的不平衡,即经济改革已经开启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而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改革并未相应跟进。长期社会发展过程中所累积形成的贪腐文化和庇护主义成为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继续发展的重要限制。委内瑞拉是一个严重依靠石油财富运转的国家,获得石油是整个国家社会生活关注的焦点,围绕石油开采使用权出现了严重的权力寻租和官商勾结现象,至今仍然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此外,政治选举还未能卓有成效地开展,未能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真正参与社会政策的制定,而在实质上成为政党交替的“传送带”。“认为它在查韦斯上任时便消失了,便是真正的天真。相反,它弥漫在查韦斯主义之中。”^[23]资本主义决不会放弃抵抗,任由其替代性方案成功实践,委内瑞拉的改革实践必将面临着来自国内外资产阶级势力的联合破坏,“委内瑞拉面对一个确定的内部阶级的反对,和更为重要的帝国主义敌人。”^[24]无论前景如何,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意义便是明确提出了一种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并积极地将其付诸实践,在当代点燃了人们超越资本主义的希望。莱博维奇尤为强调,委内瑞拉的革命性实践有着自身的特点,它丰富的石油资源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每个国家都应该探寻自身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应该“超越委内瑞拉”。

四、结语

基于自身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解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经验的总结,莱博维奇所描述的社会主义核心、提出的实现路径,以及关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无疑对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和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莱博维奇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无疑非常接近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解,并以此为理论基点纠正了人们基于苏东剧变而附着在社会主义上的错误认识。在实践层面,莱博维奇强调社会主义是一个需要作长期斗争的实践过程,必须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成员的思想改造实践,并对查韦斯领导的委内瑞拉的实践进行了理论化提升,试图将其打造为“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复兴的标杆。毋庸置疑,莱博维奇的这些思想和认识不仅为人们重新理解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而且为当代工人运动提供了精神鼓励和智力支持。然而,同样需要警惕的是,莱博维奇所构建的理论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和显著的失误。莱博维奇对于社会主义及其实现路径的认识,往往是仅仅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只言片语出发进行宏观的理论演绎,而未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进行整体把握和运用。在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认识上,莱博维奇又过于偏激,试图完全否定并清除社会主义的历史。对于当代社会主义运动,莱博维奇尽管认识到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存在的问题,但对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源缺乏深入分析,所建构的指导理论过于理想化、主观化,并将社会主义的复兴寄希望于英雄式人物。这些都决定了莱博维奇的思想难以真正实现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发展,也无法对现实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产生实际的、长远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 [1] LEBOWITZ M A. Build it now: Socialism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6.
- [2] LEBOWITZ M A. The socialist alternative: Real human development [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0.
- [3] LEBOWITZ M A. The path to human development: Capitalism or socialism? [J]. Monthly Review, 2009(9): 42.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7] 莱博维奇. 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9] LEBOWITZ M A. New wings for socialism [J]. Monthly Review, 2007 (11): 34.
- [10] LEBOWITZ M A. If you're so smart, why aren't you rich? [J]. Monthly Review, 2015 (11): 27.
- [11] LEBOWITZ M A. The only road is practice [J]. Monthly Review, 2008 (2): 3.
- [12] LEBOWITZ M A. The contradictions of "real socialism": The conductor and the conducted [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2.
- [1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4] LEBOWITZ M A. Build it "from the outset": An infantile disorder? [J]. Science & Society, 2015 (3): 445.
- [15] LEBOWITZ M A. What makes the working class a revolutionary subject? [J]. Monthly Review, 2012 (7): 35.
- [16]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 2013 [R].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61.
- [17] LEBOWITZ M A. Building upon defects: Theses on the misinterpretation of Marx's gotha critique [J]. Science & Society, 2007 (4): 489.
- [1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9] LEBOWITZ M A. The knowledge of a better world [J]. Monthly Review, 2005(3): 68.
- [20] 徐世澄. 拉丁美洲现代思潮 [M].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0.
- [21] 贺钦. 试析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源流及其本质 [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5(3): 76.
- [22] LEBOWITZ M A. What is socialism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 Monthly Review, 2016 (5): 36.
- [23] LEBOWITZ M A. Building twenty-first century socialism [EB/OL]. (2008 - 09 - 06) [2019 - 08 - 20]. <https://canadiandimension.com/articles/view/building-twenty-first-century-socialism>.
- [24] LEBOWITZ M A. An alternative worth struggling for [J]. Monthly Review, 2008(5): 21.



引用格式:霍忻,梁文化.国内外认证认可研究综述与展望[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1):50-57.

中图分类号:F2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0.01.007

文章编号:1009-3729(2020)01-0050-08

国内外认证认可研究综述与展望

A summary and prospects research of certifi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霍忻^{1,2}, 梁文化³

HUO Xin^{1,2}, LIANG Wenhua³

- 1. 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北京 100028;
-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质量基础设施效能研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28;
- 3. 郑州轻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质量发展水平是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内涵和关键决定要素,对全球竞争版图的调整和演变产生深刻影响。作为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认证认可在实现全球社会治理和提升国家质量竞争力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传递信任、服务发展的重要工具,被称作质量管理“体检证”、市场经济“信用证”和国际贸易“通行证”,在社会治理、质量提升、贸易便利化和深化合作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因而近年来逐渐成为国内外业界学术研究的热点领域。

关键词:
质量基础设施;
质量管理;
认证认可

[收稿日期]2019-12-07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8YFF0215606);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9172003)

[作者简介]霍忻(1986—),男,河北省秦皇岛市人,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博士,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质量经济学、函数型数据分析、GIS方法应用与国际经济学。

伴随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经济体对于经济发展质量的诉求愈加强烈,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标准与计量等质量基础设施逐步成为带动一国制造业提质增效和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支点。认证认可是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发达工业国家到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均将认证认可视为保障产品质量、降低贸易通关成本和实现社会质量治理的重要工具,因而对于本国认证认可行业发展给予高度重视。本文拟通过对国内外认证认可领域研究成果的梳理,对未来研究提出展望,旨在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参考,推动我国认证认可行业进一步发展壮大,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有关认证认可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 国别认证认可实践与制度框架研究

S. Amaral^[1]通过对美国认证制度与欧洲大学协会的质量审计制度的基本内容、流程与优缺点的系统分析,指出两种评估体制在管理效率、信息交流等方面的不同。R. Alderman^[2]阐述了美国的认证制度和英国的认证制度,并认为两国的认证制度具有可以共同发展的趋势。此外,M. Silver等^[3-5]根据认证制度实施过程中表现出的特征,对认证制度的优缺点进行了分析。J. Guasch^[6]介绍了拉丁美洲认证认可制度的发展,研究发现:认证认可是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工作的一个关键领域,但发展缓慢且不均衡,缺乏投资环境,企业发展动力不足,财务与成本问题依然存在,制度结构有待完善,各国的努力充其量只是不温不火,需要更加重视认可制度并实施适当的激励措施。世界银行^[7]在《Harnessing quality for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 Ea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报告中指出,认证制度在东欧和中亚大多数转型经济国家蓬勃

发展,融资困难仍然是困扰上述区域认证机构发展的瓶颈,区域合作是建立可靠认证体系的唯一途径。

2. 高等教育、食品等领域认证有效性研究

K. Pond^[8]对于教育质量评估与认证制度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讨论,指出21世纪的质量保障和认证制度需要建立一套具有普遍高质量教育经验的标准,评价的侧重点在于学习者而不是教育机构,为更广泛的利益相关群体开放评估过程。F. Rametsteiner^[9]认为,森林认证是一种森林经营者用于证明森林经营良好或可持续的制度。H. Svenandes等^[10]研究了第三方认证问题,他们指出,伴随高品质食品贸易全球化发展,规模经济和市场扩张导致食品国际标准与认证认可需求,第三方认证已成为保障食品质量和传递质量信号的可靠工具。A. Hatanaka^[11]通过对零售商与认证机构、供应商与认证机构、非政府组织和消费者与认证机构之关系的研究,认为第三方认证不仅仅是用来有效地组织管理市场和贸易的一种客观、公正的技术性工具,而且可通过当代的农产品体系重新调整社会、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D. Friederike^[12]通过对德国质量和安全认证系统数据库的综合农业企业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食品安全风险审计缺乏可信度,认证系统的监控存在一些问题且效率低下。X. Mo^[13]利用固定效应计量模型和结构模型进行估计,发现全国青少年教育协会对托儿中心的质量认证虚拟变量在水平上显著,从而得出结论:忽略公司认证的内生性,会显著低估认可系统的有效性,而导致认证无效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信息监管。

3. 认证在微观主体层面的研究

D. Hill等^[14]认为,通过ISO9000认证并持续改进有利于提高企业产品质量、组织效率、客户满意度和市场份额。E. Chris^[15]的实证研究表明,ISO9000认证能够提高供应链库存周转

率、缩短资金周转期与整体运营周期。国际标准化组织(ISO)^[16]认为,ISO9001—2015 将从6个方面增强组织(公司、部门等)的竞争力,即识别商业机遇、契合顾客需求、增强运作效率、满足法治要求、拓展新市场、防范风险。国际认可论坛(IAF)^[17]研究发现,对于认证动机,受调查者的47%认为是内部业务改进,32%认为是顾客要求,13%认为是法规要求,7%认为是其他,只有1%认为是获得竞争优势。英国标准学会(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e,缩写为BSI)^[18]指出,认证认可能够给企业带来诸多好处,如经营收益的增长、产品质量与效益的持续改进、市场机会的扩大等。S. I. Wu等^[19]运用平衡计分卡(BSC)和基于成本的活动(ABC)方法检验了ISO9000认证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发现实施ISO9000认证能够增强企业的业务绩效和财务收益,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这种正向效果更为显著。美国国家认可委员会(American National Accreditation Board,缩写为ANAB)^[20]系统地总结了实施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内部好处和外部好处,如企业市场份额增加、操作效率提高、产品质量提升等。

4. 认证认可制度的收益问题研究

一些国际机构、国外学者还着重考察了认证认可制度的收益问题。H. Spencer^[21]比较了ISO9001和ISO14001认证的企业收益,认为:对于ISO9001,企业外部收益主要有:获取竞争优势、更高的质量感知、减少顾客质量审核、提高顾客满意度;内部收益包括规范公司文档管理系统、增强员工质量意识、加强内部沟通、提高运营效率和生产力;企业实施ISO14001认证的主要收益有通过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创造和保持新的市场机会、展示环保领导力、改善企业形象、提高公司可信度和简化EMS。M. Frenz等^[22]受英国商业创新技能部(BIS)、知识产权局(IPO)的委托,接受创新基础设施挑战基金资助,系统地研究了认可制度的经济社会

效益问题,指出:第一,以货币计算的直接经济价值,英国皇家认可委员会对合格评定机构认可效益可达到每年2.95亿英镑左右;第二,国家计量体系(NMS)对工业、商业产生实质性影响,贡献度约为50%,ISO9001促进创新和劳动生产率增长,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基于下游的商业利益估算,英国皇家认可委员会对质量基础设施其他维度的效益大约可达到每年3.2亿英镑;第三,认可制度还将在公共健康与安全改善、消减贸易壁垒、降低成本、节约浪费和提升工业效率等方面产生实质性收益。

5. 认证认可在经贸、社会等领域的研究

国际实验室认可合作组织(ILAC)^[23]指出,认可制度将在5个方面对政府管理和市场监管产生影响:一是增强制定政策和行动计划的信心;二是向政府提供基于国际公认标准的独立(第三方)认证;三是减少与影响人类健康和环境保护的决策相关的不确定性;四是提高公众信心;五是消除重复检测,降低成本并提高效率。N. Neumayer等^[24]基于142个国家(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ISO14001认证与经济发展间存在的关系,发现:人均ISO14001证书数量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国外直接投资股票、商品与服务出口等变量呈正相关。H. Jaime等^[25]对四种重要工业产品贸易出口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得出:除供求基本平衡的水泥行业外,其他三种工业产品产量的大幅度增长皆归因于企业认证,并成功转化为显著的经济效益。T. Daddi等^[26]选取73个国家1999—2012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ISO14001认证与宏观经济发展指数之间的具体关系,发现:ISO14001证书数量增长与发展指数增长呈正相关。

综上所述,国外业界在认证认可领域的学术研究起步较早,研究领域广泛,大致可以划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在宏观方面,研究视角集中在认证认可的社会、经贸影响和认证认

可的实践、制度设计等方面。在微观层面,研究视角集中在专业认证的有效性、认证认可为企业带来的收益和认证主体等方面。国外认证认可研究所运用的方法以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为主。国外学术界的认证认可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是:一方面,对于认证认可的概况或理论研究较少,缺乏理论基础的支撑,业内学术界对于认证认可基础理论或理论模型尚未达成共识;另一方面,已有的量化分析结果存在较大观点分歧,对于如何量化认证认可行为有待深入论证。

二、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认证认可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 认证认可发展状况、制度安排与国际合作研究

赵新栋^[27]对我国早期的认证认可制度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提出从制度建设、法律法规、市场监管、认证机构培养、国际交流等方面构建我国认证认可新体制的建议。姜茹娇^[28]围绕双边互认协议和多边互认协议重点介绍了认证认可互认的当事国、生效时间和产品领域等状况,并指出国际互认的提出可减少技术性贸易壁垒,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薄昱民^[29]认为我国目前的管理体制存在“大政府、小社会”现象,他结合我国的体制和国际通行的认证认可模式,提出以第三方认证认可逐步取代行政许可,是将认证认可诉诸市场、提升政府效能的必然趋势。郭晓艳等^[30]指出,在“一带一路”贸易交往中要切实发挥认证认可作用,明确认证认可的工作方向,协调推进认证认可的有效性、精准性和专业性。

2. 认证认可有效性研究

从整体上来看,学者们主要是围绕定量检验与定性分析这两个视角来开展认证认可有效性研究的。在定性研究方面,王秀清等^[31]指出,认证认可为食品质量信息传递和企业声誉

机制的建立提供了桥梁,能够使消费者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产品质量,提高食品质量知情者的比例,降低食品市场出现低质产品和次品的概率。何坪华等^[32]通过研究发现,认证管理能够使认证标志成为食品安全质量信号显示的有效手段,成为帮助消费者节约信息搜寻费用的制度工具。刘钢^[33]通过研究发现,认证认可制度有助于实现农产品的全程追踪监控、推进标准化生产和树立品牌效应,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褚小菊^[34]系统介绍了基于 ISO22000 标准的中国食品安全管理认证体系,从降低监管成本与风险、优化企业食品安全管理、推进食品贸易、降低整个食品链风险 4 个方面阐述了这一认证体系的显著效果。

在定量研究方面,郑妍妍等^[35]基于世界银行 2012 年营商环境与企业绩效调查的相关数据,使用回归方法和倾向评分匹配方法分析了国际质量标准认证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国际质量标准认证能够增加企业出口的概率和销售规模。吴龙^[36]以认证成本收益为视角,选取 2008 年中国 35 个大型城市 76 686 家生产性服务企业的横截面数据,实证分析了 ISO9000 认证对生产性服务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ISO9000 能够显著增加企业销售收入,区域市场化程度、行业竞争程度与服务的技术复杂程度均对认证的企业绩效影响产生调节作用。曾洪鑫等^[37]利用 2016 年对广东出口消费品认证认可和质量水平问卷调查数据,采用相关性分析与邓氏灰色关联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量化分析认证认可对出口消费品微观质量和宏观质量的影响作用,发现:在微观层面,认证认可对消费品质量有着一定的正向影响作用,在产品符合性和市场符合性方面相关性较为显著,在社会符合性方面的认证认可仍然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在宏观层面,认证认可与行业人才结构、配套能力、环境保护、政策效用等方面关系较为密切。

3. 认证认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与贸易便利化研究

在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层面,陈旭东^[38]指出,信息不对称所引致的逆向选择是市场失灵的重要表现,认证认可作为一种可信度高的、有效的市场信号发射模式,能够避免逆向选择行为的产生,消除信息不对称,规范市场行为,优化资源配置,进而维护市场稳定。纪文^[39]通过研究发现,认证认可的促进作用体现在5个方面,即促进市场经济体制有效运行、提高产品质量安全和管理水平、促进市场交易并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政府管理的能力和效率、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健康发展。张磊柱^[40]指出,认证认可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质量管理、提高市场效率的基础性制度,有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政府职能转变,释放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构建现代市场体系和新型市场监管体制提供创新路径。

在贸易便利化研究层面,韦万春^[41]指出,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发展,成员国间贸易往来更为活跃,加强检验检疫互认合作,可实现资源互补,减少贸易中重复检测、重复认证,加快流通速度,降低贸易成本,提高区域贸易便利化水平。游艳玲^[42]认为,认证认可发挥着传递信任、沟通生产与贸易、生产与消费、贸易与消费的纽带作用,是国际通行的现代质量管理手段与贸易便利化工具,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将发挥独特的作用。王隆重^[43]探讨了“一带一路”质量合作与贸易便利化问题,指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应通过多元化、多层次的区域质量合作,将贸易便利化融入到实体合作园区建设、质量服务、通过合作、认证认可互认互通之中,通过沿线区域、行业合作模式和中小型市场建设,强化中国标准规范的通用性和认证认可的实效性,不断提升沿线国家间的贸易便利化水平。

综上所述,与国外相比,国内关于认证认可

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相对单薄,且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我国认证认可发展状况、认证认可制度体系、认证有效性、认证认可对国民经济、社会治理与贸易便利化影响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国内已有研究成果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理论研究不充分,多数研究集中在现实状况分析、各国认证认可制度安排介绍、量化检验等方面,关于认证认可的理论研究或论证偏少,对于认证认可如何影响经济发展或贸易便利化的机理的研究尚有待填补;二是量化分析手段单一,仅仅停留在回归模型等静态分析阶段,未能将动态经济模型引入分析框架,时常导致实证分析结果出现偏离或产生观点分歧。后续研究应加强基础理论攻关,创新量化模型方法,推动国内认证认可领域研究向更为深入、系统和全面的方向发展。

三、研究评述与展望

综合国内外认证认可领域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其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研究方法单一。从已有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来看,主要集中在定性研究,通过案例分析、数据图表解析等方式总结国内外认证认可方面的制度设计、实践活动、有效性、现实状况、不足与优势,以及在微观层面(企业)和宏观层面(国家)所产生的作用效果或潜在影响、发展趋势等。相比之下,关于认证认可领域的定量研究与分析的成果还比较少,量化分析手段相对单一,主要是以质量管理体系证书数为变量的各类计量模型检验、基于问卷调查法的认证认可对企业绩效影响评估和认证认可有效性研究等。

其二,研究结论相悖。综观已有研究结论可以发现,就目前来看,国内外学术界在认证认可有效性、微观层面的作用效果,以及其对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程度等研究领域的结论或观点尚未达成共识。例如,多数学者认为通

过实施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企业绩效水平将得以显著提升,但仍有部分学者指出,这种绩效增进效果并不明显。学术观点或研究结论的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领域研究尚欠深入、不够成熟,研究的系统性和全面性有待提升。

其三,研究视角固化。从已有研究来看,多数研究是从企业层面开展定性或定量研究的,宏观的、基于国家层面的认证认可定量研究凤毛麟角,且选取的样本对象也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德国等几个认证认可发展较为成熟的发达经济体,针对中国、东盟,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发展中经济体的认证认可的定量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后续研究应加大对发展中国家认证认可制度的考察,明确劣势,补足短板,不断挖掘认证认可的发展潜力。

基于如上研究现状,结合国内外认证认可建设的现实状况,我们认为,在后续研究中应以先验研究成果为基础,从如下几个方面完善认证认可研究体系,并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样本选取等方面尝试性地开展理论创新。

其一,突破已有定性研究方法的束缚。从研究成果看,关于认证认可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案例分析、制度介绍、现状分析等定性分析方法,分析深度有限,仅仅是对认证认可的发展形势与制度体系、实践活动等进行初步解析,研究结论的支撑力度不足。在后续研究中,应逐步推进认证认可领域的定量研究,将统计学中的指标评价分析方法和数量经济学中的计量模型方法引入认证认可研究领域。这样,一方面,能够以评价模型为基准,从多个维度构建国家层面的认证认可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全面、系统地评估主要国家在认证认可领域的竞争实力,明确不同国家认证认可的竞争优势与比较劣势,开展横向对比,探究当前认证认可的国际格局;另一方面,应以计量经济学为支撑,运用回归模型、VAR模型、灰色关联度模型、动态仿真模型、Gtap模型等多种量化方法,检验认证认

可对于经济、社会、贸易、质量提升等方面的影响,并与质量基础设施的其他几种表现形式进行对比分析,定量地研判认证认可作为一种质量提升路径的影响效果。

其二,突破已有研究视角过于宏观的瓶颈。究其本质,认证认可是基于企业经营而产生的一种质量管理行为,如ISO90001,ISO14001等已大规模实行的企业质量管理认证和环境质量管理认证,都是在企业层面发生的质量控制实践活动。但已有研究尤其是国内研究,将研究视角过多地集中在国家宏观层面和产业中观层面,对于企业微观认证认可行为的研究还不到位。与很多其他领域“宏观—中观—微观”的研究脉络发展类似,关于认证认可方面的研究也应将视角回归企业行为,唯有这样开展的研究,其基础才更为扎实,所得出的结论和启示才更具针对性和实践指导价值,研究意义也更加凸显。

其三,弥补理论机理研究的空白。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认证认可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关于机理、传导路径等方面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寥寥无几。在后续研究中,应在加大定量分析和微观层面研究力度的基础上,适当加大理论研究特别是机理、路径等视角的研究,从管理学、经济学基础学科出发,挖掘认证认可领域研究的基础理论,同时应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加大对于机理、传导机制等问题的研究,厘清认证认可行为的影响机理,这样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认证认可如何发挥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社会治理、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贸易便利化的作用。

其四,突破已有样本对象停留在发达经济体的限制。如今,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发展与质量治理中的作用日渐凸显且具备一定的潜力,包括中国、东盟,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内的经济体认证认可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并且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

沿线的发展中经济体加强互认合作和双边、多边认证认可合作,可以说,发展中国家已成为全球认证认可事业中一支新兴的、不可忽视的力量。但与实际情况相比,由于发达国家认证认可事业起步较早,认证认可的传统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经济体层面,关于发展中经济体的认证认可研究还比较少,且研究方法固化、分析深度有限。在后续研究中,应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东盟、金砖国家等发展中国家认证认可的研究力度,从制度体系、发展特征、竞争力水平、影响效果和企业行为等方面开启多元研究,并与发达经济体的认证认可研究进行比较,甄别差异性,指出优势与短板,以期能够更好地把握发展中经济体认证认可的发展,加强跨国认证认可合作,促进双边或多边互认框架建设,服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

参考文献:

- [1] AMARAL S. Accreditation and certification in USA and Europea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y & Reliability Management, 1998(6):135.
- [2] ALDERMAN R. The comparison of certification between America and the UK [J]. Journal of Quality Development, 2005(1):62.
- [3] SILVER M. The business value of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s certification [J].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1990(7):45.
- [4] KHAWAS D. Introduction to conformity assessment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993(12):79.
- [5] DILL C. The influence of accreditation and certification on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Quality Development, 1996(17):12.
- [6] GUASCH J. Latin America's accreditation and certification system[J]. Journal of Quality Management and Improvement, 2007(15):21.
- [7] WORLD BANK. Harnessing quality for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 Ea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R]. Conformity Research Paper, 2012.
- [8] POND K.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in world [J].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02(22):36.
- [9] RAMETSTEINER F. What's forest certification and effe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y & Reliability Management, 2002(27):108.
- [10] SVENANDES H, SOUZA M, ELODIE R, et al. Food certification and the third party certification among the global trade [J]. Journal of Quality Operation, 2007(19):322.
- [11] HATANAKA 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tailers and certification bodies[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05(25):16.
- [12] FRIEDERIKE D. Accreditation and certification: The way forward? An eval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community's experienc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Quality in Health Care, 2009(117):35.
- [13] MO X. How does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plays role in society? [J]. Journal of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2010(103):122.
- [14] HILL D, SPREHA D. Does ISO9000 work in company?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996(75):12.
- [15] CHRIS E. Resolving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in markets: The role of certified management program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y & Reliability Management, 2009(6):80.
- [16] ISO. ISO9001:2015 How to use it? [EB/OL]. (2016-08-08) [2019-11-20]. <http://www.iso.org/publication/PUB100373.html>.
- [17] IAF. ISO9001: Its relevance and impact in Asian developing economies[R]. Conformity Research Paper, 2012.
- [18] BSI. What's the benefits of certification on com-

- pany? [R]. BSI Research Paper, 2016.
- [19] WU S I, CHEN J H.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comparison based on enterprises passed or not passed with ISO accreditation: An appliance of BSC and ABC method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y & Reliability Management, 2012(3):295.
- [20] ANAB. The main benefits of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R]. Conformity Research Paper, 2017.
- [21] SPENCER 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ISO9001 and ISO14001 on enterprise benefits[J]. Journal of Quality Operation, 2018(108):187.
- [22] FRENZ M, LAMBERT R. The economics of accreditation[J].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 Skills, 2014(103):42.
- [23] ILAC. The macroeconomic effect of accreditation [R]. ILAC Research Paper, 2016.
- [24] NEUMAYER N, PERKINS C.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SO14001 system: An empirical analysis [J].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2004(115):72.
- [25] JAIME H, MAURICIO B. Product certification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2008(65):31.
- [26] DADDI T, FREY M, GIACOMO M, et al. Macro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indexes and ISO14001 certificates: A cross national analysis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5(108):87.
- [27] 赵新栋. 论中国的认证认可体制改革[J]. 中山大学学报论丛, 2003(4):88.
- [28] 姜茹娇. 技术性贸易壁垒与认证认可国际互认制度[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5):92.
- [29] 薄昱民. 双管齐下 工业品认证制度运行改革[J]. 质量与认证, 2014(11):35.
- [30] 郭晓艳, 刘鑫, 王猛, 等. 探索清真食品认证体系, 助推“一带一路”发展[J]. 食品安全导刊, 2018(33):44.
- [31] 王秀清, 孙云峰. 我国食品市场上的质量信号问题[J]. 中国农村经济, 2002(5):32.
- [32] 何坪华, 凌远云, 刘华楠. 消费者对食品质量信号的利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来自9市、县消费者的调查[J]. 中国农村观察, 2008(4):52.
- [33] 刘钢. 台湾地区认证认可制度对推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作用与启示[J]. 标准科学, 2009(9):43.
- [34] 褚小菊. 基于 ISO22000 标准的中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解析[J].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2014(4):1257.
- [35] 郑妍妍, 李磊, 庄媛媛. 国际质量标准认证与企业出口行为——来自中国企业层面的经验分析[J]. 世界经济研究, 2015(7):129.
- [36] 吴龙. ISO9000 认证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企业绩效的影响[D].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 2016.
- [37] 曾洪鑫, 王怡琪, 黎清旦. 认证认可对出口消费品质量的影响——基于广东的实证分析[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2):70.
- [38] 陈旭东. 论认证认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除市场失灵、维护市场稳定的作用[J]. 中国测试技术, 2006(1):73.
- [39] 纪文. 认证认可:质量提升的重要手段[J]. 质量探索, 2011(6):35.
- [40] 张磊柱. 认证认可:构建现代市场体系和新型市场监管体制的路径探析[J]. 中国市场监管研究, 2018(5):28.
- [41] 韦万春. 为了明天更美好——首届中国—东盟出入境检验检疫合作论坛综述[J]. 中国检验检疫, 2007(1):10.
- [42] 游艳玲. “一带一路”建设:一场认证认可共享的盛宴[J]. 质量与认证, 2015(7):21.
- [43] 王隆重. “一带一路”质量合作与贸易便利化[J]. 上海质量, 2018(2):34.



引用格式:孙端. 国内众包模式研究的空间分布、热点与趋势——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2006—2019年数据分析[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1):58-66.

中图分类号:F21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0.01.008

文章编号:1009-3729(2020)01-0058-09

国内众包模式研究的空间分布、热点与趋势

——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2006—2019年数据分析

Spatial distribution, hotspots and trends of crowdsourcing study in China

—Analyse based on CNKI database from 2006 to 2019

孙端^{1,2}

SUN Duan

1. 长沙师范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100;
2. 湘潭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关键词:
众包模式;
科学知识;
图谱;
可视化分析;
共现网络图谱;
聚类知识图谱

摘要:为全面揭示和分析国内众包模式研究的空间分布、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选择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的669篇期刊论文作为样本,采用CiteSpace,Excel等工具对国内众包研究的时间分布、空间分布、关键词聚类、名词术语词频进行分析,发现:无论在时间分布上还是在空间分布上,众包模式研究在我国都得到迅速发展,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高校图书馆、众包模式、隐私保护和公众参与等领域,未来众包任务分配研究领域将会得到学者们更多的关注和持续深入的研究。

[收稿日期]2019-10-17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基金项目(XSP18YBC220);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YBA025);长沙师范学院校级重点建设学科工商管理学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端(1982—),男,河南省周口市人,长沙师范学院讲师,湘潭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公共管理、商务管理。

“众包”始于西方企业的创新活动,2006 年才进入学术研究领域。J. Howe^[1]首次提出“众包”概念,认为众包是一个公司或机构将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大众网络的做法。众包 2007 年被引入中国后,其相关研究和实践得到了快速发展。刘文华等^[2]认为众包借助网络平台,能够充分挖掘广大消费者的力量和潜力来参与企业的研究开发和创新活动,这将大大降低企业产品上市的风险。李克强总理在 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打造众创、众包、众扶、众筹平台,构建大中小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创客多方协同的新型创业创新机制”。《湖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推广研发创意、制造运维、知识内容和生活服务众包,推动大众参与线上生产流通分工”。可见,众包作为一种创新模式,已经改变了传统的企业生产模式,并不断得到政府、企业和学者的重视。自 2007 年至今,众包被引入中国已经 12 年了,这些年来国内众包模式取得了哪些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哪些研究热点?未来发展趋势如何? 这些问题是许多对众包感兴趣的相关人士希望深入了解的。鉴于此,本文拟采用 CiteSpace,Excel 等科研工具,对 2007 年以来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选取有代表性的文献样本进行计量分析,概括总结我国众包模式研究现状,以期为深化众包模式研究提供参考。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 CiteSpace,Excel 等科研计量工具对文献样本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处理,重点围绕国内众包模式研究的时空分布、热点与趋势进行分析和总结,揭示我国众包模式发展的内在规律。找到有代表性的权威文献数据,这是实现研究目标的基本条件。为此,我们选取我国最大的实时动态数据库——中国知网

(CNKI)数据库为文献数据采集来源库,依据 CNKI 数据库的期刊论文检索规则,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期刊论文作为样本数据。

在中国知网输入关键词“众包”,选择“2006—2019”年与主题词“中文核心期刊 + CSSCI + CSCD”,获得有效文献样本 669 篇,该样本数据的采集时间为 2019 年 9 月 13 日。

本文的研究路径为:第一步,登录中国知网数据库,按照目标设计要求检索文献资料,并对文献数据进行清洗和整理,取得有效数据样本;第二步,打开 CiteSpace 计量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转换,使之能够适用于软件分析,并建立相应的文件夹,储存不同的数据,原始样本数据储存于 input 文件夹,转换后的文件自动保存于 output 文件夹;第三步,建立 data 和 project 文件夹,将转化后的样本数据拷贝到 data 文件夹;第四步,在 CiteSpace 首页建立工程项目,取名为“众包模式”,根据分析需要对页面栏目进行设置,然后进行可视化处理,依据显示需要对控制面板栏目进行相应设置,从而使得可视化图片更加符合目标分析需要。

二、研究过程与结果分析

1. 国内众包模式研究的时空分布及其规律

国内众包模式研究的时空分布包括时间分布和空间分布。时间分布用样本数据中各个发文年度的论文篇数来表示,从其时间分布可以看出国内众包模式研究的发展趋势;空间分布用样本数据各个发文机构总体发文数量来表示,从其空间分布可以发现国内相关发文机构在众包模式研究方面的学术影响力。

(1) 国内众包模式研究的时间分布及其规律

国内众包模式研究的时间分布体现在我国学者在中文核心期刊、CSSCI 和 CSCD 3 个作为数据库来源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众包模式研究的论文数量,这些数据库来源期刊是我国人文社

科期刊中的代表性期刊,有一定权威性,具有较强的影响力。根据样本数据,采用 Excel 表格制作的“众包”理论研究的时间分布见图1,其显示了自“众包”进入学术研究领域以来众包模式研究文献的时间分布状况。由图1可知,2006年被视为众包模式研究元年,国内没有相关研究文献;2007年2篇,2008年1篇,2009年2篇,2010年10篇,2011年8篇,这5年众包研究热度不足,发文数量较少;自2012年19篇开始,国内众包模式研究论文数量开始飙升,2016年达到峰值131篇,2017年、2018年略有下降,但是整体保持120篇/年以上;截至统计数据当日,2019年已经发文69篇。总体来看,国内众包模式研究稍晚于西方国家,随着2007—2011年少量论文的发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众包研究,并且发文数量飞速上升,整体趋势不断增长。

(2) 国内众包模式研究的空间分布及其规律

国内众包模式研究的空间分布主要体现在国内中文核心期刊、CSSCI 和 CSCD 期刊论文中相关学术机构发表论文的数量分布上,反映了学术机构在众包研究方面的学术影响力。

利用 CiteSpace 软件制作的国内众包模式研究文献的空间分布状况见图2,该图显示了在众包模式研究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机构名称。圆形节点代表学术机构;节点大小代表发文数量的多少,节点越大意味着发文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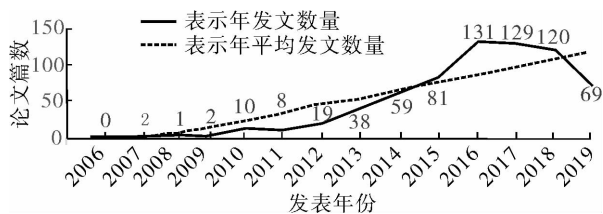


图1 CNKI 数据库“众包”理论研究的时间分布(2006—2019年)

越多;颜色代表年份,颜色越深代表年份相对久远。由图2可知,发文数量最多的机构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紧随其后的是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大学、天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东华大学、湖北大学(见表1),这些学术机构在众包模式研究方面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开展的众包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经济管理、工商管理、新闻与传播、计算机与信息工程等学科领域。由表1可知,排名靠前的30个学术机构发文总计198篇,约占总体发文数量的29.60%,平均发文数量6.6篇,这些学术机构多为国内重点院校,科研实力较强;也有一些地方院校,如湖北大学、武汉纺织大学、上海大学、南昌大学等,在众包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2. 国内众包模式的研究热点及其规律

关键词是学术研究与学术评价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的重要词汇,集中体现了学术研究的重点。在 CiteSpace 中进行可视化,得到“众包”主题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见图3)。图3中,1个节点代表1个关键词,共有节点141个,连线243条,网络密度0.0246。在 CiteSpace 中,节点代表关键词的词频,节点越大,词频越高,说明该词越热;紫色圆环代表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年轮越宽,意味着该词越具有影响力。由图3可知,“众包”“众包模式”“大数据”“科研众包”“众包竞赛”“开放式创新”“众筹”“质量控制”“众包平台”等词汇属于热点关键词,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在图3的基础上,对样本数据进行聚类,适当调整控制面板参数,可以得到“众包”理论研究的聚类知识图谱(见图4)。由图4可知,众包模式研究包含高校图书馆、众包模式、隐私保护、公众参与、众包竞赛、众包新闻、众包社区、软件众包、激励机制、扎根理论和数据新闻11个研究领域。其中,排名靠前、最具有影响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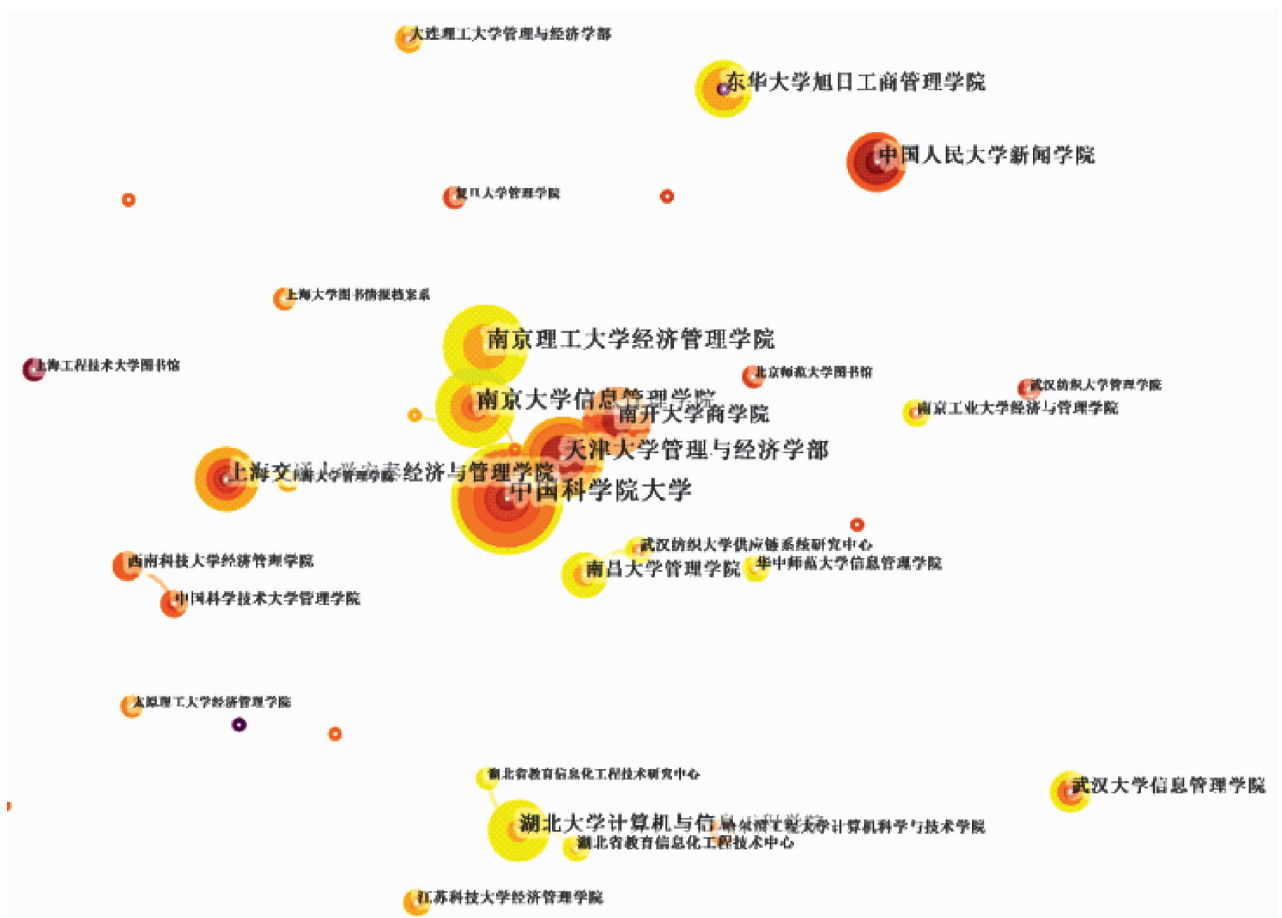


图 2 CNKI 数据库“众包”理论研究的空間分布(2006—2019 年)

表 1 CNKI 数据库“众包”研究发文数量前 30 位学术机构列表

排名	发文篇数	机构名称	排名	发文篇数	机构名称
1	19	中国科学院大学	12	6	大连理工大学
2	13	南京理工大学	17	5	复旦大学
2	13	南京大学	17	5	北京师范大学
4	11	天津大学	19	4	重庆大学
5	9	上海交通大学	19	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5	9	南开大学	19	4	西南科技大学
7	8	中国人民大学	19	4	南京邮电大学
7	8	东华大学	19	4	南京工业大学
7	8	湖北大学	19	4	江苏科技大学
10	7	武汉纺织大学	19	4	华中师范大学
10	7	湖北省教育信息化工程技术中心	19	4	哈尔滨工程大学
12	6	西北工业大学	19	4	北京理工大学
12	6	武汉大学	19	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2	6	上海大学	29	3	太原理工大学
12	6	南昌大学	29	3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资料来源:根据 CNKI 数据库样本数据统计(2006—2019 年)



图4 CNKI数据库“众包”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2006—2019年)

征,并从技术解决方案和配套管理机制两个方面探讨了我国企业构建网络众包创新体系的实现路径。可以看出,众包模式研究基本形成了理论构架。在以后的研究中,具有中国特色的众包模式体系研究应进一步加强,理论成果应更加丰富。

其三,关于众包隐私保护研究,相关的关键词有“隐私保护”“大数据”“时空众包”“任务推荐”“机器学习”“任务分配”等(见表2)。燕彩蓉等^[9]在访问控制模型和重要信息隐藏策略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机器计算与众包相结合的实体解析方法,并成功应用于某医院患者主索引平台,有效避免了患者信息的泄露;童咏昕等^[10]综述了时空众包的概念、特点及其应用,并讨论了时空众包数据隐私保护等问题及其技

术;张贤贤等^[11]提出了一种基于应用敏感权限使用意图的隐私评级模型,通过对应用敏感权限使用意图进行静态分析,使用隐私评级模型对应用进行评分,经验证准确率达80.7%。可见,众包隐私保护研究主要分布在计算机科学领域,重点集中在隐私保护的管理技术上,而众包隐私保护的伦理方面研究明显不足,以后应加强这方面研究,因为隐私保护不仅需要技术,还需要人文伦理。

其四,关于众包公众参与研究,相关的关键词有“公众参与”“参与意愿”“互联网+”“科研众包”“众筹”“众创”等(见表2)。孟韬^[12]以威客参与样本,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预期收益、努力期望、信任和促进条件4种因素对大众参与众包的行为产生的影响;周素红^[13]认为,

众包理念催生了自下而上的海量公共服务个性化需求与新型的公众参与,给规划管理带来了新的理念、机遇与挑战;郭捷等^[14]提出了众包物流大众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研究模型,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其影响因素为便利条件、参与意愿、获益期望、社会影响和感知风险;韩普等^[15]

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提炼了公众参与智慧城市管理众包的关键影响因素。可见,众包公众参与研究主要集中在公众参与众包的影响因素上,学者们结合不同的众包领域对其进行了分析和验证。

3. 国内众包模式研究的前沿趋势及其规律

CiteSpace 嵌入了突发性探测算法功能,可以用来探测一篇文献是否切中该领域中的要害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该功能对“众包”样本数据进行探测。利用 CiteSpace 导出的“众包”样本数据库,可得出最强的 7 个突发关键词(见图 5)。图 5 清晰地展现了每个突发关键词的突发强度和起始年份,红色线代表突发关键词持续时间。“众包”关键词的突发强度为 16.0396,持续时间为 2006—2013 年,该词突发强度最高,持续时间最长,说明“众包”一词在该研究领域最具有影响力;其次是“质量控制”,突发强度为 6.8247,持续时间为 2006—2012 年;“图书馆创新”“大数据”“高校图书馆”“众筹”4 个关键词的突发强度分别为 2.9908,3.8521,3.638,3.9481,持续时间分别为 2011—2013 年、2013—2014 年、2013—2014 年、2014—2016 年。上述关键词在其持续年份内为该领域的研究前沿,代表着研究方向。“任务分配”突发于 2016 年,其突发强度为 3.1889,并一直持续到 2019 年,说明该词可能成为众包研究领域的热点词汇,并成为该领域的前沿学术词汇。

由上述分析可知,“任务分配”将成为众包研究新趋势,与其相关的关键词主要有“质量

控制”“共享经济”“时空众包”“空间众包”“隐私保护”等(见图 6)。这些关键词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众包任务分配问题。目前,国内学者主

表 2 CNKI 数据库“众包”频次排名前 50 位的
热点关键词列表

序号	频次	中介中心性	关键词	序号	频次	中介中心性	关键词
1	318	0.9	众包	26	6	0.03	众包新闻
2	37	0.31	众包模式	27	6	0.01	隐私保护
3	33	0.22	质量控制	28	6	0	新产品开发
4	28	0.16	大数据	29	6	0.07	网络众包
5	20	0.13	开放式创新	30	6	0	社交媒体
6	17	0.08	科研众包	31	6	0.03	商业模式
7	16	0.01	众包竞赛	32	6	0.03	空间众包
8	14	0.15	众筹	33	6	0.07	共享经济
9	13	0.16	众包平台	34	6	0.02	公众科学
10	12	0.06	创新	35	6	0.07	公众参与
11	10	0	众包翻译	36	5	0.04	众筹新闻
12	10	0.02	互联网+	37	5	0.02	众包测试
13	9	0.02	图书馆	38	5	0.01	图书馆创新
14	9	0.02	软件众包	39	5	0	数字图书馆
15	9	0.04	任务分配	40	4	0.02	众创
16	9	0.03	激励机制	41	4	0.07	众包社区
17	9	0.01	高校图书馆	42	4	0	众包创新
18	9	0.03	参与意愿	43	4	0.01	扎根理论
19	8	0.02	众包物流	44	4	0.01	演化博弈
20	8	0.02	众包供应链	45	4	0.03	新闻
21	8	0.02	时空众包	46	4	0.04	数字人文
22	8	0	社会网络	47	4	0	数字出版
23	7	0.06	影响因素	48	4	0	企业
24	7	0	任务推荐	49	4	0.09	互联网
25	7	0.01	机器学习	50	4	0	分享经济

资料来源:根据 CNKI 数据库样本数据统计(2006—2019 年)

Top 7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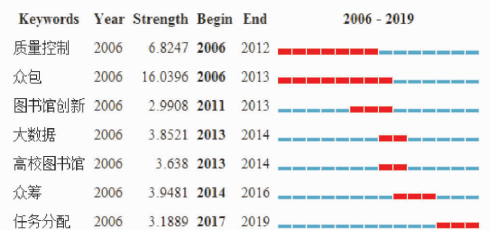


图 5 CNKI 数据库“众包”最强突发
关键词图示(2006—2019 年)



图6 CNKI数据库“任务分配”关键词节点网络图(2006—2019年)

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众包的任务分配问题。

一是用户任务分配研究。例如,张晓航等^[16]在分析用户主题感知机制基础上,通过对用户主题和准确率建模,提出了一种基于用户主题感知的迭代式任务分配算法;施战等^[17]根据每个用户针对不同类型任务具有不同的可靠性,设计了一种基于用户可靠性的众包系统任务分配机制。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用户任务分配研究内容不多、层次深度不够,特别是针对网络用户任务分配的相关内容还未出现,这将成为未来的研究趋势之一。

二是在线任务分配研究。例如,宋天舒等^[18]基于空间众包环境,提出了一种基于众包任务、众包工人和众包工作地点的新型动态在线任务分配算法,并通过数据集进行大量实验,验证了该算法的效果与性能;余敦辉等^[19]利用CT-KNN算法选出合适的众包工人,并动态选择不同的阈值进行分配,从而提出一种基于动态效用的在线任务分配方法。在线任务分配研究内容也不多,主要是众包任务分配的线上延伸,主要集中在任务分配算法上,而对网络用户主观性因素的研究不多,未来该领域将成为研究趋势之一。

三是最优任务分配研究。例如,李洋等^[20]利用树分解技术将工人分割成独立的集合,并提出一种启发式的深度优先搜索算法,实验证

明,该算法可以很好地解决最优任务分配问题;赵焜松等^[21]提出一种基于任务发布者权重与任务权重的软件众包任务发布优先级(TRP)计算方法,经验证该方法具有较高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目前任务分配研究主要集中在算法上,而对任务分配的要素尚未形成体系,因而在算法上偏向某个特定领域,研究成果的适用性和推广性有待考验,未来在任务体系构建上会产生更多算法,其兼容性、应用性和适用性会得到优化。

可见,国内众包模式经历了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的过程,在短短的十多年中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国内众包有望成为国内创新领域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发展趋势引人注目。

参考文献:

- [1] HOWE J. The rise of crowdsourcing[J]. Wired Magazine, 2006(6):1.
- [2] 刘文华,阮值华. 众包:让消费者参与创新[J]. 企业管理,2009(7):93.
- [3] 盛芳,耿艾莉. 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四项工作的众包策略[J]. 图书馆论坛,2012(1):15.
- [4] 胡永生. 引入众包模式的阅读推广服务路径、策略及思考[J]. 新世纪图书馆,2016(9):52.
- [5] 乔亚铭,冯永财. 高校图书馆科研竞争情报服务众包探究[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8(12):50.
- [6] 魏拴成,邬适融. 众包的产生、发展以及构建众包商业模式应遵循的路径[J]. 上海管理科学,2010(1):55.
- [7] 张利斌,钟复平,涂慧. 众包问题研究综述[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6):154.
- [8] 叶伟巍,朱凌. 面向创新的网络众包模式特征及实现路径研究[J]. 科学学研究,2012(1):145.

- [9] 燕彩蓉,张洋舜,徐光伟.支持隐私保护的众包实体解析[J].计算机科学与探索,2014(7):802.
- [10] 童咏昕,袁野,成雨蓉,等.时空众包数据管理技术研究综述[J].软件学报,2017(1):35.
- [11] 张贤贤,王浩宇,郭耀,等.基于众包和机器学习的移动应用隐私评级研究[J].计算机科学与探索,2018(8):1238.
- [12] 孟韬,张媛,董大海.基于威客模式的众包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4(12):112.
- [13] 周素红.规划管理必须应对众包、众筹、众创的共享理念[J].城市规划,2015(12):96.
- [14] 郭捷,王嘉伟.基于UTAUT视角的众包物流大众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研究[J].运筹与管理,2017(11):1.
- [15] 韩普.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公众参与智慧城市管理的众包概念模型研究[J].现代情报,2018(7):19.
- [16] 张晓航,李国良,冯建华.大数据群体计算中用户主题感知的任务分配[J].计算机研究与发展,2015(2):309.
- [17] 施战,辛煜,孙玉娥,等.基于用户可靠性的众包系统任务分配机制[J].计算机应用,2017(9):2449.
- [18] 宋天舒,童咏昕,王立斌,等.空间众包环境下的3类对象在线任务分配[J].软件学报,2017(3):611.
- [19] 余敦辉,张灵莉,付聪.基于动态效用的时空众包在线任务分配[J].电子与信息学报,2018(7):1699.
- [20] 李洋,贾梦迪,杨文彦,等.基于树分解的空间众包最优任务分配算法[J].软件学报,2018(3):824.
- [21] 赵焜松,余敦辉,张万山.软件众包任务发布优先级计算方法[J].计算机应用,2018(7):2032.



引用格式:邢红萍,罗冰,李昞洋.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基于河南省高技术产业的实证检验[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1):67-73.

中图分类号:F29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0.01.009

文章编号:1009-3729(2020)01-0067-07

产品内国际分工 对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

——基于河南省高技术产业的实证检验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
on the status of industrial value chain**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high-tech industry from He'nan province

邢红萍¹,罗冰¹,李昞洋²

XING Hongping¹,LUO Bing¹,LI Bingyang²

1. 郑州轻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2. 郑州大学 国际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运用C-D生产函数,构建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河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模型,利用1998—2016年河南省高新技术产业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人均固定资产存量和研发(R&D)存量均对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R&D存量的估计系数更大;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虽为正,但统计上并不显著。鉴于此,河南省应引导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产业整体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深度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推动制造业企业向“制造+服务”型企业转型,突破发达国家对后发展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实行的控制其发展的低端锁定政策与策略。

关键词:

高技术产业;
产品内国际分工;
全球价值链

[收稿日期]2019-11-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CJY020);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6BJJ058);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2015-QN-191)

[作者简介]邢红萍(1978—),女,河南省周口市人,郑州轻工业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1990年代以来,产品内分工逐渐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方式,常被称为全球价值链(GVC)分工。目前全球范围内通过全球价值链发生的国际贸易占比超过66.67%。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以廉价劳动力和良好的基础设施等优势融入国际分工,制造能力不断提升,被称作“世界工厂”。但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还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1],亟需向价值链的高端升级。后发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在产业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和产业升级,为了避免在国际分工中陷入发达国家设计的价值链“低端锁定”,就要研究产品内国际分工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机制。不同类型国家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模式不一样,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亦不同,故参与国际分工对其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学者们关于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于产业发展的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产品内国际分工对生产率的影响。例如,胡昭玲^[2]认为,产品内国际分工显著促进了中国工业生产率提高;孙文远等^[3]研究发现,在中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产品内国际分工提高了生产率水平;陈健等^[4]发现,产品内国际分工下的地区专业化发展,带来了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显著提升。其二,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例如,胡昭玲等^[5]研究发现,产品内国际分工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技术的进步;王文成^[6]研究发现,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中国企业创新具有重要影响;但余东华等^[7]认为,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中国技术创新没有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其三,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例如,陈艺毛等^[8]认为,产品内国际分工下的知识溢出,阻碍了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并由于企业过度嵌入价值链而陷入低端锁定的险境;而郭志芳^[9]则认为,产品内国

际分工促进了中国15个行业的产业升级。

可见,由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不同,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甚至得出相反的结论。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一国技术、生产率或产业升级的影响,最终体现为该国在产业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变动。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在河南省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河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能否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如何才能提升其地位至关重要,亟待研究。目前,采用实证分析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还不多。鉴于此,本文拟在对后发国家产品内国际分工对其产业全球价值链影响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模型,采用1998—2016年的数据来检验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河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以期有益于河南省高新技术产业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一、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影响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产品内国际分工对其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1. 产品内国际分工对后发国家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积极作用

其一,通过产业转移效应,产品内国际分工可促进后发国家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主导产品内国际分工,在全球范围内将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分配到最适宜的地区来完成,充分利用各国资源为其生产提供服务,从而获取最大的收益。后发国家凭借传统生产要素价格低廉和优惠政策,从价值链低端环节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中,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产业的跨国转移,跨国公司既可以采用直接投资的形式,也可以采用生产外包的形式,这为后发国家进入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契机,

奠定了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制造基础。

其二,通过产业集聚效应,产品内国际分工可促进后发国家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研究表明,产业集聚可促进知识在企业之间的溢出,有利于推动企业的技术进步。基于区位优势、产业基础或政府优惠政策等因素,某地可能会优先嵌入产业全球价值链某个环节而发展起来。再加上跨国公司的进入,逐渐在该地区出现许多处于相同或相似价值链环节的企业,从而在地理上形成产业集聚。例如,江苏省不仅是全国企业电力需求量大、交通便利的地区,而且是国内在光伏产业发展方面最早一批制定相关优惠政策的地区,所以光伏产业在江苏省的苏州和常州形成了一定的集聚。产业集聚会通过知识外溢、反向工程和人员流动三种方式带来企业间的技术外溢和扩散^[10],从而促进其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其三,通过技术转移和溢出效应,产品内国际分工可促进后发国家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发展中国家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模式可以分为被动吸纳型和主动参与型^[11]两种,其中,被动吸纳型模式对应于加工贸易模式,主动参与型模式主要指国内企业生产最终产品所需的关键零部件从国外进口,如中兴生产手机所需的芯片是从美国进口的。在被动吸纳型国际分工模式下,为了使接包企业掌握生产相关产品的知识,保证产品质量和生产的顺利进行,发包企业愿意向接包企业转移这些知识。除发包企业对接包企业有意识地进行知识转移外,还存在着大量无意识知识转移,通过这些知识转移,最终带来技术的扩散。在主动参与型国际分工模式下,主要存在进口技术溢出效应。国内企业进口关键零部件蕴含的先进技术,对于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12]。所以,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是后发国家

获得外源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产品内国际分工所带来的技术溢出在多大程度上能促进后发国家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还取决于后发国家的企业对于所溢出技术的吸收和消化能力。同时,发达国家往往限制高技术零部件或中间投入品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如美国手机芯片对出口中国的限制,也降低了技术溢出效应。

其四,通过出口倒逼效应,产品内国际分工可促进后发国家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后发国家往往从价值链低端嵌入产品内国际分工。处于全球价值链的环节越低,一国出口面临的国际竞争就越激烈,从而越会“倒逼”企业主动进行技术创新活动,这样不仅会直接提高其技术水平,而且会提升其消化吸收外源技术溢出的能力,促进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

2. 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消极作用

其一,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可能会对后发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带来“天花板效应”,阻碍其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使其被“低端锁定”。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建立全球生产网络的目的是提升其整体生产效率,每个价值链节点上的参与企业都有自己精确的分工定位。产业价值链中高端地位所对应的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和品牌等要素,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在控制权较强的条件下,后发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会受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阻碍或限制,很难进行跨产业价值链环节的创新活动,从而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的生产制造环节^[7]。

其二,对于主动参与型分工模式来说,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等,为了限制来自中国的竞争和抑制中国崛起,往往会采取所谓的反倾销、反补贴措施来限制中国出口。全球价值链分工结构中发达国家设计的封锁机制^[13],会给中国产

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带来抑制效应。

二、计量分析

测度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的指标较多,常用的指标有进口中间品占进口总量(或占中间投入品总量或占总产出)的比重、垂直专业化比率等。此外,不少国内学者在测度中国参与产品内分工程度时,认为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是加工贸易,所以也常采用加工贸易占全部贸易量的比重来测度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计算进口中间品占进口总量(或占中间投入品总量或占总产出)的比重和垂直专业化比率均需用到投入产出数据。但这一方面缺乏河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分行业的贸易方式与投入产出数据,另一方面若仅通过计算加工贸易占全部贸易量的比重来衡量一国或地区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难以真实反映一国的状况。例如,一个经济体中仅有一个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并且以加工贸易的方式参与,如果以加工贸易比值法计算值为100%,那么就会得出该经济体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非常高的结论。所以,本文拟采用各产业出口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来衡量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

本文研究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以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为因变量,以产品内国际分工为主要解释变量。同时,为了模型的稳健性,需合理加入一些控制变量(如技术水平、固定资产存量等)。

1. 模型设定

根据新增长理论中的两部门模型, t 时期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Y(t) = A(t)^\lambda K(t)^\alpha L(t)^{1-\alpha} \quad (1)$$

其中, $\lambda > 0, 0 < \alpha < 1$; Y 表示生产的产品数量; A 代表知识存量; K_Y 和 L_Y 分别为物质生产部门所投入的资本和劳动量。

t 时期知识生产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A(t) = BK(t)^\beta L(t)^\gamma A(t)^\theta \quad (2)$$

其中, $B > 0, \beta \geq 0, \gamma \geq 0$; K_A 和 L_A 分别为知识生产部门所投入的资本和劳动量。

令经济总劳动量 $L = L_Y + L_A$,将①式两边除以 $L(t)$,然后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得到:

$$\ln \frac{Y}{L} = \lambda \ln A + \alpha \ln \frac{K_Y}{L} + (\alpha - 1) \ln \frac{L_Y}{L} \quad (3)$$

②式两边除以知识存量 $A(t)$,然后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得到:

$$\ln \frac{\dot{A}}{A} = \ln B + \beta \ln K_A + \gamma \ln L_A + (\theta - 1) \ln A \quad (4)$$

式③和式④联立消去 $\ln A$,经整理可得:

$$\ln \frac{Y}{L} = \beta_0 + \beta_1 \ln \frac{K_Y}{L} + \beta_2 \ln \frac{L_Y}{L} + \beta_3 \ln K_A + \beta_4 \ln L_A + \beta_5 \ln \frac{\dot{A}}{A} \quad (5)$$

一个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最终表现为其获利能力,所以我们用人均利税来代表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R&D支出与物质资本投资同样具有滞后效应,本文采用R&D存量替代⑤式中的R&D资金投入 K_A 。由于 $L_Y/L + L_A/L = 1$,为了避免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所以从⑤式中略去变量 L_Y/L 。同样,在R&D经费支出中已经包含了R&D活动中的劳务支出,衡量了R&D活动中所投入的人员量,所以略去变量 L_A 。参考胡昭玲等^[2-3]的研究,⑤式可转化为:

$$\ln \left(\frac{\pi}{L} \right)_{it} = \alpha_0 + \alpha_1 \ln \left(\frac{K}{L} \right)_{it} + \alpha_2 \ln (SRD)_{it} + \alpha_3 \ln VS_{it} + \varepsilon_{it} \quad (6)$$

其中, $(\pi/L)_{it}$ 为人均利税,是第 t 年 i 行业的利税 π 与企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 L 的比值; $(K/L)_{it}$ 为人均资产存量,是第 t 年 i 行业的固定资产存量 K 与 L 的比值; $(SRD)_{it}$ 为第 t 年 i 行业的R&D存量; VS_{it} 为第 t 年 i 行业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 α_1, α_2 和 α_3 均为待估参数; α_0 和 ε 分别为常数和误差项。

2. 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处理

(1) 变量定义,见表1。

(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由于在历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缺少2014年以前河南省电子计算机和办公设备制造业的R&D和相关活动的统计数据,信息化学品制造业的统计数据从2015年开始,所以在模型中剔除电子计算机和办公设备制造业和信息化学品制造业,本研究采用河南省高新技术产业中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以及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4个行业1998—2016年的统计数据,对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河南省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样本共包括19年4个行业的数据,共计76个观测样本。

其一,2009年各地区各行业的出口交货值统计数据缺失,用2008年和2010年的出口交货值的平均值来近似代替。2015年和2016年没有关于高技术产业各地区各行业的利税统计,只有利润统计指标,先求出2014年利税与利润指标的比值,再用该比值分别乘以2015年和2016年河南省高技术产业各行业的利润,近似得出2015年和2016年各行业的利税值。1998年各行业的新增固定资产由更新改造新增固定资产统计和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统计之和求得。

其二,变量 SRD 和 K 的核算。用永续盘存法分别对这两个变量估计资本存量。

① R&D 资本存量的核算

$$SRD_{it} = (1 - d_1)SRD_{i(t-1)} + RD_{i(t-1)} \quad (7)$$

其中, SRD_{it} 和 $SRD_{i(t-1)}$ 分别为 i 行业在 t 年、 $t-1$ 年年年初的R&D存量; $RD_{i(t-1)}$ 为 i 行业 $t-1$ 年的R&D经费内支出;参照朱平芳等^[14]的研究, d_1 为折旧率,取值为15%。计算初始年份(1998年)各行业R&D资本存量 SDR_{i1998} ,基期R&D资本存量的估计:

$$SDR_{i1998} = RD_{i1998} / (g_1 + d_1) \quad (8)$$

其中, g_1 为研究时段内R&D经费内部支出的年均增长率, RD_{i1998} 为初始年份的R&D经费内部支出。采用同样的方法可得到 K 。

② 4个行业固定资产存量 K 的核算

$$K_{it} = (1 - d_{2t})K_{i(t-1)} + I_{i(t-1)} \quad (9)$$

其中, K_{it} 和 $K_{i(t-1)}$ 分别为 i 行业在 t 年、 $t-1$ 年年年初的固定资产存量; $I_{i(t-1)}$ 为 i 行业 $t-1$ 年的新增固定资产; d_{2t} 为 t 年的折旧率,其值采用郑世林等^[15]研究中分年度差异化物质资本折旧率。计算初始年份(1998年)各行业固定资产存量 K_{i1998} ,基期固定资产的估计:

$$K_{i1998} = I_{i1998} / (g_2 + d_{21998}) \quad (10)$$

其中, g_2 为研究时段内新增固定资产的年均增长率, K_{i1998} 为初始年份的固定资产存量。

3. 计量结果与解释

(1) 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首先对各个变量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2。本研究主要采用LLC,IPS,Fisher ADF和Fisher PP检验方法。这几种检验方法的原假设均为变量存在单位根。由表2可知,所有变量均不存在单位根,

表1 主要变量的定义

变量	符号	单位	定义
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	π	万元	各行业利税
R&D 资本存量	SRD	万元	各行业 R&D 经费内支出,用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
从业人员	L	人年	企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
固定资产存量	K	亿元	各行业新增固定资产,用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
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	VS		各行业出口交货值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

表2 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LLC	IPS	Fisher ADF	Fisher PP	是否存在单位根
$\ln \frac{\pi}{L}$	-5.873* (0.0000)	-1.695** (0.0405)	14.676*** (0.0658)	123.061* (0.0000)	否
$\ln \frac{K}{L}$	-8.402* (0.0000)	-6.45* (0.0000)	47.809* (0.0000)	56.195* (0.0000)	否
$\ln SDR$	-2.995* (0.0014)	-1.832** (0.0334)	21.066* (0.0070)	18.382** (0.0185)	否
$\ln VS$	-6.413* (0.0000)	-4.441* (0.0000)	30.902* (0.0001)	33.307* (0.0005)	否

注:括号内数值为显著性概率,*、**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5%和1%

这表明本文所涉及的各项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2)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在对模型进行估计之前,先对模型的估计方法进行选取。利用 Hausman 检验决定选取固定效应模型(FE)还是随机效应模型(RE),Hausman 检验结果见表3。

表3 Hausman 检验结果

检验结果	χ^2 统计量	自由度	P 值
随机影响变截距	10.43**	3	0.0153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为5%

由表3可知,通过 Hausman 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建立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widehat{\ln \frac{\pi}{L}} = -10.05 + C_i + 0.26 \ln \frac{K}{L} + 0.39 \ln SDR + 0.08 \ln VS$$

(4.77)*** (1.71)* (3.82)*** (1.29)

$$R^2 = 0.91$$

其中,

$$C_i = \begin{cases} 0.25, & \text{如果属于医药制造业} \\ -0.18, & \text{如果属于航空航天制造业} \\ -0.25, & \text{如果属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 0.18, & \text{如果属于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end{cases}$$

括号内为 t 值;*和***分别表示参数的估计值在10%和1%的水平上显著。

从模型估计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 α_1 的估计值为 0.26,并在统计上显著。这说明固定资产存量对河南省高技术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的不断上涨和智能制造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在高技术行业,不断出现机器对劳动力的替代。这不仅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降低了生产过程中的残次品率,都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此外,随着企业生产的持续和对固定资产的不断追加,企业也会在生产中通过“干中学”积累生产知识和经验,从而提高其生产率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其二, α_2 的估计值为 0.39,并在统计上显著。这表明 R&D 资本存量不仅对河南省高技术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其在所有因变量中对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最大。研发活动不仅会直接带来所有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且当企业参加产品内国际分工时,还会使企业更有能力吸收消化溢出的外部知识,这会间接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所以,从长期来看,企业应更多地通过科技创新活动来提升其竞争能力,提高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获得更多的国际分工利益。

其三, α_3 的估计值为 0.08,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说明产品内国际分工作用对河南省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没有显著促进。可能的原因是:(1)相对于其他技术水平的制造业,中国的高技术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最低,更多的高技术企业在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时,只是处于全球价值链比较低端的环节,被主导国际分工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锁定在低端环节,难以实现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2)企业的技术创新少、知识存量水平不高,在参加产品内国际分工时,即使会有隐性或显性的知识溢出,企业对高新技术有限的学习能力也会阻碍其对知识的消化吸收;(3)河南省高技术产业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还

较低,很难发挥分工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积极作用。

四、政策建议

针对以上研究及结论,为提高河南省高技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其一,应引导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产业整体技术创新能力。企业通过自主创新促进技术进步,可使企业提高吸收消化外源性溢出技术的能力,提升其产品的附加值,促使其分工地位沿全球价值链往两端提升。

其二,应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深度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应依托河南省自由贸易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形成高技术产业集群;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扩大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促进河南省高技术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其三,应引导风险投资基金主动流入具有一定科技实力和科技成果的高技术企业,提高其新技术、新产品的转化率。拥有一定科技实力和良好发展前景项目的中小型高技术企业,可能由于缺乏足够的抵押物或不具备上市条件,很难从银行或通过上市融入资金来支持其产品的开发和生产,阻碍了其发展。政府可以积极引导风险投资基金进入,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使企业更快地成长,这一方面可使企业从全球价值链高端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另一方面可使企业通过“干中学”积累更多的知识和经验,实现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其四,应推动由企业制造型向“制造+服务”型转型。服务型制造是一种新型的产业形态,如美国高通公司不仅进行产品制造,更重要的业务是为客户提供项目研究、开发服务。对于生产零部件的企业来说,面对下游企业的需求,可以提供研发新技术、设计新产品等方面的

复杂零部件的生产定制化服务;对于生产最终产品的企业来说,面对的是终端消费者,可以为消费者特定的需求提供产品高端定制化服务。制造业企业向“制造+服务”型企业转型,是企业突破发达国家针对后发国家的低端锁定策略、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一条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 [1] 肖宇,夏杰长,倪红福.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路径[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9(11):40.
- [2] 胡昭玲. 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中国工业生产率的影响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07(6):33.
- [3] 孙文远,姜德波.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劳动生产效率[J]. 产业经济研究, 2010(4):77.
- [4] 陈健,刘海燕. 产品内国际分工与区域经济增长效率——专业化视角的研究[J]. 中国经济问题, 2013(3):76.
- [5] 胡昭玲,赵媛. 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J]. 世界经济研究, 2008(11):18.
- [6] 王文成.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我国企业创新的影响[J]. 改革, 2018(6):150.
- [7] 余东华,田双. 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理[J]. 改革, 2019(3):53.
- [8] 陈艺毛,李春艳. 国际知识溢出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J]. 经济纵横, 2019(11):127.
- [9] 郭志芳. 产品内国际分工与产业升级研究——基于出口复杂度的再测算[J]. 当代经济, 2016(3):127.
- [10] 金京,戴翔,张二震. 全球要素分工背景下的中国产业转型升级[J]. 中国工业经济, 2013(11):62.
- [11] 王燕梅,简泽. 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对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基于中国4个制造业行业的微观检验[J]. 中国工业经济, 2013(10):135.

(下转第108页)



引用格式:季乃礼,李赫楠.从政治认知视角看特朗普的个人特质与领导风格[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1):74-82.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0.01.010

文章编号:1009-3729(2020)01-0074-09

从政治认知视角看特朗普的个人特质与领导风格

Trump's personal traits and leadership style from a political cognitive perspective

季乃礼¹,李赫楠²

Ji Naili, Li He'nan

1.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071;

2. 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240

摘要:从政治认知视角出发,以玛格丽特·赫曼构建的领导风格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账号所发布的反映个人心理活动与认知动态的文本信息进行内容分析,探究特朗普的个人特征与领导风格,发现:面对环境限制,特朗普属于挑战环境型领导人,相信自己可以控制事件发生并需要权力挑战现存限制,也将尽可能地推翻他所处环境中可能存在的限制;在接受信息的开放程度方面,特朗普的自我意识非常强,自信程度非常高,而概念复杂性程度较低,自信特征比概念复杂性特征更突出,对信息接受往往是封闭的;在驱动动机方面,特朗普的内群体偏见很高,他与美国本土人民的群体同构性极强,同时他对潜在对立者极度不信任,对别人的批评高度敏感和警觉,不允许他人挑战自己的权威,他更倾向于相信国际环境中损害自己群体利益的邪恶对手到处存在,自己有义务对抗这些敌人,必要时应主动攻击以消除潜在的威胁。由此可见,特朗普的领导风格是典型的改革者类型,相比于意识形态利益,其改革的价值取向更偏向于经济利益的考量。

关键词:

领导风格;
决策特征;
政治认知;
特朗普

[收稿日期]2019-03-02

[作者简介]季乃礼(1970—),男,山东省高青县人,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外政治学说和政治治理;李赫楠(1996—),女,湖北省十堰市人,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政治学、政治心理学。

唐纳德·特朗普无疑是美国历史上最令人大跌眼镜的总统。比起政治家,特朗普更像是一位演技娴熟的商业大佬,展现出明显有别于传统政治精英的“反建制派”风格。从竞选活动开始,特朗普就集中对经济、移民政策、奥巴马医改、反恐等议题加以阐释,虽多次挑战在美国政坛上被视为金科玉律的“政治正确”底线,却意外赢得众多选民的支持,支持率一路攀升。执政以来,特朗普对内政外交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调整,大刀阔斧、强势推行一套单边主义的政策,引起国际社会和美国精英阶层的普遍担忧。从竞选总统开始,到出乎意料赢得总统选举,再到孤注一掷地推行单边主义政策,这位不羁善变、作风大胆的新任领导人个性极为鲜明、令人捉摸不透,既吸引了众多关注,也引来不休的争议与揣测,为美国政治与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带来了诸多变数。

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有学者把特朗普的出现定位为粹主义^[1-2],用“反常”来形容特朗普现象,认为特朗普主义即是“反智主义”“反建制主义”“反自由主义”^[3-6]。基于这种判断,学者们认为他可能以美国的利益为重,奉行新孤立主义^[7-9]。也有学者认为,特朗普的当选是一种常态,他代表的是保守主义、共和党建制派^[10-11]。因此,另有学者认为,中美关系的实质并没有改变,甚至是“低开高走”^[12-13]。

尽管学者们对特朗普的认识有分歧,但是大家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定性的文献研究方法。而运用新的理论与新的方法研究特朗普的文章相对较少。从目前的文献来看,国内外只有极少数学者试图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对其进行考察。例如,有学者运用五大人格以及自恋等理论分析特朗普的心理^[14-15],有学者对其政治人格进行研究^[16]。但是没有学者从当前政治心理学的主流理论——政治认知理论——进行分析。

鉴于此,本文拟从政治认知视角出发,以玛格丽特·赫曼(Margaret G. Hermann)构建的领导风格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对特朗普所发布的反映个人心理活动与认知动态的文本信息尤其是其“推特”(Twitter)上的内容的分析,探究特朗普的个人特质与领导风格,论证领导风格理论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普适性,以期弥补学界在特朗普政治认知研究上的空白。

一、赫曼的领导风格理论

随着“政治认知”概念和理论的问世,有学者专注于政治认知的视角对领导风格进行研究,玛格丽特·赫曼就是其中的代表。多年来,赫曼与同事发表了多篇文章对领导风格进行探讨,并把领导风格作为一个连结领导人个体特质与决策行为的中间变量,从政治认知视角对不同政体下领导人的个人决策过程进行了分析。

赫曼认为,不同领导人之间领导风格的差异主要围绕三个方面:一是领导人如何应对他们所处环境中存在的限制,看他们是尊重抑或是挑战这样的限制;二是领导人对接受输入决策系统信息的开放程度,看他们是有选择地使用信息还是任由完全开放的信息指导他们的决策;三是领导人追求地位的原因,看是来自自身内部的推动力还是来自外在人际关系的推动,在决策时是考虑问题本身还是出于照顾人际关系的需要^[17-19]。领导人个体特质与领导风格的对应关系见表1。

二、特朗普的个人特质分析

本文从对环境限制的反应,接受信息的开放程度和驱动动机这三个方面来分析特朗普的个人特质。

1. 特朗普对环境限制的反应

领导人如何应对环境限制?是尊重环境还是挑战环境?在赫曼的理论模型中,评估领导

表1 领导人个体特质与领导风格的对应关系

领导风格	对环境限制的反应	对信息的开放程度	对领导地位追求的动机	
			考虑问题的取向	人际关系处理方式
改革者	挑战	封闭	扩张主义者 (重点是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力, 例如卡斯特罗)	传道者 (重点是说服他人接受自己的信息(意见、行动), 并投身其中, 例如霍梅尼)
		开放	积极的独立者 (重点是保持一个人的机动性和灵活性, 同时回避尝试限制两者的障碍, 例如阿萨德)	警察式 (专注于实现自己的议程, 通过参与其他进程, 说服他们采取行动, 例如恩克鲁玛)
战略家	尊重	封闭	发展者 (在规范和规则之下工作, 强调个人指导, 使政策沿着与自己意见一致的路径前行, 例如戴高乐)	彼此影响者 (重点在于监测其他重要人物是否支持, 或不积极反对, 他们想在特定的情况下做什么, 例如克林顿)
		开放	调停者 (重点在基于问题的性质与目前的情况, 评估什么样的选择或行为是可行的, 并考虑重要的选民将支持什么样的行为, 例如布什)	机会主义者 (重点是协调分歧和建立共识, 在这个过程中授权于他人并共同分担责任, 例如拉夫桑贾尼)

注:根据 Margaret G. Hermann 的研究整理而得

人面对环境限制所作出的反应,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判断:一是控制事件发展的自信,二是对权力的需求。

(1)控制事件发展的自信

相信自己拥有控制事件发展的能力、相信自己能够影响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领导人,对决策和执行过程有着较强的控制欲,为了确保事情会如他们所设想的那样进行,这类领导人常常会要求突击检查下属正在做什么,要求执行者与他的个人行动方向保持绝对一致;同时这类领导人还会主动发起政策活动而不是等待别人提出决策议程,一旦他们做出决定,很难妥协或与他人达成交易。而那些不认为自己能控制所发生的事情的领导人,行事风格则截然相反:他们更愿意下放权力,希望其他参与者共同履行权职;同时他们在决策过程中多是静静等待议程的提出而不太可能主动出击。

虽然特朗普是一个政治新人,旁人难以过多观察到作为政治领导人参与政治决策的种种细节,但他作为美国著名的房地产大亨,已在聚光灯下生活了数十年。从执政表现、自传表

述和人生经历来看,特朗普表现出对自身控制事件发展能力的极强自信。特朗普对事件发展的各过程都有着极强的控制欲。从刚上任即开除检察官和驻外大使,到执政未满一年便辞退数十名白宫团队重要成员,特朗普对于同僚和下属与其政策主张保持一致性有着极高的要求,希望决策与执行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他的控制之中。从特朗普在经商时期吸纳的伙伴也可以看出,成为他麾下一员绝不是靠人情而是靠能力,必须与他的观点保持一致才能够成为他的合伙人和员工。特朗普对主动发起政策活动有着强烈意愿。在竞选活动中,特朗普提出了“将工作从中国等国家带回美国”“在美墨边境筑墙”、废除奥巴马医改、阻止外国穆斯林入境等极端却鲜明的主张。这些政治口号虽或多或少出于选举的需要,但他所提出的各种反传统的政策理念,诸如美国战略收缩或重新布局、限制移民美国等,均非虚张声势,上任不过十天就毫不顾忌地挑战“政治正确”,发表了要求美国暂停难民接收程序 120 天的行政命令,无视国内的各种反对声音。仅此足见特朗普的雷厉风行、自主性相当强的执政风格。

(2) 权力需求

对权力的需求也反映了领导人对于建立、维持或恢复自身权力的担忧,换句话说,对权力的需求也是领导人控制或影响他人的欲望。

当领导人表现出高度的权力需求时,他们善于审时度势,能清晰感知采用什么样的战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追随者大多是他们达成最终目标的工具;他们建立规则是为了确保规则的改变符合他们自身变化的目标或利益。当领导人对权力的需求较低时,他们满足于成为几个有影响力的人之一;对这样的领导人而言,授权于他人很重要;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也非常享受与他们的追随者建立信任关系并分享责任与义务的感觉,这类领导人更像是特殊集体的利益代理人,代表着集体在决策方面的利益。

依据权力需求的评判标准,特朗普表现出高度的权力需求。

特朗普经常发表有攻击性的强力言论。以2016年9月20日—11月7日期间为例,总统竞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在特朗普个人“推特”账号的386条动态中,从对于不同群体的指责,到他对于政客及其制度体系的猛烈批评,攻击性言论有241条。尤其是在三次总统辩论期间,他对主要政敌希拉里的攻击更是达到高峰,从其丈夫克林顿的生活、希拉里“邮件门”、任职国务卿时期的不作为,到指责其“培养”了伊斯兰国等,全方位进行攻击;同时不忘指责媒体对其持有偏见,故意拉低他的选情民调。可以说,自参政以来,特朗普做出有强力攻击倾向的举措相当频繁。同时,特朗普还非常善于审时度势,知道采用什么样的策略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在他从事房地产经营期间,从地产选址到营销,再到装修设计,他不仅凭借独到眼光在商业竞争中屡战屡胜,更是喜欢由自己“创造或变更规则”,以换取更优越的利己条件。因此

可以说,特朗普有着强烈的控制或影响他人的欲望,对权力也有着较强的需求。

综合特朗普对自身控制事件发展能力与权力影响的评估,可以得知,特朗普相信自己有足够能力可以控制事件发生。面对环境限制,特朗普属于挑战环境型领导人,相信自己可以控制事件发生并需要权力挑战现存限制,也将尽可能地推翻他所处环境中可能存在的限制。他对决策过程更感兴趣也更积极,并愿意为自己的行动结果负责。

2. 特朗普接受信息的开放程度

领导人是有选择性地使用信息指导决策还是完全开放地使用信息指导决策?在赫曼的理论模型中,自信与概念复杂性的相互关系影射着一个领导者的自我定位,这种自我定位暗示着领导人的开放程度。因此,关于领导人信息接受程度是开放还是封闭的判断,便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自信程度,体现在领导人对自我重要性的感知;二是概念复杂性程度,体现在领导人在描述或评论他人、政策、观念或事件时观察角度的细分程度。

(1) 自信程度

自信折射出领导人对自我重要性的认知,它将直接影响领导人的决策行为。缺乏自信的领导人更容易受周围人意见的影响,缺乏对自己提案重要性的客观认知,对他们来说,从他人的看法中知道自己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得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他们倾向于成为政治团体的代言人或是代表,不断搜寻信息来提高决策自信,提高自我满足感。对自信程度的测量,主要是测量代词 my, myself, I, me, mine, 计算它们在领导人个人言论中出现的次数。这些词可能用于领导人行为主语,或是领导人把自己看作某个事件中的权威人物、积极回应的接受者。依据对自信的测量标准,笔者对特朗普在推特上发布的个人言论进行了统计。

2016年5月—2018年1月20日,特朗普共发布了3478条推特。其中,自2016年5月特朗普实际上成为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到2017年1月19日正式上任前,特朗普共发布了1381条推特;2017年1月19日至2018年1月20日,执政一年的特朗普共发布2097条推特。就推特内容而言,特朗普使用第一人称代词 my, myself, I, me, mine 的情况见表2。

就代词 my, myself, I, me, mine 出现的频率来看,特朗普的自我意识非常强,对自我重要性的感觉远比其他个体要强烈。但有意思的是,从数据分布来看,自特朗普上任以来,对上述代词的使用次数有所下降,对自我意识、自我重要性的感觉较之以前似乎有所弱化,但依旧处在一个较高水平。

不仅在推特发布数据中,在相关事件中也随处可见特朗普强烈的自我意识与自我重要性的认知。例如,特朗普将自己的名字印刻在了所有的个人品牌上,从球场到酒店,从赌场到学校。Gwenda Blair 在她关于特朗普家族三代人的传记《特朗普家族》中更是直接写道:“第一人称单数代词,主格 I,宾格 me 和 my,远远超过 he 和 his。”

由此可见,特朗普有着很强的自我意识,对自我重要性的感觉远比其他个人要强烈,可以说他是一个高度自信的人。

(2) 概念复杂性程度

概念复杂性是指领导人在描述或评论他人、政策、观念或事件时观察角度的细分程度。概念复杂性程度较高的领导人,会倾向于从广

表2 特朗普使用代词 my, myself, I, me, mine 的情况

时间	出现	出现
	次数	频率/%
2016年5月1日—2017年1月19日	523	37.87
2017年1月19日—2018年1月20日	546	26.04
2016年5月1日—2017年10月31日	1069	30.74

泛的信息中寻求各种观点;概念复杂性程度较低的领导人,会更相信他们的直觉,因此他们认为,行动远远比思考、计划或寻找更多信息要更有效。

对概念复杂性程度的测量,重点也放在特定单词的使用情况上,这些词暗示说话者可以看到环境中的不同维度,而不是表明说话者只看到少数几个类别来分类对象和思想的词。表现发言者高复杂性的常用词有: approximately, possibility, trend, for example; 而反映发言者低复杂性的常用词有: absolutely, without a doubt, certainly, irreversible。

依据概念复杂性的测量标准,笔者对特朗普在推特上发布的个人言论进行了统计。在特朗普发布的上述3478条推特里,高复杂性常用词与低复杂性常用词的使用情况见表3。

就表示概念复杂性常用词出现的频率来看,特朗普是一个概念复杂性程度较低的领导人,他倾向于对物体和想法进行简单分类,对环境复杂性的感知是模糊而有一定困难的,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直觉判断。在他看来,行动远远比思考、计划或寻找更多信息要更有效。从数据分布来看,自特朗普上任以来,对低复杂性常用词使用频率比就任前更高,高复杂性常用词的使用次数随着执政时间的增加而增加。但总体来说,特朗普在推特中对表示概念复杂性词语的使用较少。

(3) 特朗普的自信、概念复杂性与信息开放程度

表3 特朗普使用高复杂性常用词与低复杂性常用词的情况

时间	高复杂性常用词		低复杂性常用词	
	出现次数	出现频率/%	出现次数	出现频率/%
2016年5月1日—2017年1月19日	2	0.14	8	0.58
2017年1月19日—2018年1月20日	13	0.62	17	0.81
2016年5月1日—2018年1月20日	15	0.43	25	0.72

通过对表2表3的数据比对,我们发现:my, myself, I, me, mine 的出现次数是概念复杂性常用词出现次数的26.73倍;在概念复杂性常用词中,低复杂性常用词出现次数是高复杂性常用词出现次数的1.67倍。综合对特朗普自信程度与概念复杂性特征的评估,可以得知,特朗普的自我意识非常强,自信程度非常高,而概念复杂性程度较低,自信特征比概念复杂性特征更突出。对照自信特征、概念复杂性与信息开放程度的关系可知,特朗普对信息接受往往是封闭的。他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应该发生,他对信息的收集与寻找是为了论证自身对政治情境的定义与理解的正确性,以说服他人相信并支持自己的主张与行动方针。特朗普对环境线索是相当不敏感的,他更倾向于重新诠释所处的环境以迎合他所提倡的观念,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对他自身观点不利的数据和证据将被刻意忽略不计。在决策与信息收集过程中,特朗普更有可能以分层的方式组织决策与信息收集,以确保自身对决策过程的控制权。

3. 特朗普的驱动动机

对领导人自身权力地位追求动机的测量,可以看出领导者是受到他所感知到的威胁或问题的驱使,还是受到合作关系的驱使。测量结果可划分为两类:任务趋向和维系群体趋向。

在动机评估的过程中,具体用以下3个特征来进行测量:任务趋向、内群体偏见和对他人的不信任程度。任务趋向的焦点所在折射出领导人寻求权力地位的动机,内群体偏见和对他人的不信任程度反映出领导人对特定群体的认同程度。

(1) 任务趋向

所谓任务趋向是指领导人寻求自身权力地位的动机。对任务趋向的测量,就像对概念复杂性的测量一样,重点放在计算特定的单词表达,区分这些表达是表示对工作任务的完成,还是关注对他人情感的回应与维系。反映任务趋

向性的词有 accomplishment, achieve, achievement, plan, position, proposal, recommendation, tactic 等;反映维系群体趋向性的词有 appreciation, amnesty, collaboration, disappoint (ment), forgive(ness), harm, liberation, suffering 等。

依据对任务趋向的测量标准,在特朗普发布的上述3478条推特里,任务趋向常用词与维系群体趋向常用词使用情况见表4。

就反映寻求权力地位动机常用词出现的频率来看,自特朗普正式进入总统竞选的最后角逐以来,任务趋向常用词的使用频率是维系群体趋向常用词的使用频率的2.9倍。从数据分布来看,自特朗普上任以来,任务趋向性基本稳定,维系群体趋向性有所提升,对众人愿望与需求的敏感度进一步提高。可以说,特朗普是一个任务趋向性更强的领导人,他对权力地位的追求动机来自于自身内部,源于特定的问题或原因,如意识形态、特殊利益等。特朗普也更倾向于从问题的角度看世界,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他会不断对一个项目进行深入挖掘,了解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以及处理问题的方案,他甚至愿意牺牲团队中高昂的士气来完成任务,会努力实现任何所做出的决定。

(2) 内群体偏见

内群体偏见是指领导人对所属的群体有强烈的情感依赖,在看待世界时以自己的群体(社会、政治、种族)为中心,认为这个群体是最好的。在内群体偏见较高的领导人看来,保持

表4 特朗普使用任务趋向常用词与维系群体趋向常用词的情况

时间	任务趋向常用词		维系群体趋向常用词	
	出现次数	出现频率/%	出现次数	出现频率/%
2016年5月1日—2017年1月19日	46	3.33	10	0.72
2017年1月19日—2018年1月20日	71	3.39	30	1.43
2016年5月1日—2018年1月20日	117	3.36	40	1.15

群体文化的完整性和地位的崇高性有重要意义,他们做出的任何决定都要符合这个群体的核心利益。

反映领导人内群体偏见的词,包括有利的正面修饰语(如 great, peace-loving, progressive, successful, prosperous),展示强力的词语(如 powerful, capable, made great advances, has boundless resources),或者表明需要维护集体荣誉和身份的词句(如 need to defend firmly our borders, must maintain our own interpretation, decide our own policies)。

依据对内群体偏见的测量标准,特朗普发布的上述 3478 条推特里,反映内群体偏见常用词的使用情况见表 5。

可以说,特朗普是内群体偏见很高的领导人,他与美国本土人民的群体同构性极强,高度关注并提防其他群体、组织、政府或国家干预或损害美国人民利益的企图。特朗普很有可能使用“替罪羊”政策,将感知的国内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于美国本土人民以外的外来者,并通过放大这个外部威胁来调动民众对自己的支持。内群体偏见极强的特朗普把政治看作是零和游戏,把对方群体的收益看作是美国民众群体利益的损失。因此,他认为美国人民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以确保美国人民在全球竞争中稳赢不输。

(3) 对他人的不信任程度

对他人的不信任包括对他人的怀疑、不安、疑虑和小心,怀疑他人的动机和行为倾向。

对他人的不信任程度的测量,重点放在对语句的理解上,领导人是否对于另一些个体与群体在做什么感到怀疑与不安,甚至对他们保持警惕?领导人是否关心这些人或群体在做什么

么,并认为这些行为对自己、盟友、朋友不利?如果其中有一个条件存在,则语言表达中就表现出对他人的不信任。

据粗略统计,在上述时间段,即 2016 年 5 月到 2018 年 1 月 20 日期间的 3478 条推特中,特朗普谴责国内舆论媒体,攻击希拉里、奥巴马,以及其他政见立场相左者的有 811 条,表现出对潜在对立者的极大不信任,高度怀疑他们的动机和行为倾向。同时特朗普表现出对别人批评的高度敏感性和警觉性,从记者到政治对手,特朗普称他的反对者们“令人恶心”,并且贬低他们是“失败者”,近乎锱铢必较,他的权威不允许被挑战,批评和反对在他看来就是对自己权威的挑战。

综合对特朗普内群体偏见和对他人的不信任程度的评估,可以得知,特朗普的内群体偏见很高,他与美国本土人民的群体同构性极强,同时他对潜在对立者极度不信任,对别人的批评高度敏感和警觉,不允许他人挑战自己的权威。

对照内群体偏见与信任之间的关系可知,内群体偏见很高同时极度不信任他人的领导人,更倾向于相信国际环境中损害自己群体利益的邪恶对手到处存在,自己有义务对抗这些敌人,必要时应主动攻击以消除潜在的威胁。

三、特朗普的领导风格分析

基于对特朗普如何应对环境限制、接受信息的开放程度与追求地位原因动机这三个方面问题的测量,可以看出特朗普对政治背景和环境敏感与否以及敏感程度,与他是想控制事件的发生还是想成为他人政治观点的代言人有关。根据赫曼的领导风格分析框架,这些不同的差异组合起来,即可看到特朗普的领导风格,即典型的改革者类型。

如何看待“特朗普是改革者”的结论?我们或许可以将特朗普与赫曼所说的典型的改革者作比较。1970 年代,赫曼的研究团队通过远

表 5 特朗普使用反映内群体偏见常用词的情况

时间	出现次数	出现频率/%
2016 年 5 月 1 日—2017 年 1 月 19 日	234	16.94
2017 年 1 月 19 日—2018 年 1 月 20 日	684	32.61
2016 年 5 月 1 日—2018 年 1 月 20 日	918	26.39

距离人格评测法对 62 位国家领导人的领导风格做出评测,在赫曼团队的数据库中,改革者类型领导风格的代表性领导人有两位,分别是古巴的共产主义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与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虽说同是改革者,回顾 3 位政治人物的生涯却是大相径庭。但无论是卡斯特罗还是撒切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他们对自己的信仰是坚定的,并为自己的信仰而奋斗。

卡斯特罗曾经说:“我的愿望一直是忠于职守直至最后一口气。这是我能给予的。我并不是向你们告别。我唯一的心愿就是作为一名思想战士进行战斗。”^[20]半个世纪以来,卡斯特罗就像与风车搏斗的堂·吉珂德,他的一生都在为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而奋斗。为了在古巴建立自由平等、没有剥削、生活富足的理想社会,他横冲直撞,无所畏惧。从悍然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统治,到排除万难建立社会主义政体,卡斯特罗对国家统治权力与统治地位的追求动机全部来源于其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追求。苏联解体后,卡斯特罗依然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在环境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等全球性问题中发表见解,猛烈批判造成这一系列问题的总根源——资本主义制度与帝国主义势力。休养之际的卡斯特罗也时常在报纸撰文,谈论革命和理想,关心科技发展,呼吁世界和平,并始终不忘究其一生奋斗的主题、目标:追求各民族、各阶层的真正平等和自由,以及整个人类的彻底解放。

撒切尔夫人同样有坚定的意识形态立场,但是她是反共产主义的。自步入政坛起,便不曾掩饰其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和仇恨。尤其是在 1975 年 2 月当选为保守党的领袖后,她更是毫不隐讳地批评当时一些西方国家苏联的绥靖政策,宣扬自己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作为保守党领袖的撒切尔夫人,联合美国前总统里根、罗马教皇保罗二世、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联邦德国前总理赫尔·科尔等西方右派领袖,一起构筑起一道坚决对抗共产主义的“保守主义”战线。撒切尔夫人终生反对共产主义,直到去世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这一立场。即使在苏联解体后,她仍然坚持说:“冷战结束了……但是共产主义还没有结束,那就是在中国。因此我们在亚洲要支持日本、印度,不要让中国取得亚洲的领导权。”由此可见,她身上极其明显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烙印、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态度,一直没有改变^[21]。

与前两位改革者相比,驱使特朗普行为的主要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利益。作为一个稳居全球富豪榜的超级资本家,特朗普无论是团队组建抑或是推行的政策议案,都带着浓厚的商人色彩。从执政团队建设来看,特朗普内阁的核心智囊团是以华尔街金融大亨和企业家为主的商人团队——质疑全球变暖的前美孚集团 CEO 雷克斯·蒂勒森、支持放松金融业法规的前高盛合伙人史蒂芬·努钦、民粹主义者代表史蒂夫·班农、人称“破产重组大王”的威尔伯·罗斯等。商人智囊团队的建立与“美国利益至上”的政治口号遥相呼应。

在 2017 年 1 月 20 日的就职典礼上,特朗普曾多次高喊“America First”的口号,以“美国利益至上”的标准来衡量国际和国内政策。围绕着“美国利益至上”的政策基调,特朗普提出系列政策预想并逐步落实:颁布禁穆令,减少难民接受人数;用“美国优先能源计划”取代奥巴马的“气候行动计划”,退出《巴黎协定》,为国内自然能源的开采开启“绿色通道”,希望以此实现能源自主,摆脱 OPEC 以及对那些于美国利益有害的国家的依赖,并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重启“双边协定”,与各国重启贸易谈判,拒绝有损美国利益的贸易协定,计划提高进口货物关税、打贸易战,以此保护美国企业、增加收入和支持美国制造,进而扭转贸易逆差;大力

推进税制改革,将公司所得税从35%下调至20%,鼓励美国公司把海外利润带回美国,将个人所得税从七档减至四档……

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价值取向的确贯彻落实了“美国利益至上”的竞选口号,更准确地说,是“美国经济利益至上”的口号——战略利益要远比意识形态利益重要。因此,尽管从领导风格上来讲特朗普是改革者,但他是另类的改革者。

回到最初学者们争议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对特朗普来说,利益至上是他奉行的行为标准。奥巴马政府乃至以前的历届美国政府在顾及美国利益的同时,还能够用意识形态的标准调适国家间的关系,而特朗普则是将“美国利益至上”推到极至,这看似反常,但是从顾及美国的利益来看,则并不反常。作为一个商人出身的总统,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特朗普总是会打出更多张牌,以争取更多的利益,可以断言,双方得失的较量不会导致中美关系改善太多。

参考文献:

- [1] 陶文钊.“特朗普现象”剖析[J]. 国际关系研究,2016(6):3.
- [2] 段德敏. 英美极化政治中的民主与民粹[J]. 探索与争鸣,2016(10):76.
- [3] 金灿荣,金君达. 美国总统选举出现了“新常态”吗? [J]. 当代世界,2016(4):22.
- [4] 刁大明.“特朗普现象”探析[J]. 现代国际关系,2016(4):31.
- [5] 肖河. 美国反建制主义和特朗普政策[J]. 国际政治科学,2017(2):62.
- [6] 周雷.“特朗普主义”与专制的显现[J]. 南风窗,2016(23):67.
- [7] 袁征. 必须面临的挑战:特朗普当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J]. 中国投资,2016(23):32.
- [8] 贾庆国. 大选后的美国与世界[J]. 群言,2016(12):16.
- [9] 王栋,孙冰岩. 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前瞻[J]. 现

代国际关系,2016(12):15.

- [10] 郇菁. 美国保守主义的社会基础和特朗普政权的未来[J]. 文化纵横,2016(6):54.
- [11] 孙来斌. 从大选看美国政治的问题、形象和走向[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5.
- [12] 张蕴岭. 亚太:安全上有对峙无对抗,一体化进程反转[J]. 世界知识,2016(24):16.
- [13] 马文生. 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J]. 公共外交季刊,2016(4):70.
- [14] MCADAMS D P. The mind of Donald Trump: narcissism, disagreeableness, grandiosity—A psychologist investigates how Trump's extraordinary personality might shape his possible presidency [J]. The Atlantic Monthly,2016(6):76.
- [15] BETH A V, ANGELA S B, ANTHONY V. Is hillary dishonest and Donald narcissistic? A HEXACO analysis of the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public personas [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16(10):281.
- [16] 尹继武,郑建君,李宏洲. 特朗普的政治人格特质及其政策偏好分析[J]. 现代国际关系,2017(2):15.
- [17] MARGARET G H, CHARLES W K. Rethinking democracy and international peace: Perspectives from political psychology [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95(4):511.
- [18] HERMANN M G. Assessing leadership style: trait analysis [M] // JERROLD M P. Th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of political leaders: With profiles of Saddam Hussein and Bill Clinton.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178-212.
- [19] HERMANN M G. Leadership styles of prime ministers: How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ffect the foreign policymaking process [J]. Leadership Quarterly,1998(3):250.
- [20] 卡斯特罗. 总司令的思考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3.
- [21] 朱继东. 还原真实的撒切尔夫人: 终生反对共产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者 [J]. 红旗文稿,2013(9):33.



引用格式:张爱军,方凯. 互联网环境下网络政治传播与公众情感表达探析[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1):83-88.

中图分类号:D08;G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0.01.011

文章编号:1009-3729(2020)01-0083-06

互联网环境下 网络政治传播与公众情感表达探析

Analysis on network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emotion expression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et

张爱军,方凯

ZHANG Aijun,FANG Kai

西北政法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科学技术不断革新的时代,信息传播逐渐依赖于互联网的延伸,这使政治信息的网络传播成为当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渠道。网络政治传播所包含的内容多种多样,正确的政治传播对于增强政治认同感、维护政治文化安全等具有重要作用。研究发现,网络舆论场中的话语表达和舆论走向与公众的情感倾向存在相关性,而公众情感因其抽象性、内隐性的特点容易被忽视或难以做出分析。基于政治传播与公众情感相关性的研究视角,研究认为,适用于当下网络环境的情感表达引导路径为:建立理性自律的教育机制,建立适应现代网络政治传播的制度规范体系,建立适应网络政治传播的公平正义体系,重视首因效应。

关键词:

情感;
网络;
政治;
传播

[收稿日期]2019-03-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8BZZ017)

[作者简介]张爱军(1962—),男,辽宁省大连市人,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网络政治传播;方凯(1987—),女,山东省潍坊市人,西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网络政治传播。

现代政治传播中,互联网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传播渠道。网络政治传播涉及政治传播的主体、媒介和受众,媒介是沟通信源主体与传播受众的纽带。与传统媒介不同的是,网络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具有虚拟性,无论是从政治主体到受众的传播还是受众之间的传播,事实上都是一种思想和精神的交流。大家互不相识,不能面面相觑,只能通过文字、图形、音频、视频等方式进行交流,这必然会减少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的沟通,导致网络政治传播的信息内容、方式手段、目的等因素变得愈发多样。而公众的情感倾向同样因其具有与网络相似的抽象性、内隐性等特点而容易被人们所忽视或难以做出分析,但是它的影响不容小觑。鉴于此,本文拟在探讨网络政治传播的主要内容和网络政治传播生态中公众情感的普遍特质的基础上,分析公众情感表达对网络政治传播的影响,提出网络政治传播中公众情感表达的引导路径,以期网络政治传播的有序和规范提供启示。

一、网络政治传播的主要内容与独特价值

传播学认为,传播环境的改变会引起传播内容的相应变化,互联网的公开性、及时性使得政治信息的网络传播与传统媒体的传播有所不同,其传播信息的范围更广,对更新速度也有更高的要求。要实现一种社会范围内的公序良俗,政治信息的有效传播极为重要。网络政治传播以其鲜明的传播特性、独特的传播内容成了当下政治传播的重要途径。“互联网+政治”顺势而生,应时而为。

1. 网络政治传播的主要内容

关于现代网络政治传播的内容,荆学民^[1]曾以一个圆作为比喻。他指出,在政治传播内容中处于结构表层的是意识形态,处于结构中层的政治价值,处于结构核心的则是政治文

明。三者层层递进,由表及里构成了一个坚实的政治传播内容框架。

其一,网络政治的意识形态传播。意识形态是一整套构成政治—社会纲领的判断、理论及目标,经常伴随着人为宣传的含义。立足中国,意识形态传播的核心就是关于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包含的政治理念和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这中间伴随着有关国计民生、社会文化等方面发展的动态与方向的传播等。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其所著的《文化的解释》中,提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命题:“正是通过建构意识形态即社会秩序的图解式的形象,人使自己成为难以预料的政治动物。”^[2]这一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论断不谋而合。人总是不自觉地参与到政治事务中去,并通过政治理念的传播潜移默化地影响大众,以增加政治框架的凝聚力和社会大众的认同感,从而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其二,网络政治的政治价值传播。政治价值是建立在现实政治生活基础上的面向理想政治生活的诉求,是基于当下我们政治生活框架的不完备之处,对于未来想要达到的政治面貌的描绘和期盼,如政治理念、政治结构、政治制度等,其中政治的基本价值应该是依托于自由、平等、博爱等基本因素,以民主、法治等基本的政治制度为导向。

其三,网络政治的政治文明传播。追求文明、倡导文明是整个世界发展的一种愿景和趋势。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现需要以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实现作为基础。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主要包括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两个方面的内容。

2. 网络政治传播的独特价值

数字媒介的应用极大地丰富了国家政治传播的方式,为人们更大程度地参与政治事务提

供了方便,使得政治主体与社会大众之间的沟通由政府到大众的单向信息传递转变为政府与大众之间双向互动的信息沟通。网络的便利性与透明性也激发了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有利于打破信息不畅的藩篱,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保障国家政治文化安全。

其一,有利于澄清网络政治谣言,压缩网络政治谣言的生存空间。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深度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逐渐凸显,诸如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官员腐败、公众对于公平正义的诉求等越来越突出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网络技术的发展在带来传播范式更新的同时,也为基于各种社会矛盾的网络政治谣言提供了生存和传播的广阔空间,网络恶意政治谣言的散布传播,极易引发规模化的集体行动,导致社会动荡,扰乱社会秩序,进而引发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危机^[3]。而透明、规范、真实、有序的网络政治传播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澄清谣言,有效传递正确的政治文化观念,促进政治文化健康发展。

其二,有利于民众接受正确的政治观念、培养其健康的政治情感。国家的政治理念、意识形态等通过互联网迅速传达给大众,有利于构建公众正确的政治认知,强化公众的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

其三,有利于捍卫国家政治文化主权。网络的互联共通性也为境外反动分裂势力利用网络传播西方腐朽文化、捏造针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负面信息提供了便利,其经常会利用网络对我国党和政府进行攻击,向国内不明真相的网民进行误导性宣传,抹黑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大肆宣扬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严重影响了我国政治文化安全。网络政治信息的有序传播,有利于完善信息过滤机制和实时监控预警系统,促进网络政治传播健康发展,捍卫我国的政治文化主权。

二、网络政治传播中公众情感的普遍特质与作用

通常来说,情感是隐性的,只有通过语言、表情、动作、文字等的呈现才可以被识别。网络政治传播中,落地的文字评论、表情符号是人们对于某些政治信息的态度反馈,换句话说,就是网民内在情感的一种倾向性表达。

1. 网络政治传播中公众情感的普遍特质

其一,盲目从众性。一般来说,情感是私密、排他的,属于个人体验,难以与别人分享。在网络政治舆论生态中,社会大众往往会借助日趋发达的媒介平台传播、分享政治信息,但网络的虚拟性和个体的隐匿性,极易促使大众由个体自动站队形成网络群体,迅速地形成网络风暴,造成强烈的舆论冲击力。例如,近年来网络大V发布虚假消息造谣生事或谋利,都会吸引众多粉丝和网友参与其中,从而混淆视听,扰乱网络秩序。再如,知名人士利用网络亲友团发布攻击他人的舆论贴,给后者造成舆论压力,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以上事实都说明,网民具有较强的盲目从众性,在网络中极易受到意见领袖的思想误导或精神操控。

网民情感的盲目从众性具有多方面的原因。网民因其自身的性格、年龄、生活环境、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类型等差异,对同一现象经常会持不同看法,且其观点往往是根据自身的直接经验得出的。古斯塔夫·勒庞在其《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指出,群体成员的主要特点是无意识的人格战胜了有意识的人格,开始支配人的感情和行动,暗示和传染会让这些感情和行动都转为同一个方向,人从个体变成群体成员^[4]。盲目从众使得群体的智力低于孤立的人的智力,使得人们缺乏对于事物的理解、分析和判断能力,经常受困于表象。

其二,反复变化性。网络时代,事实似乎正

在失去其支配社会舆论的力量,由此引发的一种非常普遍的感觉是社会已经进入“后真相”政治时代。事实被情绪所裹挟,人们急于自己情感的表达、宣泄,忽视事件背后的真相。说到底,“后真相”的问题就是情感的问题。新闻不断反转,公众在这个过程中情感走向跟随着不同时刻暴露出来的新闻事实不断发生变化,同时每一次情感表达的涌现又再一次将舆论炒热,引发新一轮讨论,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

公众情感的反复变化源于非理性的情感宣泄。“情感”一词本属心理学范畴,属于态度的一部分。通常人们认为情绪的变化性大,而情绪累积的结果就是形成特定主体对于某个事物的情感。实际上,人的情感也是反复无常的,具有不确定性,这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分析。人的情感易变的内在原因就是人性的易变性,正如休谟在《人性论》中曾指出的,人性的要素就是易变性^[5];人的情感易变的外在原因就是信息的碎片化生产和碎片化传播无法兼顾时效性和完整性,受众接受到的往往都是零碎的片段式的信息,造成了信息模糊。受众对于特殊群体的刻板印象会直接影响到其对事件的理性认识。现在的媒介传播平台和传播渠道多种多样,大众接触信息的途径也多种多样,“后真相”时代的情感宣泄,反转新闻事件的层出不穷,以及信息传播的失控,都会刺激公众情感的变化。

其三,欺骗性。虚假的情感可能会更有利于保持热烈的关系,心理学家将之称为“欺骗性的情感”。在男女朋友关系中,双方互相表达的爱意很多具有不易察觉的欺骗性,但这不是欺骗;也不表明爱意欠缺,而是掺杂有一部分夸大成分。网络政治传播所说的情感欺骗体现在政治活动与现代新型传播媒介的深度融合过程中。受众出于各种原因,如害怕坚持自己的看法而被孤立,亦或想体现自己在某个群体中

的价值而标新立异,从而做出特别支持或极力反对的一些可能与真实情感不符的举动,使自己的情感体现出欺骗性。

“好人主义”价值观的蔓延是情感具有欺骗性的主要原因。由于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们自身的活动与政治的关系也愈加密切,想要“独善其身”是很困难的。对于涉及政治的活动,群体成员会最大限度地维持群体的利益,避免不和谐,不想因此发生冲突,更不想“出类拔萃”,这也是出于一种情绪管理的需要——这样大家都会相安无事。群体中的成员跟风表达意见的时候,容易被过度解读,从而呈现出“特别支持”或“极力反对”两种对立的预见性倾向。比如,对于某些落地前的政策,大众的看法本应是“不错”“可以”“挺好的”等略带倾向性的评价,但在实际中往往会演变成“特别好”的一种毫无瑕疵、特别完美的形而上体验。网络政治传播所特有的虚拟性,会使一些在现实生活中敢怒不敢言的人变成网络愤青,利用语言暴力来表达自己所在群体的政治或生活诉求,力求得到主流社会的关注与满足,这种功利主义的网络传播,是潜在危险引起群体极化的反应。

2. 网络政治传播中公众情感的作用

公众情感表达对网络政治传播有积极的作用。其一,公众情感表达对网络政治传播有很好的反馈作用。公众情感的表达往往会反映公众话语的方向,其对具体政策的支持或反对,对网络政治传播方式的喜好或厌恶,都可以作为网络政治传播效果的反馈。信息发布主体可以根据公众情感反应的程度,广泛收集有价值的信息,及时地调整政策。其二,公众情感在网络政治传播中的表达,对各项政治目标的完善具有启示作用。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对于政治传播主体释放的信息信号,大众话语会呈现出大量的回馈信息,利用大

众群体的智慧力量,政治传播主体可以学习到或挖掘出更加完善的方式方法,从而为以后的政治传播打造一个发展框架。

公众情感表达对网络政治传播也有负面作用。其一,公众情感的无序表达对错误的、不真实的政治信息的传播具有扩散作用,也就是网络谣言的增殖。网络因其虚拟性的特征,是谣言萌芽和生长壮大的理想温床,而网络传播的受众因正确信息传播渠道的不畅通或传播的时效性差等因素极易形成信谣、传谣的集体行动。谣言的肆意传播,会压制正确的、真实的政治信息的传播,使民众信谣为真,引起恐慌,不利于社会稳定。其二,因情感不稳定性和私密性,很难确定情感主体内心的真实感受是否与其所表达的观点相一致,这在明确需要以定量的大众反馈样本为参考的一些调查中极易导致调查结果的偏差。尤其在政治传播领域,民意测评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虚假型或伪装型的“公共态度”会使政治传播的效果大打折扣。

三、网络政治传播中公众情感表达的引导路径

互联网环境下,人们表达观点的自由度提升了,内心情感需求可以更充分地释放。在此过程中,如果监管措施不到位,难免会出现非理性状态下言语过激的谩骂、污名甚至唱反调的造势行为,进而可能形成网络舆论,极大地影响网络政治传播的效果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规则框架下的自由表达、理性的情感宣泄,是互联网政治传播的善治之路,但是,规则、理性、善治的实现,取决于正确引导。

其一,建立理性自律的教育机制。应把长期教育目标与短期教育目标相结合。长期教育目标是以学校为基本阵地,培养学生推己及人、乐于助人、积极践行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

务的意识;短期教育目标则是教育网络公众在表达情感时先进行自我反思,以鼓励大众参与政治事务为根本出发点,培养其同理心,引导其进行合理的、有节制的情感表达。

其二,建立适应现代网络政治传播的制度规范体系。良好的制度规范体系能够有效地约束公众情感,防止公共情感极化。良好的制度规范体系的基本指标是法治。法治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是限制公共权力,防止公共权力滥用,做到法无授权不得行,并同时使公共权力为民众提供有效的服务;另一方面,保障公民权利,防止由于公民权利的极化和滥用而危害社会。

其三,建立适应网络政治传播的公平正义体系。罗尔斯认为,公民行使政治权利应该符合宪法的基本要求,同时情感规则的建立也应符合宪法的基本理念价值^{[6]145}、符合公共理性,不与公共理性冲突,因为公共理性具有独立性。公共理性这种独立性的正义,能够引导公共政治中的多元理性讨论和对于制度原则的忠诚^{[6]29,31}。

罗尔斯的公平正义体系,是针对西方国家的,对中国不太适用,但对于网络政治传播则具有一定的启发性。网络政治传播不同于现实政治传播,但它是现实政治传播的延伸和变异,二者有同有异。从变异的角度来说,网络政治传播需要不同于现实政治传播的网络公共理性、网络公平正义、网络政治情感。网络公共理性需要取得网民认知的多元共识,从而约束非理性的言论,使得理性多元成为网络正常生态。网络政治情感需要找到多元的宣泄口和减压阀,维持网络政治情感的平衡,而这需要网络公共理性与网络公平正义的双重导引,并以公平正义的制度体系作为支撑。

其四,重视首因效应。传播学中存在一种首因效应,也叫“第一印象”效应,指人们对于

最初获得的信息印象深刻、不易改变,甚至会左右对后来获得的新信息的理解。当网络中出现重大舆情尤其是出现关系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时,政治传播主流媒体应及时发声,客观真实地报道事件以引导舆论,缩小公众可以揣度和臆测的空间。这样不仅可以从源头上遏制网络谣言的传播,净化网络舆论场,同时也能在突发事件出现时,利用网络的快速传播力,做到线上线下积极响应,齐心协力共同应对。这也是新闻时效性特征的一种体现。而且积极的、正面的情感表达可以积蓄为一种高度的情感渲染,促使社会大众形成一种认同感,可以有效地推动互联网中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四、结语

加拿大政治经济学家哈罗德·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一书中写道:一种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诞生。在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的传播呈现出即时性、互动性、公开性等特点,政治传播也在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方式的影响下诞生出新的政治传播方式。这其中,公众情感的表达越来越成为影响网络政治传播走向的重要因素。在互联网语境下要实现政治文

明,必须重视公众情感、公众意志的表达,这不仅要求我们要保证畅通的表达渠道,不要让高压的舆论环境作用于受众孤立恐惧的心理,形成“沉默的螺旋”^[7],同时更要求我们要注重公众意见的反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双向互动。

参考文献:

- [1] 荆学民. 关于政治传播内容的理论思考[J]. 南京社会科学, 2016(3): 109.
- [2] 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M]. 韩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9: 260.
- [3] 张爱军. 论网络谣言的治理策略[J]. 行政论坛, 2016(5): 8.
- [4] 勒庞. 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M]. 严雪莉, 译.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1: 11.
- [5] 休谟. 人性论[M]. 贾广来, 译.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 198.
- [6] 罗尔斯. 政治自由主义[M]. 万俊人,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 [7] 上官酒瑞. 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认识论分析[J]. 求实, 2018(6): 36.



引用格式:徐瑞坤,徐宗华.中西传统政治文化的分层考异[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1):89-94.

中图分类号:D73;D0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0.01.012

文章编号:1009-3729(2020)01-0089-06

中西传统政治文化的分层考异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徐瑞坤¹,徐宗华²

XU Ruikun, XU Zonghua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2.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4

摘要:政治文化分为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中西传统政治文化在国家层面上的差异表现为:中国大一统的皇权专制与西方的分权制衡和民主的区别;在社会层面上的差异表现为:中国不成熟的公民社会、宗法伦理精神与西方独立的公民社会、基督教宗教精神统治的区别;在公民层面上的差异表现为:中国宗法伦理为主要价值观念的臣民、子民型的公民文化与西方的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参与型的公民文化的区别。我们既不能僵硬地坚持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也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政治文化,而是应紧密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进行现代性开掘,做到古为今用;合理吸收西方政治文化的先进成分,做到洋为中用。惟有如此,才能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乃至超前的新型的政治文化,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关键词:

中国;
西方;
传统政治文化;
分层

[收稿日期]2019-01-29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7FZZ005,2017BZZ009);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2018-ZZJH-606)

[作者简介]徐瑞坤(1995—),男,河南省平顶山市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西政治文化比较;徐宗华(1965—),男,河南省夏邑县人,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哲学、中西政治文化比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政治文化是文化的核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民族深层次的精神追求,蕴含着国民最根本的政治思想基因,深藏着民族最丰富的政治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有利于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自信”思想,从社会结构视角分层考察其差异,目的亦然。

政治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在社会生活和政治实践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由政治认识、政治感情、政治理论、政治价值观念构成的有机体系^{[2]8}。自从阿尔蒙德提出“政治文化”这一概念以来,潜心研究中国和西方(指典型的西方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等)传统政治文化差异者甚众,特别是近现代,所形成的成果不胜枚举。但是从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逻辑去分层比较中西政治文化者较为少见,研究思考政治文化传统差异与现代政治体系延续性之关系的文章也很少见。鉴于此,本文拟从国家、社会、公民这三个层面,去梳理中西传统政治文化,分析二者的差异对当代中西政治体系的基因性影响,以提升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自觉。

一、政治文化的分层

政治文化是潜在的,内涵是复杂的,国内外学界对其理解也有诸多差异;政治文化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包括其影响和功能,很难评定,也不好数字来量化,即使有些指标量化了,作了统计分析,鉴于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难以令人信服。

我们认为,把结构功能学派的分类方法与中国人分析社会结构的逻辑习惯结合起来,也许更有利于国人理解政治文化的逻辑结构。政治文化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以国家权力组织运营为表现形式的政治文化,包括国家观念、国家

组织权力指导理论、集权与分权、国家领导力量、国体、政体等层面所反映的政治文化,称之为国家层面的政治文化;二是以协调、运转与沟通国家和个人政治文化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参与方式、社会调节方式和公民社会活动模式等为表现形式的社会层面的政治文化;三是公民独立存在并通过社会表现出来的一致性政治活动和思想倾向,称之为公民层面的政治文化。这种分层在习惯上源于中国人在政治活动中常常排列的国家、社会(集体)、个人的思路与逻辑。

在政治学上,国家就是公共权力的获得、掌管与运作的过程。反映国家权力组织运行目标和指导思想的综合文化,往往是这个国家的上层政治文化或主流政治文化。上层政治文化通过世俗化作用于社会,使人们(公民)在社会中获得传导、传播、同化、异化或分化。而公民个人、集体(更多是团体、群体)的政治思想、态度、理论等,在与政治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得到修改、矫正、丰富和发展,再通过一定的表达机制,如集会、结社、出版、传播等途径,反馈到国家权力体系中,这一作用过程往往是同时的、复杂的、多向的。在这里,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公民层面这三个层面的政治文化既有各自的相对独立性,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不能割裂开来。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对政治文化进行细化研究时可以将各个层面进行分解,以便深入剖析;而在进行宏观分析时又不能将它们孤立开来,否则,就是形而上学。

二、中西传统政治文化的差异

运用以上分层分类的方法可以发现,在传统政治文化上,中国与西方的差异是明显的。

1. 国家层面上的传统政治文化差异

中西传统政治文化在国家层面上的差异首先表现在国家观念不同。中国人认为“家国同构”。国最早是分封给诸侯的领地,这些诸侯

认为国就是自家的国,往往以姓氏或地名来命名,所以史上就有齐国、赵国、魏国等。家则是卿、大夫的采邑,其中的臣民全都以“家”相称,如家奴、家丁等,而整个天下则都是属于天子的。秦统一六国后,国君一统天下称为“皇帝”“天子”,天子受命于天,管理统治国家,臣民则“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春秋繁露·玉杯》)。于是,天子统管天下、皇帝代表国家的观念就逐渐形成了,君和国一体,国和家一体;国家是皇帝的国家,天下是皇家的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壮山》)。通常人们所说的汉是刘家的天下、唐是李家的天下、宋是赵家的天下,即由此而来。这样,皇帝与臣民之间的关系就是家长和家中成员之间的关系,往往将其概括成父子关系,天子是最大的家长,正所谓“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盐铁论·备胡》)、“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私物”(《明夷待访录·原臣》)。虽然,后来的国家观念逐步演化为国家是统治者、国民、国土、管制机器(军队、警察等)组成的系统,形成了现在统一的、整体的、不同性质的由主权、领土和人民构成的一般的国家观念,但我国“家国同构”的传统政治文化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下来并影响着现代社会,如当今某县、某市主要领导讲话常用“我代表某市(县)政府和全市(县)人民”之语,而百姓有时仍称地方官员(乡长、县长)为“父母官”等。

西方的国家观念来源于古希腊的城邦、城市,那时的国家就是指公民的联合体。例如,亚里士多德把国家看作若干家庭和村落组成的联合体;国家不是某一家的,而是“公家”的。到了近代社会,卢梭等社会契约论者认为,国家就是国民让渡部分权利订立契约而形成的联合体。例如,美国独立建立国家时,13个殖民地互不熟悉,是“依据公约或协议组织起来的自治团体”^[3]。以致美国历史学家西奥多·H·怀特说:“美国是由观念产生的国家,体制是人有意

地创造出来的,观念缔造了美国政府。”^[4]

这种不同的国家观念缔造了不同的国家权力观。中国人认为,治国权力来源于天,“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所以政出君王天子一人,“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记》),权力结构是宝塔形,皇帝居于这个宝塔的最顶尖,“号令天下,统率万民”。而西方的国家权力观认为,国家的权力来源于自然法,来源于人民的让渡。尽管在西方自然权利观中,社会契约论从伊壁鸠鲁到卢梭,中间经霍布斯、洛克等人各自的阐释,理论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都认为,国家是公众通过订立契约建立起来的,国家是公众的联合,不是个人的国家,权力也不是个人的,而是公众的;公众将权力委托给执政者,执政者要按照公众的意志去行使权力、管理国家。

国家观念的思想价值基础不同,导致权力掌管者和权力的运作方式也不同。中国封建社会是“家天下”,“天子”一人当权,权力运作当然是高度集中的,集权于一人,整个国家机器都成了皇帝权力运行的工具。所以,我国自古就有“国不堪贰,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也”(《荀子·致士》)、“一则治,两则乱”,“一则治,异则乱”(《吕氏春秋·执一》)等说法。地方官吏的设置任命都是由皇帝说了算,地方对中央绝对服从,权力运作方向是单向的。加上君臣之忠的礼治思想为之提供道德辅助,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得以长期维持。到汉代,统治者认为,社会价值观即现代所说的主流政治文化包括人们的思想也要一统,出现了“别黑白而定一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春秋繁露·王道》)。这种一统体制进一步表现为权力归一、思想一统、国土一统、民族统一,国家与社会“以一贯之”,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权力监督方面,中国对皇权的制约和监督主要靠道德、礼仪等内在约束,如“德不配

位”,“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国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等。虽然也有“民贵君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等说法,但是这种外在监督的效果是非常微弱的,其日常有效性主要依赖于最高统治者的自觉、自愿。

西方政治文化则认为,权力来源于公众的让渡。天赋人权于公众的每个人,形成以天为公的“公天下”,人们可以把自己的权力委托给不同的人,人选不是唯一的,权力运作也不是单向的,多数时候,为了能让受托者更好地为公众服务,防止专权,就设法分权、制权、限权,权力运作是并列的、平行的、多元的。西方社会从古到今都是实行多元分立的政治体制。在神学统治和君主专制时代,人们就是以恢复古希腊古罗马的传统之名义对统治者进行斗争的。雅典时期,执政官有9位,将军则有10名,还有元老院、五百人议事会、公民大会、陪审法庭等。古罗马更是多元主义的典型^{[2]96},高级职位往往都由多人平行担任,这也是罗马共和精神的一个集中体现。即使在罗马帝国时期,也出现过“四帝共制”的状况。基于此,近代西方,人们主要把国家看成维护个人权利的工具,为了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他们逐步创立完善了分权、制约的思想。他们认为,没有分权就没有自由,三权合一就意味着专制。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如果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合为一体,则一切便都完了。”^[5]

2. 社会层面上的传统政治文化差异

社会层面上的政治文化比较复杂、宽泛,因为人们对“社会”这一概念有多种理解。中国人对社会的理解,通常是自然地理上相对独立的人群系统,强烈共同的某一特征的群体,以及物质条件相同的人群。一般认为,社会是指同一国家制度下的人群整体。“社会结构”一词,也是百人百解。在西方,“社会结构”这个概念包括多重内容,可以是人口统计上的基本划分

与主要资源,如教育、职业和收入的分布,也可以是带有历史烙印的社会制度体系,或基本制度体系。我们倾向于后一种含义,这些复杂性使得我们只能在设定的范围内比较其政治文化。

中国是一个世俗社会,没有一个能够称得上宗教的体系,儒、佛、道、法等在中国都没有产生过像西方基督教那样的作用。儒家思想,汉代以后被作为国家唯一的正统思想,它追求的是现世不是来世,是人能够直接感受到的,没有多少神秘不可知的色彩,也没有人格化的宗教偶像,即使像孔子这样的“圣人”也是有血有肉、有自身性格、有悲痛欢乐的现实中的人。人们信仰儒教,也不需要举行任何宗教仪式,儒家的“礼”是世俗化的。佛教在中国的影响也比较有限,其教义被中国人改造以后,虽其依然是来世哲学,但与世俗政治相关性不大,它是以退出政治方式来影响和服务于政治的。而道教则追求神仙境界和长生不死,带有浓厚的世俗色彩,主流意识中有超世和厌世现象。林语堂先生曾说,“中国人在成功时都是儒家,挫败时刻是道家”^[7],或成为佛家。当他们做大儒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时,才转而由“成圣”到“成仙成佛”以达到“功名利禄转头空”的境界。总之,儒、道、佛三教并没有成为对抗专制皇权的力量,只是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工具,儒学更成为直接维护皇权的思想体系。与西方统一的基督教组织与王权专制抗衡的态势相比,中国这种高度专制一统的世俗王权和分散不成气候、多元化的宗教信仰,使得中国社会少了多元化的色彩,多了皇权一元化统治的世俗色彩和宗教伦理相对单一的社会氛围。以此为背景,中国社会的国家权力的组织方式是一元的、专制的,社会关系是明确的、等级的、宗法的、伦理的道德制约体系。

西方社会的价值精神受中世纪的影响是极大的,形成了宗教精神至上的社会传统。马克

斯·韦伯认为,基督教节俭勤劳、团队生活等精神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原始雏形。历史上,西方基督教的神学专制、上帝崇拜、宗教仪式等,都对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中世纪基督教取得政治权力后,皇权和教权合一,清除异教徒,维护正统教义,使得整个中世纪形成了一个上帝、一部圣书、一个教廷、一个至高无上的教皇的社会格局。宗教利用教权和政权对异端进行残酷迫害,导致了后来的文艺复兴。中世纪后,当皇权过于强大时,人们又以教会为依托,向皇权专制抗争,新教伦理中自由平等的思想成为人们与皇权斗争的庇护,最终限制了皇权的无限性。这种政教二元的社会结构给西方社会带来了左右逢源的资源。一方面,西方社会生活大多在宗教团体里进行,可以用教会组织制约专制王权,教会成为与专制王权斗争的武器;另一方面,以自然权利观恢复人性、张扬人的权利,用世俗权力来摧毁宗教专制。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使教权、王权相互制约、不断进化,从而为资本主义分权、制权提供了最初的、最强大政治体制的先例。

在中国,人赖以活动的群体是家庭,几世同堂而居,财产是夫妇共有,乃至几代人或宗亲共有,家庭宗族是中国人活动的基本单元。而西方人的社会活动往往是基于宗教组织、独立的社团,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主要是受宗教规章和国家法律制度调节。梁漱溟先生曾精辟地总结道:在天下(国家)、社会团体、家庭、个人序列中,中国人看重天下和家庭,而西方人则看重团体和个人;中国人在社会生活中,讲情理、讲情面,而西方人讲法律、纪律,不讲情面;中国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活动的、软性的,而西方是硬性的、机械的^[8]。

在中国,1840年后仍是专制的王权。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制度是“礼”,调节社会关系的主要是道德和伦理。而在西方,调节社会关系的主要是宗教精神、法律制度,主要是法。在

西方,社会组织方式是多元的。天主教、新教等不同教派的信徒,在近代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后秉持了明显的民主平等理念。

由此可见,中西政治文化在社会治理和社会调节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在中国,社会治理主要是基于道德、伦理、宗法(实质也是道德伦理),即所谓的“德治”“礼治”;社会关系是柔性的,连接人的纽带主要是以家庭为单元的社会活动和人际关系,是亲情社会、人情社会;这种治理是温和的、可逆的,社会是稳定的、和谐的,不会因为很小的事情都诉诸法律。而西方社会治理则主要是基于法律,这是西方的传统,人们主要是在法律、制度基础上活动,社会关系是刚性的,人的个体独立性较强,人情亲情比较淡漠。基于此,中国最基层民众的价值追求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原始的集体主义,知识分子和正义的官僚阶层(士和仕)的社会追求是和谐社会和“天下大同”;而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个人主义则是西方社会的共同价值观。

3. 公民层面上的传统政治文化差异

在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下,中西传统政治文化在公民层面上也有明显的不同。中国的民众在传统上是受约束的、不自由的,是依附的、等级的,是受宗法制度和伦理规定的。例如,中国的妇女就受到王权、族权、夫权等制约,人格不独立,依附于家庭和丈夫。而西方国家的民众在资产阶级革命后是独立的、自由的、平等的,这是资产阶级国家宪法和法律明确予以规定的。受宗法伦理等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中国人的公民意识相对薄弱,依附型、服从型的特征明显,独立性不够强,参与意识相对薄弱。而西方国家的公民独立性强,公民意识觉醒早,社会参与意识强。

从思维方式上看,中西差异也是明显的。中国人追求“道”,这种道原本指天地本原和规律,而实质上是某一时期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中国人更注重实用主义的价值追求,追求功利

的动机较强,从而形成对待事物的实用主义的政治态度和以“礼”而行的形式主义行为模式。而西方人“唯理”的思维方式,导致其价值追求的唯理论,即理性主义,重视抽象的思维方法。

三、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引发的思考

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政治文化作用于政治体系的方方面面,影响政治体系的建立、运行、发展和变革。

其一,特定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制度)建立和存在的必要基础。特定的政治体系只能建立在特定的政治文化的基础之上。中国政治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只能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系,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体系。在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土壤中,照抄照搬和移植西方的政治体系、政治制度,历史和实践都充分证明是行不通的。因此,我们应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不移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其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政治文化对特定国家政治制度的选择也有重要影响。因此,我们既要探索符合中华民族共同价值和政治情感的制度体制,如国家领导力量的一元制、既重德治又重法治、共同富裕、和谐社会等思想;又要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基础的要求,不断优化政治体制,完善政治制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其三,政治文化影响政治体系的运作,制约着政治体系的变革和发展。因此,我们应搞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乃至超前的先进的政治文化。先进的政

治文化不是自发形成的,必须靠掌握先进思想的组织和群众去主动建设才能形成。所以,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继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政治文化,吸收和借鉴外来政治文化的先进成分,以实现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民族复兴,引领世界未来。

“招国魂兮何方?大风泱泱兮大潮滂滂。”在民族复兴的泱泱大风和世界竞争不断加剧的现代化大潮中,我们既不能僵硬地坚持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也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政治文化,而是应紧密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进行现代性开掘,做到古为今用;合理吸收西方先进的政治文化,做到洋为中用。惟有如此,才能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乃至超前的新型的政治文化,以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
- [2] 徐大同,高健. 中西传统文化比较研究[M].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7.
- [3] 卢梭. 社会契约论[M]. 何兆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62.
- [4] 拉维奇. 美国读本[M]. 陈凯,译. 上海:三联书店,1995:4.
- [5]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3.
-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Z].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115.
- [7] 林语堂. 中国人[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67.
- [8] 全元浦. 中国文化概论[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11-118.



引用格式:杨远,李君君.宋代陶瓷茶盏的造型及其设计思想[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1):95-101.

中图分类号:K87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0.01.013

文章编号:1009-3729(2020)01-0095-07

宋代陶瓷茶盏的造型及其设计思想

The modeling and design ideas of ceramic tea calyx in Song Dynasty

杨远,李君君

YANG Yuan, LI Junjun

郑州轻工业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宋瓷茶盏是中国古代茶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其造型、装饰具有鲜明的时代审美意蕴。宋瓷茶盏的设计特点一是造型简洁、比例恰如其分;二是釉色丰富多彩,各有特色,三是装饰技法与图案纹样多种多式,其装饰技法以刻花、印花、绣花等为主,而装饰纹样则以动植物纹、几何纹、人物纹等为主。宋瓷茶盏的设计思想与《考工记》中提到的材美工巧思想相吻合,也与孔子提出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观点相符合,且追求器形之外所存在的审美意韵,从功能到外形再到意境,实现了器物的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之间的完美结合。宋瓷茶盏不仅注重实用功能,更体现了文人追求自然之美的格调,整体清新秀雅,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简约设计的典范之作。

关键词:

宋代茶盏;
造型;
釉色;
装饰;
意韵

[收稿日期]2019-11-12

[基金项目]河南省科技计划项目(202400410349)

[作者简介]杨远(1975—),男,河南省南召县人,郑州轻工业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传统工艺美术史。

《尔雅·释木》载：“檟，苦茶。”^[1]茶即为茶的最早说法，“且茶之始，其字为茶”^[2]。从史料中可知，“茶”字是唐代时出现的新字，且当时是“荼”“茶”并用，在之后的历史演变中“荼”字则被“茶”字所完全替代。唐人陆羽认为，茶是南方的良树，饮茶的习惯起源于神农氏，到鲁周公时期(约公元前11世纪中叶)开始为大众所熟知^{[3][49]}。关于茶起源的时间、地点争议颇多，但我国饮茶习俗的久远历史是无需辩证的。饮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随之而来的是饮茶器具的丰富多样。唐代时饮茶之风已在全国兴起，茶具渐从其他食用器具中分离出来，成为专用器具，且种类众多。

宋朝时期文人雅士爱茶、崇茶，致使饮茶之风达到鼎盛时期，茶具也更加丰富。茶盏是一种由碗演化而来专供饮茶的器具，比碗稍小，口径大概为9~15 cm。有一些称为“碗”的饮茶用器，其造型与尺寸更接近盏，在此一并收入文中进行研究。清人朱琰所著《陶说》载：“盏属饮器，从酉作盞。夏盞饰以玉，遂从玉；亦从角，作觥。今俗作盏，从皿，数字通用。唐盞，紫金、白玉、银凿落、水晶、玻璃制，甚华美，专以佐饮。至宋，则瓷盞为斗茶之胜具矣。”^[4]贾晋妍^[5]、商亚敏^[6]等学者从历史背景、饮茶文化等角度对宋瓷茶盏进行了相关研究。本文拟主要搜集出土和传世的宋瓷茶盏，按口型进行分类研究，同时对其设计特点、设计思想加以分析，以期为当代陶瓷茶盏的设计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宋代陶瓷茶盏的主要类型

从目前的发掘资料来看，浙江、江苏、河北、广东、河南、四川、广西、福建、湖南、湖北、安徽等地都有出土的宋瓷茶盏，可见茶盏是当时较为常见的饮茶器具。这些茶盏中(不含带托盏)数量最多的是黑釉盏，其次为青釉盏、白釉盏、酱釉盏等，其中青釉盏又分为影青釉盏、翠

青釉盏、浅青釉盏等。装饰纹样种类繁多，常见的有植物纹、动物纹、几何纹等，也有许多素面无纹者。

宋代时官窑刚刚兴起，许多窑口还是官窑与民窑并用，民多官少，因此这一时期宫廷传世作品很少。现有的出土茶盏也多为民窑茶盏，粗瓷厚胎，有流釉现象，只有少量精品和官窑制品。宋瓷茶盏按口型大致可分为敞口盏、直口盏、侈口盏、敛口盏、敞口盏、束口盏、花口盏等。

敞口盏，外壁斜直，略带弧度，近似斗笠的形状，被称为“斗笠盏”，可分为浅弧腹、斜直腹两种。成都市新都区褚家村遗址出土的宋代青釉盏(J1:48)^[7]，宽敞的口沿与尖尖的唇部，搭配浅弧腹与平底，瓷胎暗红无化妆土；口径为11 cm，底径为3.8 cm，盏高为3.4 cm。成都温江区“边城·香格里拉”工地宋代墓葬出土的影青瓷盏(M2:23)^[8]，有圆圆的唇部、斜直的腹部与矮矮的圈足，内壁装饰有划花草叶纹；口径为14 cm，底径为3.1 cm，盏高为5.6 cm。

直口盏，口沿处轮廓线为直线，根据腹部造型，大抵可将其分为斜腹、弧腹两种类型。河南省荥阳市晏曲宋代遗址出土的天青釉瓷盏(T0310④:5)^[9]，沿口微内敛，圆尖唇，斜腹弧壁，圈足微向外撇，内外皆施釉，外部施釉未及底部；口径为10.4 cm，底径为4.4 cm，盏高为5 cm。福建沙县琅口、中堡宋墓出土的青瓷盏(M2:9)^[10]，腹部浅弧，唇沿处作加厚处理，白胎青绿釉，釉面光亮，有冰裂纹，盏心釉下有褐色“午”字；口径为9.2 cm，底径为3.1 cm，盏高为3.5 cm。

侈口盏，口沿像喇叭花一样向外撇，分为浅腹、斜弧腹、斜直腹三种。河南省荥阳市晏曲宋代遗址出土的黑釉盏(T0209④:1)，腹部稍浅，斜直壁无明显圈足，表层施釉不及底；口径为7.2 cm，底径为3.2 cm，高为2.6 cm。京珠高速公路孝南段出土的青白瓷盏(M8:1)^[11]，唇

部尖小,腹部为斜弧线,圈足较高;口径为10.4 cm,盏高为5.2 cm。重庆市涂山锯木湾宋代瓷窑出土的黑釉盏^[12],唇部稍尖,口沿外折起棱,腹部斜直,底部为玉璧形;口径为13 cm,底径为4.2 cm,盏高为7.5 cm。

敛口盏,口沿部分向内轻微收敛,造型整体看上去偏饱满,可分为斜弧腹、浅弧腹两种。重庆市涂山锯木湾宋代瓷窑出土的褐釉盏^[12],敛口尖圆唇,腹部呈斜弧线状,小平足,白胎微黄,通体施釉,为生烧器;口径为11 cm,底径为3.5 cm,盏高为5.5 cm。江西景德镇道塘里宋代窑址出土的白釉瓷盏(DT5④:10)^[13],唇部尖圆形,腹部为浅弧形,圈足较矮,通体灰白胎施青白釉;口径为12.4 cm,足径为4.4 cm,盏高为3.6 cm。

束口盏,口沿下处与腹部上处之间的部分向内凹陷,形成如袋子系口状的痕迹,即“注水线”。这是宋人为了斗茶时能够清楚观察水量、防止茶汤外溢所作的标记线。根据腹部造型,大抵可将其分为斜腹、弧腹两种类型。将乐县梅花井宋代墓群出土的黑釉盏(M4:4)^[14]为斜腹型,尖圆唇浅小圈足,灰黑胎施黑釉,釉不及底,釉面有兔毫纹;口径为12.6 cm,底径为3.8 cm,盏高为5.8 cm。而典藏于日本东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的宋代建窑曜变茶盏,则为弧腹型,通体施黑釉,大小不等、分布不均的曜变斑点随意组合散落于器具内壁;口径为12.2 cm,底径为3.8 cm,盏高为7.2 cm。

花口盏,花式盏的统称,口沿处理成花瓣造型如盛开的花朵,有葵花式、菱花式、菊花式、花瓣式等多种样式。江西景德镇道塘里宋代窑址出土的青白釉盏(DT4①:5)^[13],口沿呈六瓣花状,唇沿稍向外撇,腹壁与口沿对应处呈瓜棱状,通体灰白胎青白釉;口径为9.8 cm,底径为3.7 cm,盏高为4 cm。

二、宋代陶瓷茶盏的设计特点

宋瓷茶盏给人的总体感觉是体型优美、优雅秀丽、简洁质朴、文静含蓄,如谦谦公子般温润如玉、风度翩翩。其设计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造型简洁,比例恰如其分,若减一分则短,若增一分则长;二是釉色丰富多彩,各有特色,青瓷晶莹剔透,黑瓷朴实醇厚;三是装饰技法和图案纹样多种多样,其中装饰技法以刻花、印花、绣花等为主,而装饰纹样以动植物纹、几何纹、人物纹等为主。

1. 造型特点

宋人在设计器形时有模仿自然界动植物的习惯,常常将熟悉的花、鸟、鱼、虫等自然素材与抽象的几何形体相结合,通过概括、归纳、提炼等设计思维方式,创造出全新的器形,造型简洁且功能良好。茶盏从饮茶的实用角度出发,造型基本上都是在大口小足的V字型斗笠状上进行演变的。简洁流畅的线条勾勒出整个外部轮廓,大沿口与小圈足、直线与曲线,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整个造型的尺寸、比例、韵律把握良好,不张不弛。灵巧秀美的形体与局部变化的多样性相结合,使整个茶盏看起来亭亭玉立、文质彬彬,充满文人气质,成为宋瓷茶盏的标志性造型。

宋瓷茶盏常常在口沿、腹部做出不同的造型变化,形成独特的造型装饰。藏于中国茶叶博物馆的宋代青白釉刻花葵口盏(见图1),口径为11.8 cm,底径为3.5 cm,盏高为4 cm;通体施青白釉,口沿处作八瓣葵花式造型,简洁流畅的曲线与直线和谐相处于同一器物之中,交相辉映,构成一件体型优美的饮茶器具。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宋代耀州窑印花碗(盏)(见图2),口径为13.2 cm,底径为5.1 cm,盏高为4.1 cm;敞口深弧壁,表层皆施青黄釉,内部碗心装饰菊花一朵,精致柔和的放射性弧线别刻



图1 宋代青白釉刻花葵口盏(中国茶叶博物馆藏)

于内、外壁之上,弧线从沿口下部延至盏底,象征着菊花花瓣,整体造型宛如一朵盛开的菊花。

2. 釉色特点

宋瓷茶盏按釉色可分为青釉盏、白釉盏、酱釉盏、黑釉盏等,从搜集到的资料来看,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是黑釉盏,其次为青釉盏,这与饮茶方式有着密切关系。

根据相关资料记载,点茶法兴于晚唐时期,最早见于唐人苏廙的《十六汤品》。这种饮茶法是将茶盏烧热,而后加入茶末用少量热开水调匀,即调膏,再向茶盏中注水,茶筴击拂,搅出白色的茶沫,点茶即完成。这种饮茶方式更能展示茶末的特色,因此在宋代盛极一时。抹茶与斗茶为点茶的两种形式,斗茶最讲究的是汤花与汤合为一体,水乳交融,若出现两者分开的现象,则为失败。在宋代,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以斗茶为能事,故斗茶之风盛行。

宋人蔡襄的《茶录》记载:“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紺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熳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13]宋徽宗赵佶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并将其著于《大观茶论》中^{[3]49}黑釉盏主要出自福建建窑与江西吉州窑,曜变盏、油滴盏、兔毫盏等都是建盏较有代表性的釉色。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宋代建窑黑釉兔毫盏(见图3),口径为12.8 cm,底径为3.9 cm,盏高为5.8 cm;侈口小圈足,表层施釉,外层施釉不到底,腹部下处有泪痕般流釉状;沿口处为酱色釉,向下渐变为黑褐相间,近



图2 宋代耀州窑印花碗(盏)(故宫博物院藏)

盏心处为纯玄色,犹如兔毛般细丝状的黑褐色结晶,俗称“兔毫斑”。藏于中国茶叶博物馆的宋代吉州窑玳瑁釉盏(见图4),口径为15.6 cm,底径为4.7 cm,盏高为6.2 cm;色彩炫丽的玳瑁状色块遍布于黑色釉面的器具之上,故称“玳瑁釉”。

民国人许之衡在其《饮流斋说瓷》中写道:“古瓷尚青,凡绿也、蓝也,皆以青括之。”^[15]青釉盏中的“青”不单单指青色,也包括影青、粉青、豆青、翠青、梅子青等颜色。“平淡并不是枯淡,中国向来把玉作为美的理学。玉的美,即‘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美。”^[16]玉的美为一切美的标杆,器物之美、人格之美都以玉为参照物,内有光彩,其光微微,不似太阳光芒四射,也不似石头暗淡无光,是一种极绚烂又极平淡的素雅之光。宋代疆域狭小,与西域不通,和田玉求之不得。而青釉瓷“类冰似玉”的特质深受宋人喜爱,龙泉窑的粉青釉、景德镇的影青釉等单色茶盏,意在表现釉色、肌理的自然之美,器物晶莹透亮、色泽莹润,好似“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般清新脱俗。安徽南陵铁拐宋墓出土的宋代青色釉面盏(见图5)^[17],口径为10.7 cm,足径为3.1 cm,盏高为4.9 cm;有微侈的敞口、斜直的腹部和矮矮的圈足,釉色青翠,釉面匀称干净,质地精细,简练素雅。

3. 装饰特点

为了丰盛宋瓷茶盏的视觉效果,宋人常用的装饰技法有刻花、划花、印花、贴花、彩绘、纹胎等,其中刻花、印花为传统手法。刻花与划花



图3 宋代建窑黑釉兔毫盏
(故宫博物院藏)



图4 宋代吉州窑玳瑁釉盏
(中国茶叶博物馆藏)



图5 宋代青色釉面盏
(安徽南陵铁拐宋墓出土)

两种手法常并用,称为“刻划花”。该手法根据线条的粗细不同变换装饰手法,线条流畅且深浅转变自如。印花是先制作出带有纹样图案的模具,再用此模具在未干透的坯胎上拍或按压,使装饰出的纹样精细且有浮雕效果。彩绘是釉上描金、釉上彩、釉下彩等技法的统称,釉上彩色彩艳丽动人,釉下彩色彩自然淳朴。绞胎是将多种颜色的泥土搅在一起,拉坯塑型,烧成的瓷器表面为多种颜色搅在一起的各种样式。虽然宋瓷茶盏的装饰技法与题材多种多样,但整个装饰风格是清新、自然、淡雅的。

宋瓷茶盏的装饰纹样题材丰富多彩,有植物纹、动物纹、几何纹等,生活化的场景与世俗化的文化也是其题材的内容。植物纹以菊花纹、莲花纹和牡丹纹为主。菊花自古以来被称为“花中四君子”之一,因其“此花开尽更无花”的特点被世人赋予高风亮节、不畏寒霜、豪放孤傲的品质,为诗人所喜爱。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洁形象与宋代文人的精神追求相吻合,同时佛教文化的广泛传播也使普通老百姓对莲花特别喜爱。牡丹是“花中之王”,寓意大富大贵,广受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爱慕。珍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北宋时期耀州窑青釉缠枝花菊纹盏(见图6),口径为12.8 cm,底径为3.4 cm,盏高为4.7 cm,撇口浅弧腹;器内壁刻饰缠枝菊纹,两个可爱的童子

在菊花丛中攀枝游荡,神情甜美喜人;线条流畅,画案生动形象。

动物纹多为祥禽瑞兽与鱼纹水禽类,龙象征皇帝的权威,凤则是皇后的代名词。龙、凤纹为宫廷瓷御用的图案纹样,寓意皇权至上、祥瑞富贵。鱼谐音“余”,代表“有余”,多与其他纹样组合,象征吉祥、喜庆等美意,如年年有余、水波鱼纹等。几何纹常见的有折扇纹、水波纹、出筋纹等,冰裂纹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几何纹。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宋代吉州窑黑釉剪纸贴花三凤纹碗(盏)(见图7),口径为16.4 cm,底径为4.9 cm,盏高为6.8 cm,撇口弧腹;内外皆施黑釉,外壁遍布大小不均的黄褐色斑点,碗心点缀一朵梅花形图案,内壁上装饰三只剪纸状凤凰,竞相追逐飞舞,灵动飘逸。藏于耀州窑博物馆的北宋时期青釉刻花三鱼纹碗(盏)(见图8),圆唇敞口,腹部斜曲,内壁底部以粗线条勾画出三条游鱼,四周环绕水波三鱼纹,上部刻细密流畅的弦纹,宛若鱼儿在水中自由嬉戏。

三、宋代陶瓷茶盏的设计思想

陶瓷大师陈淞贤认为,陶瓷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门类,它集各种学科于一体,反映了社会发展各个时期的民俗文化、政治经济、审美取向、科学技术等^[8]。田自秉先生曾指出,宋代的工艺美术具有典雅、平易的艺术风格,不论陶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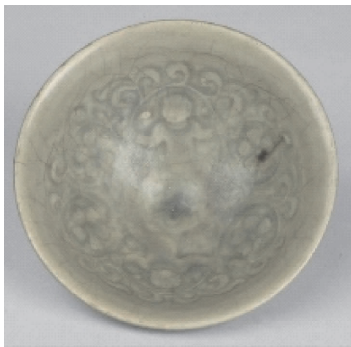


图6 宋代耀州窑青釉缠枝花菊纹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图7 宋代吉州窑黑釉剪纸贴花三凤纹碗(盖)(故宫博物院藏) 图8 宋代青釉刻花三鱼纹碗(盖)(耀州窑博物馆藏)

漆器还是金工、家具等都以质朴的造型取胜,很少有繁缛的装饰,使人感到一种清淡的美^[19]。这与宋代的文艺思潮、造物思想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宋人深受儒释道观念影响,追求理、典雅、严谨、含蓄的艺术风格。

1. 注重功能

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答黄道夫曰:“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气也;气也者,形而上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20]“道”与“器”相结合,“理”即“道”,是抽象无形的;“气”即“器”,是具象可见的。“道”主宰着“性”,即内在;“器”主宰着“形”,即外在,其本质是“重道轻器”的唯心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反映在造物设计上就是重理轻文,器皿多为实用器物,造型装饰简洁,更加注重功能。

欧阳修的《古瓦砚》记载:“砖瓦贱微物,得厕笔墨间;于物用有宜,不计丑与妍。”^[21]器物的美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其使用价值,功能合理。黄金再宝贵、美玉再坚固,但若用以研墨,其效果就不及瓦砾佳。建盏中的束口盏,口沿唇部稍下处,外壁向内凹,内壁凸起一圈注水线,标记注水量,便于斗茶。这小小的注水线体现的是宋人功能设计的合理性。

2. 平淡之美

理学虽然在宋代地位崇高,崇文抑武的政策使得知识分子能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充分施展个人才华。文人阶层的意识广泛深刻地影响到了平民等各个阶层,就宋瓷茶盏而言,宋徽宗、蔡襄等为建盏做文章,评价其釉色,使黑釉盏在宋代风行一时,达到巅峰,兔毫盏、玳瑁盏、鹧鸪斑、曜变盏等成为黑釉盏中的精品。

文人雅士所追求的平淡之美,成为理学之外的主要审美倾向。美学大师敏泽认为,平淡之美是特别崇高的艺术境界,而宋人在否定之否定规律作用下,经过淳朴之美、华丽之美才达到此种境界^[22]。这与道家所说的“既雕且琢,复归于朴”的观点相一致。《二十四诗品》记载:“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日可读。”^[23]平淡不等于索然无味,不等于俗,而是雅,是历代文人所追求的超凡脱俗的审美意向。宋瓷茶盏多以素面为主,即使装饰也不过分雕琢,纹样与器物融为一体,不喧宾夺主,宛如天成。

3. 追求意韵

宋代儒、释、道三种哲学思想相融合,在坚持儒学为主体的基础上,吸收道家“清净无为”和佛家“梵我合一”的思想,形成了一种“寄意于物而不停留于物”的哲学观念。在审美中的表现是追求一种宁静含蓄、平和深远的审美意韵。“意”即含义,“韵”即韵味,“意韵”指的是存在于形式之外的审美意境。“以形内、象内求美,则美而无韵;于形外象外求美,则美与韵

为一。因而,韵与神、神似、意、意气、理、妙理等血肉相关,离神无韵,离意无韵,离气无韵,离理亦无韵”^[24]。器物的美,不仅仅停留在肉眼可见的形式美,更在意器物形之外所存在的含义之美,随物赋形,求其神韵。青釉瓷盏简约的造型、如玉的釉色,不仅体现出宋人尚雅的审美趣味,同时暗含了宋人温和宁静、淡泊名利、委婉含蓄、崇尚自然、以物言志的审美风格。菊花与莲花的装饰纹样就表达了文人士大夫追求高尚品格的审美意韵。

四、结语

宋瓷茶盏既具有功能美,也具有形式美,且做到了二者之间的完美结合,形式追随功能,茶盏的形状在满足饮茶需求的同时,也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要。宋瓷茶盏不但具有瓷器材料之美,同时具有造型之美、釉色之美、装饰之美等,与《考工记》中所说的“材美工巧”理论相吻合,也与孔子的提出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观点相符合,且追求器物形之外所存在的审美意韵,从功能到外形再到意境,实现了器物的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之间的完善结合。虽然宋瓷茶盏已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但通过对其进行研究,能给现代设计带来许多启发。其造型、装饰、工艺都能为现代设计提供借鉴,同时其造物思想也启迪今天的设计去,把握过犹不及的适度原则:过度的装饰会使器物的功能本末倒置,实用与审美应当是相辅相成的。

参考文献:

- [1] 李学勤. 十三经注疏·尔雅注疏[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79.
- [2] 朱自振,沈冬梅,培勤. 中国古代茶书集成[M].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159.
- [3] 陆羽. 茶经[M]. 卡卡,译注.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6.
- [4] 朱琰. 陶说[M].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133.
- [5] 贾晋妍. 浅谈宋代黑釉盏[J]. 农业考古,2006(3):155.
- [6] 商业敏. 宋瓷茶盏的源流及演变[J]. 农业考古,2013(2):76.
- [7] 刘雨茂,陈云洪,易立,等. 成都市新都区褚家村遗址宋代文化遗存发掘简报[J]. 成都考古发现,2011:461.
- [8] 刘雨茂,陈平,李涛,等. 成都市温江区“边城·香格里拉”工地宋代墓葬发掘简报[J]. 成都考古发现,2007:540.
- [9] 翟霖林,田野. 河南荣阳市晏曲宋代遗址发掘简报[J]. 四川文物,2014(5):14.
- [10] 苏闽曙,林建棋. 沙县琅口、中堡宋墓清理简报[J]. 福建文博,2013(1):19.
- [11] 李端阳,胡家驹. 京珠高速公路孝南段考古发掘简报[J]. 江汉考古,2000(3):31.
- [12] 王豫. 重庆涂山锯木湾宋代瓷窑发掘简报[J]. 考古,1991(3):227.
- [13] 付雪如,李育远. 江西景德镇道塘里宋代窑址发掘简报[J]. 文物,2011(10):35.
- [14] 李金生,吴健. 将乐县梅花井宋代墓群发掘简报[J]. 福建文博,2012(2):21.
- [15] 许之衡. 饮流斋说瓷[M].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13.
- [16] 宗白华. 美学散步[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37.
- [17] 郝胜利,程京安. 安徽南陵铁拐宋墓发掘简报[J]. 文物,2016(12):34.
- [18] 陈淞贤. 中国传统陶瓷艺术研究[M].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1.
- [19] 田自秉. 中国工艺美术史[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2:194.
- [20] 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58/59卷[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6:9.
- [21] 丁功谊,刘德清. 欧阳修诗评注[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70.
- [22] 敏泽. 中国美学思想史:第3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819.
- [23] 司空图. 二十四诗品[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24.
- [24] 于民. 中国美学思想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319.



引用格式:许光明. 动画电影海报图形设计特点分析[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1):102-108.

中图分类号:J534.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0.01.014

文章编号:1009-3729(2020)01-0102-06

动画电影海报图形设计特点分析

——以1990年代以来的中美动画电影海报为例

Analysis of graphic design features of animated movie posters

—Take Chinese and American animated movie poster from the 1990s as an example

许光明

XU Guangming

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学校 美术与信息教学部,上海 200135

关键词:

动画电影海报;
图形设计;
文化内涵;
动画角色;
商业价值

摘要:动画电影海报作为推广动画电影的一种重要手段,越来越受到关注。通过查阅文献,对中美动画电影海报中的图形设计进行分析与比较,发现优秀的动画电影海报图形设计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追求独特新颖的艺术创意,用具有独创性的图形达到深度传播的目的;二是注重文化内涵的表达,以形成本国动画电影特色,从而体现动画艺术具有传播文化的功能;三是注重动画电影海报中对动画角色的设计和宣传,旨在促进动画衍生品市场的繁荣发展,体现海报设计的商业价值。

[收稿日期]2019-11-23

[作者简介]许光明(1974—),女,山东省潍坊市人,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学校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设计艺术学。

动画电影海报是宣传动画电影的重要手段。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动画电影海报具有独特的视觉要素,图形、文字和色彩是动画电影海报中十分重要且基本的视觉元素^[1]。而在诸多的视觉元素中,图形元素是最具有设计表现力的。图形是指以传递信息、思想观念为目的的说明性的图画形象,其有别于文字、语言,是一种可以通过多种视觉媒介进行广泛传播的视觉形式。海报中的图形不同于以创造美、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情感为目的的美术、图案作品,它具有很强的功能性,以传递信息为主要目的,同时注重形式和内涵^[2]。

从1990年代初开始,美国动画电影进入繁荣阶段,诞生了一大批经典影片,对世界动画电影产业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和推动;而此时我国动画电影创作在国际动画艺术界享有独树一帜的“中国动画学派”美誉之后,相对于世界动画发展略嫌滞后,其发展陷入了尴尬境地。同时,我国有些动画电影海报存在设计简单化、抄袭模仿严重、审美趣味不高的现象:有的海报设计仅仅是电影某些镜头图片的堆叠,在设计形式上缺乏艺术创意;有的海报设计,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模仿欧美动画电影海报的倾向,缺乏民族文化内涵;有的海报设计,不能体现出应有的商业价值。以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成功上映为标志,我国国产动画电影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一批国产动画电影通过海报设计提高了动画电影在观众心目中的艺术观感,对影片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动画电影海报设计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比如,《大鱼海棠》《白蛇:缘起》等动画电影的海报设计,都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开启了我国动画电影产业蓬勃发展的崭新局面。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中,如何在西方文化和设计风格的巨大冲击下,保持我们自己原有的特色并取

长补短,提高我国动画电影海报的设计水平,成为国内业界共同思考的问题。

目前,学界主要从色彩、图形、构图、文字等方面研究动画电影海报的视觉要素,尚未具体从动画电影海报图形设计角度进行研究。鉴于此,本文拟以1990年代以来的中美优秀动画电影海报为例,总结其共有的特点,研究优秀动画海报图形设计在艺术性、文化性、商业性上的表现,以供学界参考。

一、追求独特新颖的艺术创意

动画电影海报图形设计是图形设计在动画电影海报领域中的具体应用,它同其他领域的图形设计一样追求形式新颖、意境深刻,因为只有具有独创性的图形设计才能引人注目,达到深度传播的目的^[3]。动画电影本身具有想象力丰富、艺术性强的特点,反映在为动画电影宣传服务的海报设计也具有构思巧妙、造型夸张和追求创意的特点。笔者通过观察分析一些优秀的动画电影海报发现,其图形设计方法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 用丰富的动画电影图形元素进行设计

动画电影海报常用动画电影中表现关键情节的图形元素来构成全新的图形组合,以表达电影的内容和主题,传达出电影作品的精神气质与气氛基调,从而引起观者的观影兴趣。例如,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海报设计(见图1),以女主角“椿”和“大鱼鲲”的相向组合为画面的主要图形,有通天水柱、火树、凤凰、湫、鼠婆、月隐、日落、海天一色等多个图形按照一定的画面构成形式互相穿插交错,按主次、大小、轻重虚实统一在一个画面中,形成丰富、有序且生动形象的视觉感受和心理暗示,很好地表达了电影故事情节和主题,多而不乱,将多画面电影故事情节的典型图形元素有机地统一起

来。再如,美国动画电影《史酷比与国王的精灵》的海报设计(见图2),在同一平面空间里包含了多种与故事情节有关的图形,形成了丰富有趣的画面,虽然这些图形都是电影故事里的角色和场景,但不是原有的电影镜头,而是通过重新组合设计传达出电影的主要故事情节和思想内涵,对影片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2. 用图形创意设计的组合构成形式进行设计

动画电影海报中的图形设计,往往会选取代表动画电影中的主要角色或主要故事情节的图形来传达电影信息。图形创意的运用能够使作品的视觉传达更加丰富和直观,并且更具艺术魅力^[4]。图形与图形的组合有各种形式,这些不同的组合形式艺术地表现了电影主题和影片内容,引起人们的思考,产生令人难忘的视觉冲击力,给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动画电影《冰河时代3》的海报设计(见图3),牙齿、动物与背景图形的组合,就运用了外形简洁而内涵丰富的图形同构的创意形式表现了影片的内容。图形同构是一种图形组合形式,其通过物象本身内在的特质和共识,将不同形象的素材进行整合,以形成新的图片形象^[5]。外围中的“牙齿”图形代表了影片中三个恐龙蛋的母亲——“霸王龙”,主角“树懒希德”位于画面中心,其他动物角色位列四周,暗示了影片故事的



图1 《大鱼海棠》海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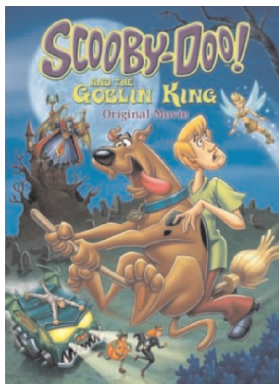


图2 《史酷比与国王的精灵》海报

冒险旅程由此展开。在动画电影《埃及王子》的海报设计(见图4)中,电影故事细节片段“王子驾马车”的镜头图形统一在王子摩西头像剪影的图形之中,也属于图形同构的表现形式,暗示了电影的主要内容是以摩西为主线展开的,达到了既简洁又富有韵味的艺术效果。

替构图形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图形组合形式,它是指利用形与形之间的相似,用某种形状取代后有的形象,组合成一个新的形状或形象。这种类型的图形摆脱了常规观念和一些传统认识中的形象,利用形的转换,使物形充满了异常^[6]。例如,动画电影《蜘蛛侠》的海报设计(见图5),画面中一穿紧身衣的男子悬立于墙壁之角,在头顶强光照射下墙壁上形成了蜘蛛造型的影子,其巧妙地运用了替构图形中的异影构成的方法,暗示了主角彼得·帕克具有蜘蛛一般的特殊能力,这样的图形组合能较好吸引观者的好奇心,引起观众的思考,突出了电影故事情节的悬念和戏剧性,具有极高的创意和审美价值。

3. 用不同的图形表现形式进行设计

动画电影海报的图形表现形式分为写实图形、意向图形和抽象图形。写实图形可以表示客观的具体形态,营造一定的意境,直观地传递出物象的形态美。动画电影海报中的图形以写实图形为主要形式,将电影主题以客观的具体形态表现出来,表达出一种直观性与真实性。例如,动画电影《功夫熊猫1》海报设计(见图6)中的熊猫与所处的群山场景都属于写实图形。意象图形主要是从设计师的主观角度出发,利用具体、形象的方式概括抽象性的事物^[7]。例如,动画电影《大鱼海棠》海报设计中的“月隐日落”在传统文化中意味着天象突变,预示着一场巨大劫难的来临,“火树凤凰”寓意借助某种力量召唤来的神灵。这些意象图形赋

予了设计作品以灵性,传递、表达了海报作品的思想内涵。在视觉传达设计中,抽象图形也是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其主要依赖几何形态模式而呈现,具有概括性、联想性、传播性的特点。例如,《功夫熊猫1》海报设计背景中放射状的条形图形,叠加在背景图形之上,就是很好地运用了蕴含光芒万丈意义的抽象图形,衬托了熊猫的英雄形象,表现了海报的创意。该海报设计将写实图形、意象图形、抽象图形合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同时运用大小、虚实对比的艺术手法,使动画电影海报呈现出丰富的画面效果,增强了审美感受。

二、注重文化内涵的表达

动画电影海报是动画电影故事情节和主题的集中体现,而动画电影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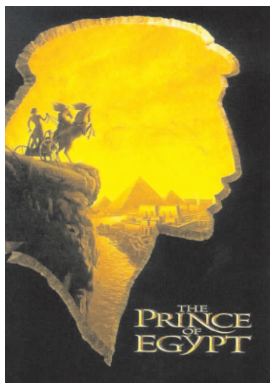


图3 《冰河时代3》海报 图4 《埃及王子》海报



图5 《蜘蛛侠》海报 图6 《功夫熊猫1》海报

和民族性格的集中表现。文化是动画电影的灵魂,是动画电影创作的天然沃土。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动画电影海报因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成为各国宣传本国电影文化的一种重要手段。

1. 动画电影的主题对于文化内涵的表达

创造和创新性是文化的生命所系,动画电影在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的天然优势,可表达多样性的主题。例如,2019年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在传统题材上进行创新,表达了“打破成见,扭转命运”的主题,从侧面也引出了亲情和友情对孩子成长的重大意义,引发了年轻受众不屈服于命运的共鸣,大获成功。美国动画电影在主题上能很好地发现现代社会人类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并对其进行深度挖掘,以引起受众共鸣,受到观众喜爱。例如,2017年上映的《寻梦环游记》,影片的主题有三个方面,即梦想与家庭、死亡与遗忘、误会与和解,赋予传统的墨西哥亡灵文化以温度和情感,传递给人们的价值观是一种普世人生哲学。我国国产动画电影的创作者应传递传统文化的熟悉感、亲切感,自觉转变审美文化定位,寻找贴近观众情感认同的主题来表达深刻的文化内涵。

2. 动画电影海报图形设计对于文化内涵的表达

美国动画电影海报常以鲜明的图形设计表达动画电影的文化内涵。美国社会的文化价值观中有追求自由、独立、个性发展、个人奋斗等特点,以及崇尚开放、包容的精神,这些民族文化内涵在他们的动画电影中都有体现,同时也体现在动画电影海报的图形设计上。例如,《功夫熊猫1》海报中的图形设计,突出表现了主角“功夫熊猫”的造型,暗示了电影“相信自己就能创造奇迹”的主题;主角的动作表现出的诙谐幽默性格与折射出的影片气质也彰显了美国的民族文化,传达了美国文化中追求个人

成功、勇于实现梦想的价值观。

近现代以来,我国动画电影的发展曾面临文化失语和断层的问题,中国文化的内涵如何在动画这种艺术形式上得以体现,是国产动画面临的严峻挑战。国产动画电影海报设计也应该如动画电影的创作一样在充分吸收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跟上时代步伐,体现时代特征,以国际化的视野来设计创作,做出符合当代人的审美和精神需求的,具有深厚民族文化内涵的电影海报设计作品^[8]。

近几年来,在国产动画大力弘扬民族文化内涵的背景下,我国动画电影不再盲目模仿西方动画电影,而是努力挖掘本民族的文化内涵,涌现出了很多弘扬民族精神的动画电影,这些电影的海报设计同样也很好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内涵。例如,动画电影《风雨咒》的海报设计(见图7),用中国传统文化图形元素表达了电影的主题和民族文化内涵。海报中怪兽“饕餮”幻化为水墨图形,“饕餮”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兽;水墨是中国画的元素,代表“风雨咒”中的“风”,是一种巨大的能量。海报中这些图形元素不仅展现了这些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而且传递了影片所表达的主题,弘扬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奉献精神:当“饕餮”即将要毁天灭地、吞噬一切的时候,主人公“郎明”自废双眼修炼成“风雨咒”,击退“饕餮”,守护了自己的家乡。在海报的图形设计上,主人的形象有一种超脱、悲壮和崇高的感觉,画面中人物图形所占比例很小,与人物崇高的奉献精神形成对比。这是借鉴传统绘画中的“点景”处理方法,体现了东方美学中人面对大自然的谦卑态度,也是中国人悟道的一种表现。这样的图形设计恰当地表达了电影的主题思想和我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内涵。再如,中美合作制作的动画电影《白蛇:缘起》海报中的图形设计(见图8),也很好地表达了中国文化的内涵。

该影片以我国民间传说“白蛇传”为基础,讲述了白蛇“白素贞”与五百年前许仙的前身“阿宣”之间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图8a)由电影男主角阿宣的正面和造型神似《新白娘子传奇》中“白素贞”的背面共同组成,结合另一幅以蛇妖“小白”为正面和《新白娘子传奇》中许仙的背面组成的定档海报(见图8b)),两幅海报将“前世今生”的概念完美地呈现给了观者,不仅表达了阴阳相生相克、生生不息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也表达了中华民族传统的爱情观:今生的爱情是前世的缘,从而恰如其分地表达了电影的爱情主题。

三、注重角色设计宣传

在动画电影的创作中,角色设计是基础环节,优秀的角色设计不仅能展现人物独特的性



图7 《风雨咒》海报



a) 前世今生版

b) 定档版

图8 《白蛇:缘起》海报

格,更担负着演绎故事、推动戏剧情节和表现影片主题的重要职责。因此,一些优秀的动画电影海报的图形设计也更加注重对电影角色的呈现,往往对其进行重点宣传。例如,在美国动画电影海报设计中,角色图形往往处于构图的关键位置,有的挑选主要角色做有代表性的动作或姿态进行展示;有的对主角、配角的形象全部予以展示,即“全家福”式的构图。有的动画电影配角由于个性突出,容易受到观众喜爱,往往在衍生品市场能带来较好的商业利润,无形之中推动了动画电影衍生产品的宣传销售,促进了动画衍生品市场的繁荣。动画电影《疯狂原始人》的海报设计(见图9),就是一张“全家福”式的海报,集中表现了各个角色的造型。动画电影《神偷奶爸2》的海报设计(见图10),不仅宣传了主角,还对配角“小黄人”的角色做了很好的宣传,为后续的衍生品贩卖、营销等产业链环节做好了铺垫,从而为动画电影产业带来了极大的商业利润。这种以展示影片角色为目的的海报在美国动画电影海报图形设计中非常普遍,由此可见他们对角色宣传非常重视。

由于我国动画电影角色设计相对落后,且角色设计缺乏个性、创意与娱乐性,没有形成独特的美学特点,缺乏整合衍生产品营销的思路,没有发挥出海报设计在动画全产业链中应该发

挥的作用和功能。例如,《大鱼海棠》中“椿”“湫”“鲲”几个人物的角色设计造型太过传统,艺术性不强,缺乏时尚性,不符合大众审美要求。特别是“湫”和“鲲”两个少年的角色差异不大,没有形成鲜明的视觉差异,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与之相比,《疯狂原始人》中的角色造型各具特色,人物造型夸张,具有时尚和艺术气息,如简洁性感的服饰造型,纹身、饰品的不对称造型,材质的混搭,以及发型的造型设计等都非常符合大众审美和时尚潮流,并且通过角色群像化满足观众的多元审美需求。因此,我们应该在角色设计上多下功夫,形成自己的个性特色。同时应借助电影海报进行宣传,优化动画产业链的营销路径,提高动画电影产业的整体商业收益。

四、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们的审美品位不断提升,对设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动画电影海报作为动画电影推广的重要手段,越来越受到关注。我国动画电影海报图形设计应广泛学习一些优秀动画电影海报图形设计方法,在图形设计上追求独特新颖的艺术创意,设计出具有独创性的图形,达到深度传播的目的;注重文化内涵的表达,逐渐形成我国动画电影特色,进一步提升动画艺术本身具有的传播文化的功能;注重角色的设计和宣传,促进动画衍生品市场的繁荣发展,体现海报设计的商业价值。另外,应随着动画电影宣传的不同时期、不同目的、不同受众的变化而推出不同版本的海报,相信我国动画电影海报设计能够坚定民族自信,取长补短,设计出具有艺术性、文化性、商业性的作品,进一步促进我国国产动画电影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图9 《疯狂原始人》

海报



图10 《神偷奶爸2》

海报

参考文献:

[1] 杨明子. 国产动画电影海报设计中的视觉要素研究[J]. 中国包装, 2017(8):40.

[2] 李浩宇. 浅谈海报设计中的图形设计方法[J]. 西部皮革, 2019(7):74.

[3] 崔生国. 图形设计的“形新”和“意美”[J].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2013(2):64.

[4] 任笑然. 浅谈图形创意在视觉传达中的应用

[J]. 大众文艺, 2018(10):81.

[5] 杨一帆. 视错觉图形在招贴海报设计中的应用探究[J]. 设计, 2018(19):132.

[6] 杨娜, 红方. 图形设计·图书馆目录[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0:105.

[7] 李营伟, 邱坚. 电影海报图形设计创意研究[J]. 美术教育研究, 2017(22):54.

[8] 芦林燕. 电影海报设计的文化性研究[J]. 艺术百家, 2016(81):143.

(上接第73页)

[12] 陈勇兵, 仇荣. 中间品进口会促进企业生产率增长吗——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分析[J]. 财贸经济, 2012(3):80.

[13] 陈超凡, 王贇. 垂直专业化与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升级困境[J]. 科学学研究, 2015(8):1190.

[14] 朱平芳, 徐伟民. 政府的科技激励政策对大中型工业企业 R&D 投入及其专利产出的影响——上海市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 2003(6):49.

[15] 郑世林, 张美晨. 科技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估计: 1990—2017年[J]. 世界经济, 2019(10):80.